副总编辑：李瑞虹
责任编辑：周　彤
美术编辑：刘　燕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82-71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0484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2546/D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BM1082
定价：国内每本 10.00 元　境外每本 3 美元

动态

宝岛之声 THE VOICE OF TAIWAN

40　无欲则刚才能追求历史定位 / 台湾　纪欣

聚焦台湾 TAIWAN IN FOCUS

41　警惕蔡英文当局利用“台独”智库强化对美游说 / 储斌
45　台湾“全民防务教育”综述 / 瞿定国
49　浅析“台独民粹主义”的特征、形态及对策思考 / 周天柱
53　从高雄市市长补选看国民党 / 刘红
59　美台公开联合军演影片目的分析 / 程光
62　台湾当局海洋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 / 杨晶华
67　民进党当局“媚日”政策评析
　　——以钓鱼岛“更名”为例 / 王强
69　蔡英文当局将加速挑动两岸关系 / 韩冰

两岸交流 CROSS-STRAITS EXCHANGES

71　2020 年 8—9 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海外统促会之声 VOICE OF CCPPR OVERSEAS COUNCILS

74　香港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社会的积极作用 / [尼日利亚]胡介国
75　美台政客打“疫情牌”必自食恶果 / [菲律宾]董拔萃

历史

历史顾往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77　“两蒋”时期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历史演进 / 陈本锂



《统一论坛》集孙中山先生之墨宝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期刊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合作媒体：

CNKI中国知网 www.cnki.net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统一论坛》联络处

台湾
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一段 138 号之 1，4 楼之 1(荣爵大厦)
电话 :00886-2-23969678　传真 :00886-2-23979678
香港
香港九龙红磡崇安街 18 号半岛广场 17 楼 1701-11 室
电话：00852-31517576 传真：00852-31517977
澳门
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 1-1B 号东曦阁 3 楼 A 座
Avenida de Sid ó nio Pais, No.1-1B, Edf. Tung Hei Kok,
3 andrar A, Macau
电话 :00853-28702791　传真 :00853-28703531
喀麦隆
B.P 13000 Douala CAMEROUN
电话 :00237-9993352　传真 :00237-3437633
南非
39 Faiesiand Ave. Cyrildene Johannesburg 2198 South Africa
电话 :0027-11-6228521、6164816、6156068
传真 :0027-11-6163720、6228534
尼日利亚
Golden Gate Complex.25B Glover Road. Lkoyi. Lagos, Nigeria
电话 :00234-1-2695337　传真 :00234-1-2695192
菲律宾
Unit 1108 Dasma Corporate Center #321 Dasmarinas St.,
Binondo Mla Philippines
电话 :0063-2-2477141　传真 :0063-2-2449973
日本
横滨市中区山下町 166 番地中山纪念堂 1 階〒 231-0023
电话 :0081-45-6818879　传真 :0081-45-6643278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 2 番 12 号 〒 104-0061
电话 :0081-3-35717611
韩国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 587-13 番地新东和 B/D
电话 :0082-25438833 传真 :0082-25428280
泰国
149 Galaxy Place,Nonsee Road(Rama Ⅲ)
Chongnonsee Yannawa,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0066-26811777 传真 :0066-26811764
爱尔兰
9 Kilcronan Court,Clondalkin Dublin 22,Ireland
电话 :00353-1-4578193　传真 :00353-1-4578193
比利时
GROTE MARKET 38 9100 SINT-NIKLAAS BELGIUM
电话 :0032-3-7760565　传真 :0032-3-7767470
波兰
02-202 ul.drawska 17,Warszawa Poland
电话 :0048-22-8223062/63　传真 :0048-22-8223061
丹麦
OESTERBROGADE 132 2100 COPENHAGEN OE DENMARK
电话 :0045-40412238　传真 :0045-35428033
俄罗斯
电话 :007-095-7377941　传真 :007-095-1664319
荷兰
Francina spoel straat 21 2135 HK Hoofddorp Holland
电话 :0031-647490890　传真 :0031-235354661
罗马尼亚
Romania Bucureati Bd. Basarabia, Nr.244,BL.MYB,Sc.B,Ap.39
电话 :0040-722227038　传真 :0040-213482122
葡萄牙
Av. Boavis TA 1588, SALA 314, 4100 PORTO-PORTUGAL
电话 :00351-917847880　传真 :00351-226063289
塞尔维亚
JURIJAGAGARINA 87/229 SRVIJA BEOGRAD
电话 :0038-163249888
传真 :00381-11-2260874　00381-11-3185788
西班牙
C/LEGANITO 4’’ 1B 28013 MADRID SPAIN
电话 :0034-915422324　传真 :0034-915481994
意大利
MONTESUELLO 9 MILANO ITALIA
电话 :0039-3386309396、 0039-021701258568
传真 :0039-0270125856
英国
61 FitzJOHN’S Ave London NW3-6PH U.K.
电话 :0044-207-4356087　传真 :0044-207-1688501
哥斯达黎加
De la entrada principal de las pisinas de plaza viquez 100 metros al norte sobre la linea del tren apartamentos de color Amarillo con portones de color caf é .San Jose, Costa Rica
电话 :00506-22227952 / 88856468
美国
370 RIVERSIDE DR. #2A New York N.Y.10025 U.S.A.
电话 :001-917-2243356、 001-212-2221699
传真 :001-212-2221699
墨西哥
Calle Azucena No:4061 Esq con Blvd.Agua Caliente Plaza
Estancia Local 7 Fracc.Del prado C.P.22105 Tijuana, B.C
Mexico 电话 :0052-664-6080188　传真 :0052-664-6084666
澳大利亚
Suite 97, Level 9, 420 P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0061-2-92818911　传真 : 0061-2-92818966
斐济
26 LAUCALA BAY ROAD SUVA FUJI P.O.BOX17019
电话 :00679-3362829、9916823　传真 :00679-3311288
瓦努阿图
P.O.BOX 282 PORT VILA VANUATU
电话 :00678-22881　传真 :00678-26848
新西兰
NZ Wgtn Assc Promoting Peaceful 16 Arnot Ave
Upper Hutt New Zealand
电话 :0064-4-5266518　传真 :0064-4-5266518
巴西
RUA DOS ESTUDANTES, 15 APTO.33 LIBERDADE
SAO PAULO BRASIL CEP 01505-001
电话 :0055-11-32098762　传真 :0055-11-32720180
厄瓜多尔
AV AMERICA 109 Y JOSERIOFRIO QUITO ECUADOR
电话 :00593-2-2236624　传真 :00593-2-2507786
智利
Av. Chile Espana 330 Nunoa Santiago-Chile
电话 :0056-2-2250945　传真 :0056-2-2250945

2020年祖国大陆对台政策论述实践若干问题回顾与思考

■ 刘匡宇

中美关系风云激荡，两岸关系从冷僵局向热对抗升级。2020年，正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刻变革之际，当前的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被不确定性与对抗冲突的乌云笼罩，成为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注脚。而中国大陆正面外部极限施压和岛内政治躁郁，在坚持“一个中国”和反“独”促统总原则、总方向、总基调不动摇同时，对台政策论述实践与时俱进、务实进取。在这一变动的特殊历史时期，岛内外各方政治势力理应敏锐捕捉其中的草蛇灰线，仔细品味中国大陆一言一行所释放的清晰政治信号，减少误判，抛弃幻想，顺应大势，维护和平。

特殊时期以政治强音响应“极限施压”

2020年，随着大环境和小气候的复杂变动和交织演进，中国大陆在台海方向上面临的压力达到了40年来空前的水平。特别是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一些西方国家为掩饰转嫁矛盾，将其刻意操弄为一场特定指向中国，要求各国各地区选边站队、与中国大陆“脱钩”的战略战、政治战、经济战、价值战。

美国先后挑起疫情起源、疫情追责、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等多个议题，并借此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甩锅”，白宫发表新的对华战略报告，公开认定中美双方处于“战略竞争”状态，赤裸裸威胁要继续加大公开施压力度。其次，在这一过程中，顽拒“一中原则”的蔡英文当局积极扮演美国“马前卒”“看门狗”角色，配合美国“武汉肺炎”论述大搞“借疫谋独”“口罩外交”，配合美国炒作疫情议题渲染两岸制度价值差异，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因应和政治勾连，甚至在其第二任期就职讲话中明示将启动“修宪”进程，进一步向“去中附美”“法理台独”方向踩油门。美台“借疫反中”的做法，“蛇鼠一窝”的行径，给两岸关系增加了极大不确定性。在美军从疫情中恢复行动能力的半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力量部署加速由近东向远东转移，其显见表现是三大航母打击群“里根”号航母编队在冲绳东南海域活动，“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双航母演习；美国军机军舰愈发密集、公开、高调现身通过台海南海及周边海域，出现战略化、常态化趋势，并且带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指向；美台政治军事关系虚实并进，除国务院部门高官接连访台，美台“常态化军售”内容也转趋战略性、进攻性和高精尖武器，进一步加深台湾与美国西太平洋军事战略的绑定，并赋予其更多侦察、反击乃至进攻能力。这些态势揭示了美国战略意图出现了从极限施压到前沿部署的战争边缘试探苗头，并且似有意借台湾向中国大陆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以探中国大陆虚实、挫中国大陆锐气、阻中国大陆发展。再加上美国加大对日军售规模和日本政治异动，借香港、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事务对中国大陆发难，以及印度部分政客军官在“印太战略”和特朗普访印鼓动下持续挑动中国大陆西部边境摩擦，制造准战争状态，甚至参与美国“南海自由航行”制造“两洋联动”。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对中国大陆形成海陆一体、东西双线、虚实结合的战略政治经济全方位高压态势。作为中国核心利益所在的台海，成为了这一战略施压环线的关键节点。

在严峻复杂的台海局势和政治挑战之下，中国

大陆首先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予以郑重回应。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重申了祖国大陆对台大政方针和反“独”促统的坚定决心，表明了制度性地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开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强大信念，有力地回应了近一段时期以来各方对两岸关系的关切，以及岛内外一些政治势力制造的挑战和压力。下半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渤海组织的例行性军演接连登场，特别是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及台湾岛南北两端密集进行多军种联合作战实战化演练，“山东号”与“辽宁号”航母或将进行双航母联合训练，以及在南海试射东风 -26B 和东风 -21D 导弹，对台湾岛形成战略合围、瓮中捉鳖之势，以强有力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回应外部势力干涉，以实际行动震慑制造“台独”、分裂国家的挑衅行为。

总的看，在美国保守势力为彻底消解中国“取代美国”的可能，和特朗普政府为谋求连任而孤注一掷地开辟的各条对华遏制战线上，特别是涉及台海的议题，美国并未能称心如意。相比20多年前，中国大陆在维护台海主权及核心利益上，不但意志定力更加清晰，物质力量的成长也非吴下阿蒙，具备了言必信、行必果的政治可信度。

新形势下涉台表述微调寓意深远

过去两三年来，两岸交流频繁，政党对话、城市交流、民间往来仍维持较高活跃度，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在涉台场合发表谈话，较为密集地论述两岸关系和对台工作。特别是作为两岸关系新时代开局之年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为迈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两岸关系定锚、定调、定向。相比之下，受区域形势和疫情因素等影响，祖国大陆对台政策论述则以更精炼的政策论述、更丰富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与时俱进、务实进取的工作取向，其所蕴含的一些新动向引发高度关注。

首先，“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基于新的政治形势，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涉台论述，在言简意赅重申祖国大陆将继续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后，不再详细进行原则阐述和概念辨析，而是着眼于反“独”促统工作的具体目标路径。特别的，报告没有谈到“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岛内舆论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并做出了各类解读。有的将其解读为“更合时宜的刻意的善意”，是战略定力和自信的体现；有的则认为这说明大陆对民进党当局已毫无期待，不排除大陆“有一国一制的想法”；国民党则不认为大陆在改变政策，仍会坚持“九二共识”。

事实上，受疫情影响，今年全国两会务求精简，政府工作报告也压缩至一万五千字，其中涉台论述自然同样高度精炼，呈现最核心最急迫最务实的内容。“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两大政策主张和政治概念，其共同内核是“一中原则”。“一中”是祖国大陆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不会动摇的基本点和总目标，是报告论述的大前提。但从政治现实角度看，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并操弄“反中”民意污名化“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两岸政治对话和互信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相应的高层沟通协商障碍重重，关山难度，祖国大陆以务实角度出发自然会在工作重心上有所权衡，这也是政策有序的体现。更进一步说，祖国大陆对台政策事实上是一个具有显著持续性内涵丰富的政策篮子，“一中原则”作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石必然不动如山，但在政治原则和目标一以贯之的情况下，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既可以做加法，也可以做减法，但终将殊途同归。

其次，和平与统一是否是“必然连接”？岛内舆论同样注意到，相比往年提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延续严厉警示“台独”分裂势力的同时，仅提及促进统一而没有“和平”二字，惊呼“和平与统一不再是必然连接词”。对此，祖国大陆多次表示，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2020年是《反分裂国家法》实施的第十五年，但民进党重返执政后，“台独”及其各种变种形式不断变换花样，岛内“独”派的突

进冒险和当权派的“切香肠”动作愈演愈烈，外部势力的策应鼓动也不加掩饰，和平统一基础不断遭到挑战和蚕食。

特别是近半年来，美国在台海南海的军事挑衅呈常态化趋势，岛内外特定势力不断渲染两岸擦枪走火甚至兵戎相见的态势，舆论甚至认为两岸形势来到了1996年台海危机后最紧张严峻的时期。山雨欲来妖风满楼的局势，自然增强了祖国大陆应对台海重大事变的危机感，祖国大陆显然有必要以更强姿态明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最佳路径，但祖国大陆有清晰明确的底线意识、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国家统一是历史必然，但政治手段服务于政治目标而不会锢囿于单一选择，对此岛内外任何势力都不应心存侥幸或误判。

涉台法治原则与法制体系建设可期

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对台工作越发需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推进反“独”促统工作精准落实，除了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手段，国家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是反“独”促统的重要依托。为回应新的使命和挑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清晰界定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概念，既从制度层面特别是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的层面，对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作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和工作部署，又具体阐述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彰显了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

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将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对此，不但特朗普政府气急败坏作态“报复”，两岸舆论和岛内各界也引发强烈政治气旋。众所周知，“一国两制”的“初心”本就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因时代际会而在港澳先行试行，因此岛内不少人始终对“一国两制”和香港事态存有特殊的心理联结。一贯妄图从政治操弄香港事务中火中取栗的民进党当局对此肆意攻击、说三道四，台港两地也充斥着各种式样的躁动和杂音。对此，祖国大陆有关部门指出，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分必要和重要，旨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近40年来，祖国大陆始终把握两岸关系发展时代变化，坚持完善和探索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实践，有力引领两岸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有学者就此建议，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中，要动态平衡经验总结与制度创新的建构进程，特别是从顶层架构和具体实践层面，设定新的标的和标准，做出可操作的合理设计与安排，避免出现新的国家安全“飞地”。

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强调，在“确保宪法全面实施”任务中，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岛内媒体认为，以这样不寻常的方式论及涉台问题，虽然没有涉及具体法律法规内容，但表明大陆在考虑台港澳问题时，都要一体纳入国家的宪治法律体系当中，意味着大陆会在宪法和涉台法律方面有更权威、更精细的安排。更好以法制思维应对和处理台港澳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国家安全法或为台湾“二次光复”的政治预言

祖国大陆强势推行香港国家安全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和法治体系，也对台湾岛内外分裂主义势力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岛内舆论认为，大陆正在实践香港的“二次回归”，完成去殖民化的浴火重生。台湾未来势必也要经过类似的“二次光复”历程，回归为“今日香港”。

长期以来，蔡英文当局在涉港问题上一方面唯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则筹谋布局，要借机火中取栗。一方面，紧跟美国定调和“制裁香

港”姿态，对中国大陆修法指桑骂槐，甚至称“香港不再有别于中国”“两制变一制”，一改“关怀港人”口径，放风要重新评估台湾的“香港澳门条例”存废，即欲将港澳视同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并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与其关系。另一方面，据台湾媒体称，5月21日当晚，港人网络搜索“移民台湾”次数暴增，坊间甚至有“港独”惊惶窜逃台湾导致机票售罄的消息，这让蔡英文等“香港之友”操弄香港事态也遭到了不期而至的反作用力，面临着兑现其对香港反对派、“勇武派”的“挺港”口惠压力，继而还要被动思考，处理这一问题又会如何牵动港台关系与两岸关系螺旋叠加的敏感神经。对其中涉及的政治庇护或移民台湾等政治法律问题，蔡英文当局无从因应，选择观望应对，惟恐被指“介入太深”。蔡英文当局在涉港议题上的“发夹弯”，表明惩罚港人、示警祖国大陆是“蚂蚁踩大象”，于逻辑上则自相矛盾，更难以满足因蔡英文此前“站台”而引来的香港反对派“过度需要和期待”，将为蔡英文打下第二任期对香港议题用尽即弃。

不过，蔡英文当局台面下的动作并不低调。林飞帆等绿营激进派抛出数条环环相扣的“挺港计划”，欲深化后续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和国际合作，被认为是民进党“可做不可说”的隐蔽行动计划。主管外事的吴钊燮在国际媒体放风称，处理香港问题后，大陆下一步是“对台动武”，台湾必须持续与西方深化合作，“在区域安全和全球产业供应链上持续扮演关键角色”才能“自保”。“自由时报”等绿营媒体也撰文鼓吹，台湾当局借机加强与美英等国围绕反对香港国家安全法和报复中国大陆合作做文章。更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当局快速端出多个产业、金融、投资和移民磁吸计划，图谋“香港遭制裁而衰退后”，吸收其“丰沛的国际金融能量及人才”，将让台湾在未来代替香港成为东亚新的人员、资本、产业和信息集散流通处理中心。显然，蔡英文当局对于如何榨干香港“人血馒头”的最后一滴，有非一日之计的野望和系统性筹谋。

更危险的是，香港过去是美国对华输出颜色革命的一线桥头堡，台湾更多的是准一线或者二线策源地。但香港国家安全法落地生效对香港本地的颠覆行为打击效果明显，外部势力就地组织动员能力减弱。可以想见，台湾不但想取代香港的经济中心地位，也同样有意承接美国在东亚的“颜色革命中心”角色。虽然蔡英文当局推动与祖国大陆脱钩，其实质向祖国大陆输出意识形态能力必然削弱，但作为向西方“邀功”的资本，蔡英文当局或会在美国某些人“指导”下，借台湾凸显两岸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差异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合法性，并借民间交流倒灌这种思潮以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血肉连结，同时更频密、实际地与“港独”“藏独”“三股势力”等势力串联，将台湾打造为海外反共和分裂主义势力集散中心。

面对蔡英文当局在港台关系议题上的重重心机，祖国大陆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后，未来类比处理“台独”只会更加雷霆万钧。岛内舆论呼吁，蔡英文当局不应继续测试大陆底线，而应思考如何让台湾退回安全红线内。张五岳、黄介正等学者和《联合报》、“美丽岛电子报”等认为，大陆在对港涉台问题上正在采取“转守为攻”的新思维，对主权和国家安全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香港国家安全法出台后，大陆不但对美台后续反应早有预案，还可能推动《反分裂国家法》的“再修法”或类似“执行条例”的补充立法。在大陆眼中，港台都已埋下爆炸力越来越大的政治地雷，日益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便利杠杆。台湾作为中美之间愈发尖锐的斗争焦点，应思考趋吉避凶之道，不要像香港“勇武派”那样犯战略性路线错误，一再冲撞大陆底线，陷入与大陆“搅炒”的陷阱，而应回归和平统一、“九二共识”的框架内争取生存发展之道。香港黑暴教训在前，在大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程中，台湾应“有条件还价时还请早”，否则，越是末路狂奔，越是彻底失败。本质上，台湾各界面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复杂纠结心态，是港台两地共处于一中框架下的“宿命纠缠”的具体表征，关乎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和台湾身份认同定位问题。

抗疫斗争胜利后两岸交流合作迎来热潮

■ 吴为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奖章，并就伟大抗疫精神进行了深刻阐述，宣告中国基本夺取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并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抗疫斗争的胜利，两岸交流交往渐趋热络，两岸关系发展也迎来新高潮，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同时，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两岸关系也面临一系列复杂严峻的挑战，道路并不平坦。还需发扬抗疫精神，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继续攻坚克难。

一、疫情稳定后两岸交流合作迎新潮

尽管民进党当局只顾一党一己之私，出于“台独”本性，加紧“倚美抗中谋独”，制造台湾社会对祖国大陆敌意对抗，千方百计对两岸交流活动阻挠设限，枉顾台湾经济民生发展需求及台湾民众对两岸和平红利的期待。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两岸一系列重要交流活动热络开展，有力打破了民进党当局图谋对岛内民众制造的“寒蝉效应”，也反映了两岸交流交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岸同胞的情感和利益联结不是任何政治势力可以切割、打断的。

多项两岸重要交流活动频密上线，掀起两岸互动新热潮。7月17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论坛以“弘扬中山精神 共谋民族复兴”为主题，在台湾地区设分会场，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各界2000多人参加，并举行“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中山杯”大湾区台企慢投垒球邀请赛、“孙中山文化史迹游”等系列活动，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在祖国大陆的最大规模两岸交流活动。

7月22日，“2020上海 - 台北城市论坛”以视频方式举行，论坛以“城市防疫 智慧经济”为主题，设置四个分论坛，沪台两地相互交流做法与经验，达成多项共识，是疫情以来两岸最引人关注的交流活动。面对岛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公开表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维持过去“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谅解”的说法，坚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展现维护两岸交流的积极态度。岛内各界和舆论对论坛的举行予以积极肯定，认为“双城论坛”搭起“两岸城市交流、突破僵局的桥梁”，对民进党当局妄图阻挠交流是一次沉重打击。国民党方面也积极表示要继续推动既有的两岸两党交流活动，在两岸关系上继续发挥能量。

8月15日，第八届海峡青年节在福建省举办。活动以“幸福、家园、梦想”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开展携手同心“战”疫、网红直播带货、人才交流、非遗文化传承、志愿服务等15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线下参与人数近千人，其中台湾青年近600名。活动分为“两岸青年幸福说”“两岸青年家园行”“两岸青年梦想汇”三大板块，持续打造两岸青年交流交融重要平台。岛内舆论认为，活动有力促进了两岸青年交流，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尤其是活动探索以“互联网 +”方式举办，为今后一个时期两岸交流互动开

启新的渠道和模式，将极大便利两岸同胞的沟通交流。

8月21日，2020年武汉-苗栗云端交流活动以视频连线方式在湖北武汉和台湾苗栗同步举行。活动以“山水相依 双城情深”为主题，是今年以来两岸首个县市级城市大型交流活动，也是国民党执政县市首次与祖国大陆有关城市开展城市交流。苗栗县县长徐耀昌致辞明确表示，“两岸本是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唯有在‘九二共识’和平架构上，加强城市交流合作，以人民福祉为优先，共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岛内舆论认为，徐耀昌的讲话再次重申“九二共识”，在当前岛内政治舆论环境下难能可贵。

国台办发言人宣布，第十二届海峡论坛于9月19日在福建省举办。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各项交流，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省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举办相关活动。论坛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30多场活动，吸引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线上线下参与互动。

两岸交流互动热潮的提升，一方面反映了祖国大陆在疫情防控稳定向好之下，展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和增长活力，对台湾经济吸引力持续增强，岛内工商界都普遍看好祖国大陆发展市场和发展前景。同时，祖国大陆也不断发挥各项政策叠加优势，落实落细系列惠台政策措施，协助台企复工复产，让更多台企台胞希望到祖国大陆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疫情影响下岛内经济陷入困境，尤其是民进党当局只顾操弄政治和民粹主义，不顾经济民生发展需求，让台湾经济更加陷入危险，台湾企业对祖国大陆市场的需求更加迫切。根据台湾有关部门数据显示，台湾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0.73%，是7个月以来首次负增长，也是2009年以来最差水平。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两岸交流活动还将持续发展，并且为台胞台企的发展带来更多利好，协助台胞台企走出疫情困境。

二、两岸关系发展是大势所趋，但仍面临各种挑战

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有必然的因素。一是中国大陆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走在世界前列，经济发展稳定向好，综合实力持续发展，同台湾地区陷入疫情的低迷状态形成鲜明对比。两岸全方位差距将不断拉大。二是两岸融合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两岸经济合作、交流互动巩固强化，两岸利益纽带将更加紧密。三是中美战略博弈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大陆始终不惧美国压力、不落下风，展现了坚强的实力和充足的底气，将让台湾充分认识到未来国际格局谁将成为更加主导的力量。四是祖国大陆始终展现坚决反对“台独”的决心和能力，对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产生强烈震慑，岛内谋“独”冲动将受到遏制。

也要看到，未来一个时期，两岸关系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态势，涉台国际因素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增大，美台勾连将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民进党“一党独大”格局持续，大肆操弄“渐进台独”“法理台独”，岛内分裂活动将更加猖獗。岛内主要政治势力将围绕台湾地区2022年“九合一”选举进行激烈博弈。两岸关系发展面临四个方面的变量影响。

一是涉台国际因素复杂多变，将成为台海方向最不稳定的变量。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加大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并向台海方向传导。美国实施全面遏华战略，加大打“台湾牌”力度，对台湾恩威并加，挺台站在与中国大陆对抗第一线，发展与台湾实质关系、帮助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炮制涉台消极法案等动作将更加频密。民进党当局加紧贴靠美国“谋独拒统”，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科技限制。

二是岛内谋求“渐进台独”“法理台独”的变数增大。民进党当局执政地位稳固，野心膨胀，加大推行“台独”分裂

路线，公然支持岛内大搞“渐进台独”“去中国化”，将在立法机构成立“修宪委员会”并图谋“释宪”“修宪”，指使“公审会”放水“涉独公投案”。“台独”激进势力借机推波助澜，营造岛内社会谋求“台独”氛围。

三是岛内各方围绕“九合一”选举激烈博弈增大政局变数。2022年，台湾地区将进行“九合一”选举，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是岛内政治势力重要竞选期。民进党“一党独大”格局持续，将利用执政资源和力量打压政治异己，谋取多数县市执政。但其长期执政容易出现贪腐、独断专权、绩效不彰等问题，党内派系围绕选举利益分赃和争夺将更加刺刀见红。国民党对抗民进党的能力有待增强，作为在野党争取民意支持的力度仍需强化，维持现有多数执政县市局面的挑战增大。台湾民众党和柯文哲维持岛内第三势力的影响力，但面临民进党排挤的压力升高。

四是台湾社会分裂倾向与岛内“不敢独、不能独”整体认识冲突对撞，民意分裂变数增大。民进党执政不断“绿化”台湾社会，加大操弄“抗中拒统”，制造与祖国大陆对立对抗，增加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疑虑误解和对两岸统一的抗拒。同时，民进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希望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岛内经济界看重祖国大陆疫情恢复后的巨大市场，这些都有利于岛内民意的积极发展。

三、广大台湾同胞和台企到祖国大陆发展前景可期

无论面对怎样复杂的形势，祖国大陆始终敞开怀抱欢迎台胞台企赴陆发展，同时也做好了各项积极准备。未来台胞台企在祖国大陆的发展将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中国大陆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将为台胞台企在祖国大陆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和条件，将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广大台胞台企谋福祉、促发展、获红利的良好时期。中国大陆在世界范围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困难的形势下逆势成长，率先走出疫情困境，展现强劲的复苏动力，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和动力源。中国大陆经济运行呈现恢复性增长和稳步复苏态势，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持续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现正增长的只有中国。

两岸深化融合发展是两岸同胞特别是广大台湾同胞的现实需求，也是新时代造福两岸同胞的重要途径。几十年来，祖国大陆始终是广大台湾同胞投资兴业的热土，举世瞩目的发展为广大台湾同胞提供了巨大机遇。祖国大陆将继续为更多台湾同胞赴陆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热心服务。祖国大陆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率先走出疫情，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祖国大陆政治和治理体系的优势，以及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更加凸显。

当然，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出于政治私利，眼里容不得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见不得台湾同胞同祖国大陆关系紧密，企图阻挠干扰两岸交流交往，肆意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敌意，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这是极不得人心的。越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两岸同胞更应立足新时代，同心协力，克难前行，紧紧围绕共同的利益福祉齐力奋斗、做大文章，破除种种困难和挑战，共同谱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繁荣昌盛的华美篇章。

携手维护生物安全共同利益 共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 王子旗

生物安全为生命之本、发展之基，事关世界人民福祉、人类前途命运。当前，大规模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物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具全球性、整体关联性、超意识形态性等特点，需要各经济体、国际组织及社会力量等共同参与，凝聚合力。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不断加深，双方利益的交互日趋频繁，两岸间共同利益也不断扩大。两岸双方在当前政治背景下，维护与拓展自身利益不应再局限于零和博弈，更应关注基于共同利益的正和博弈，互利共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疫情肆虐，两岸携手势在必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物安全风险已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狭义上的生物安全风险主要指，人类在科学技术研发及应用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广义上的生物安全风险还包括，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所遭遇的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人类遗传资源及生物资源流失、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威胁等。生物安全无处不在，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密切相关，从疯牛病、禽流感、非洲猪瘟到“非典”(SARS)、H7N9流感、埃博拉病毒，相信许多人都记忆犹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再次凸显生物安全共同治理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全球化背景下，生物安全威胁已跨越地区和意识形态界限，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独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台湾也不例外。当前，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与合作，加强协调合作、完善生物安全共同治理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携手维护生物安全，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保持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增信释疑，是两岸同胞应对重大生物安全威胁的必然要求和唯一出路。

同根同源，两岸属于“命运共同体”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祖国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维护共同生物安全利益符合两岸同胞利益。一方面，维护遗传基因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不同人种、民族及个体间的基因组差异，是研究人类进化、民族禀赋差异、基因诊断与治疗等领域重要依据。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共同的遗传基因库，维护中华民族遗传基因资源安全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另一方面，保护生态及物种多样性。台湾与福建在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和群落分布等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加强对生物资源采集、保藏、使用等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共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责任。

无私之爱融化两岸隔阂，传承凝聚人心。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台湾同胞积极捐款捐物合计达70.5亿元新台币，同时民间力量台湾救援队首次进入祖国大陆参与搜救，凸显生命救援没有政治阻隔。此后，两岸进入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实现“三通”，而且在观光旅游、贸易投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实现历史性突破，增进两岸间理

解与情感交流。新冠疫情爆发后，广大在陆台胞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慷慨解囊，配合做好居家医学观察，更有一批台籍医生战斗在防疫一线，戮力同心，并肩作战，守卫共同的家园，为“两岸命运共同体”写下新故事。当前，祖国大陆已有效控制疫情，正在全面推进复工复产，不断释放政策红利，继续与广大台胞共享发展新机遇。

两岸生物安全合作已在不同层面展开。一方面，两岸已经签署了部分领域的专项协议，如《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海峡两岸农产品检验检疫合作协议》等。另一方面，近年来祖国大陆在促进两岸生物安全合作、保障台胞福祉方面已有政策安排，为台胞参与维护两岸共同生物安全利益提供了政策依据。如“惠台31条”规定，台胞可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入祖国大陆经济、科技等专业性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等；“惠台26条”规定，台资企业可参与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检测评定等。

两岸合作，凝聚更多利益交汇点

明晰生物安全共同利益汇聚点是两岸合作共赢的起点。两岸在互动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一方的利益损益牵涉另一方在同领域内的损益，从而形成双方利益的交互博弈，其中利益趋同的部分即为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讲，共同利益是自身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一家人，面临着共同的生物安全威胁。面对新形势，两岸应在已有的交流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排除政治干扰，消除政策障碍，积累共识，深化合作，肩负起共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责任。

加强生物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工作交流与合作。随着两岸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各种潜在风险和安全隐患也在增多，因此提升两岸民众的生物安全意识尤为必要。两岸可就针对不同群体的生物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工作加强沟通交流，创新工作方式，提升两岸密切接触群体的生物安全意识和伦理意识。

强化两岸货物贸易合作监管力度。据统计，2019年两岸货物贸易额约1906亿美元，占台湾地区对外贸易总额31%。两岸可建立健全涉两岸生物安全相关产品名录和清单，重点加强对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生物毒素、外来物种等高风险货物产品的检疫合作，对高风险人员、运输工具、货物等采取严格防范措施。此外，加强两岸生物技术等相关产业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标准共通，共同探讨货贸安全管理机制。

拓展两岸中医药合作领域。传统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有着特殊功效，减缓、阻止重症向危重症转化，促使危重症转为普通症，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历史上，中国有300多次大型疫病流行，中医经典典籍如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等都是源疫病治疗，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疫病防治经验，如清肺排毒汤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有效率在90%以上，已被纳入第六版、第七版诊疗方案中；国家药监局已批准将治疗新冠肺炎纳入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颗粒和胶囊、血必净注射液等“三药”的药品适应症中。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中医药学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好用管用，且经济易行。两岸在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一直保持着传统特色，可在重大传染病病机分析、辨证治疗、处方拟定、康复治疗等领域加强合作，探讨并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中医药，开创两岸中医药合作互利双赢新局面。

加大灾后经济、社会、生态恢复重建合作范畴与力度。重大突发传染病等灾害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还严重损毁灾区公共服务设施及生态环境。经济层面，加大在电子信息、机械等优势产业的合作力度，稳定两岸供应链，减少灾害对双方经济的冲击；社会层面，加强社区建设、社会工作介入、心理健康辅导等领域合作，使个体、家庭、社区、社会逐步恢复自我组织与自我发展活力；生态层面，就灾区生态环境重建模式选择、

必须构建和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

■ 王正智 刘江永 彭敏

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在于政治话语的较量。台湾大选及蔡英文就职讲话折射出“台独”话语泛滥问题值得重视。构建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必须改变以往国民党在台湾当政时期两岸交流思维模式，面对未来4年执政的民进党，在政治话语方面要旗帜鲜明，确立主动、主体、主流意识。要通过巩固和加强台湾和祖国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认知，强化中国主权不容分割的意识，重构关于台湾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及两岸统一与国家安全的政治话语体系，有效遏制“台独”话语泛滥蔓延的势头。

一、构建和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十分紧迫

2020年1月11日，一场4年一度的选举在台湾再度掀起政治波澜，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获得约817万票，得以连任。对祖国大陆而言，这只是一次台湾地区的地方行政首长选举。只不过，选举在台湾岛内被冠以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名头，而主张“中华民国”版图包括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国民党败北，主张“中华民国台湾”而不含祖国大陆的民进党胜出而已。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会形成导致两岸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也不可能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虽然岛内选举只是中国地方行政领导人的直接选举，但值得关注和重视的是，获得大胜的蔡英文似乎被胜选冲昏头脑，不断说出一系列自欺欺人的“台独”话语，挑战一个中国底线。在新形势下，如何构建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过去，中国共产党与在岛内当政的国民党，求同存异达成“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维系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然而，蔡英文胜选后，刻意标榜所谓“中华民国台湾”，鼓吹台湾是

实现途径等展开交流与合作，为灾后生态恢复与保护工作提供指导与参考。

共同开展对日本遗留在华生化武器的调查与安全处置。抗日战争时期，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持祖国人民抗战，与祖国大陆同胞一道迎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民族荣耀。中国军民在抗战期间因遭受日军细菌战和细菌实验而死亡的人数高达数十万人，由于日本至今未向中国提供有关遗留在华生化武器埋藏和丢弃的具体资料，时至今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毒害仍在继续。抗战胜利是由两岸同胞携手缔造，两岸可考虑解密、交流相关历史档案资料，发掘有用线索，利用高科技手段共同开展对中国大陆境内日本遗留在华生化武器的调查与安全处置。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台湾同胞，维护两岸生物安全共同利益同样离不开台湾同胞。生物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根据自身眼前利益对其他经济体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大家的共同安全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面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两岸必须团结起来，以科学战胜愚昧，以合作抵制偏见，共同捍卫中华民族及两岸的共同利益、共同安全与共同财富。

“主权国家”，丝毫没有介意能否与祖国大陆达成共识。既然如此，祖国大陆何必再考虑蔡英文当局或岛内社会是否接受呢？主动构建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恰逢其时，是遏制“台独”话语的不二选项。

关注岛内选举，与其在意其结果，不如认真研究选举中各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的政治话语。岛内选举的政治用语本身就在潜移默化地制造所谓“主权国家”的选民意识，从祖国大陆角度看，就是“分离主义”或“台独”意识。蔡英文当局借选举获胜之机，推出“中华民国台湾”的虚构概念，就职讲话中大谈台湾的“主权”与“国家安全”，不接受“九二共识”，目的就是在岛内外制造台湾是“主权国家”的印象。类似的岛内政治话语还有所谓“台湾大选”、“台湾总统选举”、“九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及其竞选团队，也不时把“中华民国总统”，以及“维护台湾主体性”挂在嘴边，如此等等。岛内这种自欺欺人的政治话语一波接一波，得寸进尺，频频冲撞一个中国政治底线，远比选举结果本身对两岸关系影响深、危害大。即便韩国瑜当选，他和国民党也不会与祖国大陆谈统一。只不过，国民党并未和祖国大陆完全切割，不会采取进一步分裂祖国的做法，而民进党则主张切割海峡两岸，通过美国和日本的外力干预谋求“和平台独”，加剧两岸的政治对立。

二、构建和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任务艰巨

话语关乎舆论，影响民意。岛内所谓“天然独”，实际上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政治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他们在4年一次的岛内选举语言熏陶下，政治身份认同发生递进式变化，对祖国大陆的认同趋于淡化。岛内有人说，台湾的“嘴炮”最厉害，蔡英文就惯于自欺欺人地发射“台独”“嘴炮”。其中，既有老调重弹，也有铤而走险、自相矛盾的新说。蔡英文言必称“民主自由”，却通过所谓“反渗透法”限制海峡两岸民众自由交往的民主权利。口称“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实则偷换概念，企图以其在台湾省内选举中获得的817万张选票代表2300万全体台湾同胞的民意，并剥夺祖国10多亿人民在决定两岸关系前途问题上的民主权利。支持香港打、砸、烧等破坏公物私产及社会秩序的暴力行为，污蔑并反对“一国两制”的法制社会，这些都是对自由与民主概念的亵渎。口口声声奢谈保卫“台湾的安全”，实则与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明里暗里相互勾结，给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制造不安全因素，里通外国，危害祖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有个会变作美女、老翁并花言巧语讨人怜悯的女妖白骨精，为吃唐僧肉而诬陷保护唐僧的孙悟空，但终归逃不脱孙大圣的火眼金睛，原形毕露，遭到报应。对于“台独”势力的话语骗术，海峡两岸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人不能当唐僧，而要学做孙悟空。构建反“独”促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就如同孙悟空降妖除魔要取的真经。

三、构建和完善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内涵丰富

有利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涉及面宽、内容广泛，且层次多、影响大、针对性强。必须把握关键，在以下核心内容上着力用劲。

第一，巩固和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共同认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大量的史料文献、历史遗存铁证如山，是不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远的不说，历史上，海峡两岸作为中国的版图，曾同属明朝和清朝中央政府统治。台湾原住民与族籍在祖国大陆的各地同胞共同开发建设了宝岛台湾。只是在1895年至1945年，台湾曾因甲午战争后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天皇和政府接受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1943年《开罗宣言》的规定，“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并宣告：

“此次受降典礼……已顺利完成，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中国政府完全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和行政管辖的权力。但因国共内战，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败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正统中央政府，而台湾则因国民党当局沿袭“中华民国”的行政统治和政治话语体系，而使海峡两岸处于实际未统一的状态。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后，试图从根本上扩大并固定两岸裂痕，对中小学教材和历史课纲尽管作了篡改，但在历史真相面前是苍白的。即便根据台湾关于两岸的法律文书包括宪制性规定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性质和领土主权范围，也是不容分割的。任何推动修法，搞“法理台独”的图谋也是同样不能得逞的。

第二，巩固和强化中国主权不容分割、台湾绝无所谓“国家”主权和地位的认知。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国家概念400多年来，在国际法上，国家主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对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务的最高决定权和外交方面排他性的自主权。一个国家的主权既不容别国侵犯或干涉，也不容本国地方政府或分裂势力分割和挑战。例如，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曾经出现地方军阀混战，某些军阀暂时控制了某个地区或省份的控制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国家的主权。今天的台湾也不例外。据《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对“主权”一词的解释，“在国际法上，法律上的国家是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而没有主权的国家就不是一个国际法上的国家”，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法的国家行为主体。因此，国家与主权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国家是一个整体，主权也必须是一个整体。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后，自然可以共享国家主权，但在未统一之前则不可分享或分裂国家主权。

第三，巩固和强化对岛内政治话语有违法理的认知。迄今，在台湾岛内的政治话语中，既有国民党的政治话语，也有民进党的政治话语。这些话语有些差异，但都不利于祖国统一，甚至加剧分离。例如，国民党怀抱的、民进党表面维持的所谓“中华民国”，其实一开始就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建立的第一个共和政府。这个政府曾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东江支队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光复台湾。然而，战后由于国民党上层要消灭共产党，国共内战导致两岸未统一至今，实属遗憾。身居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长期把在祖国大陆失去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自我认定为“国家”，而民进党又进一步把这个所谓“国家”的概念解读为“台澎金马”，即“中华民国在台湾”，前不久蔡英文又简称“中华民国台湾”。这就又犯下历史性错误。其实，台湾是中国一个最大岛屿的名称。从国际法角度看，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诞生之日起，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便不再具有中国正统政府的合法地位。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实现了对中华民国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继承，不仅在祖国大陆建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体系和法律制度，并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在联合国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席位，在国内外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历经数次改朝换代和政府名称变更，而中华民族血脉相通延续至今，中国历尽磨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未来中国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决定。包括统一后中国政府的称谓在内，都可以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协商解决，但决不允许打着“中华民国”旗号，制造分裂祖国的政治话语，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过去，民进党蔡英文之流宣扬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的“两国论”，混淆了国家与政府的不同概念，是分裂祖国的一种谬论邪说。如今，蔡英文又利用选举，借“中

华民国”的壳上市，连任后张口闭口大谈“台湾主权”或“台湾主体性”，纯属自我拔高，又在变相地搞“两国论”。台湾的选举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所谓的“大选”或“国家选举”，只是一项地方领导人的直接选举而已。

第四，巩固和强化关于台湾省概念的归位。不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两岸人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等，都证明台湾和祖国大陆是一个整体。中国自明清两代的历届政府，曾在台湾先后建立行政机构，行使主权管辖。台湾和祖国大陆人民曾英勇抗击荷兰、法国、日本等外来入侵者。1722年，清政府在台湾开始设立巡台御史，曾派官员黄叔璥、吴达礼巡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1885年台湾建省。尽管在19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的台湾等地，但在二战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范围包括台澎金马及钓鱼岛等附属岛屿。正因目前海峡两岸尚未实现统一，作为政治话语更有必要强调中国疆域版图下的台湾省概念，防止“台独”势力把台湾省的概念膨胀扩大成“国家”概念。具体来说，关于台湾岛内政治话语中的选举、职务、机构等称谓和定位应符合台湾省地位，而不承认不接受任何可能引起所谓“国家”或“主权”错觉及误导的任何说法。例如，所谓“台湾大选”“总统选举”应称为“台湾省内选举”“台湾省行政长官选举”或“台湾省首长选举”；所谓“九合一”选举应称为“台湾省内县市长选举”；所谓“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总统”“副总统”应为“台湾省领导人”“副领导人”；所谓“行政院长”应称为“台湾省行政官”；“台湾立法院”称为“台湾省议会”；“台湾国防部”称为“台湾省军事部门”；其他所谓“部”，以此类推，“中华民国外交部”称为“台湾省外事办公室”。这些不需要台湾接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中国台湾省正确称谓相关法令》，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向国内外宣布即可（附有中文繁体字和相应的英、法、西、阿、日、韩等多种文字）。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所在国中央及地方政府通报，对此后仍在正式场合或主流媒体使用不当用语（例如，把中国海峡两岸关系错误地说成“中台关系”）的对象国，保留提出交涉的权利。

第五，巩固和强化两岸统一与国家安全的政治定位。关于和平与安全，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同胞有共同利益诉求。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同样适用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和统一后两岸的安全利益需求。事实上，台湾任何政党都不敢丢掉和平、安全这两个关键词。蔡英文胜选，与抓住岛内选民向往和平，关注“台湾安全”，借“香港乱局”煽动反共仇中情绪，炒作所谓“芒果干”（亡国感）有很大关系。蔡英文指责祖国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是对台湾的威胁，并继续联手美日对抗祖国大陆，其实质是要搞“和平独立”。目前，海峡两岸实际处于“未独未统的和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次台湾选举都是一次政治话语的新闻传播与心理导向过程。岛内选举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政治话语的展示平台和试验场。选举前后，蔡英文刻意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已经“独立”、“台湾主权独立”等，看似竞选语言或胜选感言，实质上是打向祖国大陆的政治话语炮弹，并将得寸进尺，继续不断地打下去，直至占据岛内外话语优势，特别是通过世界各国媒体高度关注台湾选举结果之际，抢镜头，争话语权。针对蔡英文制造台海危机，渲染祖国大陆对台“威胁论”，祖国大陆同胞要力避感情用事，在客观上为蔡英文提供话语炮弹。要坚持两岸一家亲的前提是两岸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有保卫台海和平与台湾安全的权利与义务。为保卫台湾的安全，祖国大陆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和军队作战与救援能力，不放弃使用非和平方式维护台湾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美国总统选举大打“中国议题”和“台湾牌”

■ 曾晓栩

8月20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代表民主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在11月3日大选中与特朗普对决。受新冠肺炎疫情、经济状况不佳，以及由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的黑人抗议和种族骚乱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特朗普选情由稳赢变得艰困。目前，美国多家媒体民调显示拜登领先，尤其是在几个关键摇摆州，如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西法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佛罗里达州。据《纽约时报》报道，虽然特朗普热情的草根支持者小额捐款数量不小，但是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争议行为导致其支持率下降，一些最富有的共和党人推迟、转移或减少了他们的捐款。而一开始落后的拜登竞选团队的筹款活动，最近以创纪录的速度充实了自己的“金库”。联邦文件显示，为拜登和民主党设立的联合筹款委员会近几个月来获得了相当多笔金额超过50万美元的捐款，筹集了大约1660万美元。拜登大幅削弱了特朗普的财务优势。疫情影响之下，两大党都不能举办大型造势活动，这也会影响到最后阶段的选民动员。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变数还有不少。

以往美国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仅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话题之一，但今年却成为两党重要拉抬选情打击对手的选举工具。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对“中国议题”的态度成了主要议题之一。目前，两党都在抢夺“谁比较能够对付中国”的议题主导权，甚至互相指控亲中。

一、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强打“中国议题”转移执政压力拉抬选情

特朗普打“中国议题”转移国内矛盾。特朗普强打“中国议题”，向中国“甩锅”，共和党的竞选策略明确把中国视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把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而激化的社会矛盾引导转化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愤怒。

特朗普自2017年开始执政以来，将中国树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持续收紧。从白宫到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基本已不存在部门分歧。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将美中对抗定调在制度之争与价值之争。近来，特朗普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纷纷发表公开演讲，不遗余力进行政策宣示。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 在亚利桑纳那州凤凰城的演说，题为“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全球野心”；7月7日，调查局局长瑞恩 (Christopher Wray) 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国与中共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之威胁”的演讲；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发表被称为新铁幕的演讲，直指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体制。7月24日，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在《华尔街日报》发文，称“对抗中国，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好了”，要求盟友及合作伙伴与美国站在一起，对抗中国，捍卫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议题”的炒作更加恶劣。与以往着重炒作中国经济模式对美国经贸收支平衡、制造业回归、民众就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相比，在选举期间通过散布、造谣有关中国抗疫的不实言论，更能有效激发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转嫁国内危机的同时，为美国政府后续出台更加激进的对华举措造势预热。

二、拜登及其竞选团队在“中国议题”上转趋强硬

拜登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2019年4月，拜登在宣布参选不久后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引来不少批评。随后口风一转，强调“美中正在竞争，对华需要强硬”。2020年4月，拜登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表示“中国是特殊的挑战”，对华应更注重在恢复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的基础上，强化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从多边层面展开对华竞争布局，并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交融点寻求对华合作。

4月3日，美国100多名前官员及学者就新冠疫情发表声明，认为中国有责任“回答其对新冠肺炎反应的问题”，署名人中不乏民主党前官员，包括了前国防部部长赫格尔(Chuck Hagel)、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国务院前副国务卿伯恩斯(William Burn)、前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海恩斯(Avril Haines)、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苏利文(Jake Sullivan)、以及前国防部副部长佛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等。而这其中在民主党中许多担任过要职的人物，如布林肯、苏利文、赖斯、萨曼珊·鲍尔(Samantha Power)、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唐尼伦(Tom Donilon)，纷纷加入拜登竞选团队。随着选战的深入，这些持对华接触观点前官员的态度都有所变化。如布林肯表示中国构成了一系列新挑战，而中国的商业与经济做法很难令美国能再持续维持对华现状。拜登任副总统时担任其国家安全顾问的苏利文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正在通过军事竞争及影响力扩展塑造全球霸权。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投书媒体，指中国在香港的政策及权力扩展令人担忧。前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批评特朗普裂解美国同盟、背弃美国在国际体制的领导地位，在国际场域上留下权力真空，使中国得以趁虚而入。

由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和拜登团队采用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吸引中间选民的竞选策略，拜登有可能在涉华问题的议程设置上同特朗普适当拉开距离。拜登可能通过重视盟友关系和强化人权等意识形态相关议题，展现一个不同于特朗普民粹主义相对理性的“智者”形象。但是随着选举竞争激烈化，拜登对华立场慢慢出现了变化。特朗普竞选团队不断拿拜登亲中立场做文章，说中国最期待拜登当选。炒作拜登“对华软弱”，称中国急着想让“瞌睡虫拜登(Sleepy Joe Biden)”赢得总统大选。拜登团队则指责特朗普“示好中国”以作反击，同时，拜登在言辞上也开始尖锐批评中国，在中国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之后，拜登发布声明将禁止美国企业参与中国在当地监控及侵害人权的行为，倘若在港美国人言论自由遭剥夺会支持加快对中经济制裁行动。

三、拜登与特朗普在“中国议题”上的不同之处

一是拜登反对特朗普将疫情应对不力的责任“甩锅”中国，要求特朗普自己负责。

二是拜登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反对中美经贸“脱钩”，认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做法是失败的，需要全方位调整经贸谈判策略。在策略上，拜登对华强硬，更多通过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批评来体现，而非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对冲突风险的容忍度低，拜登、贺锦丽都曾批评中国掠夺性贸易手段，但反对以可能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因应。拜登自参选以来已多次指责特朗普“输掉对华贸易战”，让美国经济受伤更重。

三是拜登更重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形象，会在大选中推动美国战略界反思特朗普时代的外交策略，推动美国适当回到传统外交套路中来。为降低风险，民主党偏好求同存异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整体外交政策不依赖军事吓阻，主要以透过外交手段解决。

由此可见，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在对待“中国议题”上并没有本质差异，不同之处仅在

对付中国的策略上。如果拜登胜选，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态势不会变，但打法上会有变化，会更强调价值观的作用，注重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借助盟友的力量编织新的对华“战略包围圈”。而共和党方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指出：“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正在利用中国问题来提高他赢得选举的可能性，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还有其他目标。他们似乎希望锁定与中国的战略和制度对抗，这样一旦拜登当选，政策也不可能改变。”曾担任奥巴马白宫高级助手的麦艾文表示：“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的是，针对中国的这一连串惊人举措是由一伙对华鹰派人物所驱动的，他们担心特朗普在11月选举中落败，正在设法捆绑下一届总统的对华政策。”无论谁胜选，美国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改变，应对“中国挑战”将是下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四、民主党及拜登的两岸立场

拜登曾长期支持对华接触对台策略性模糊政策。民进党已故民意代表蔡同荣曾经在媒体发表文章回忆，在推动“台湾安全加强法”时，2000年2月美国众议院压倒性通过后，送到参议院却遭到拜登强烈反对，最终未能正式立法。后来蔡同荣和彭明敏到美国拜见拜登时，拜登表示美国对台湾要采取“模糊政策”。2019年5月，拜登更抨击特朗普的对中贸易战，质疑特朗普夸大中国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威胁，强调中国“不是我们的竞争对象”。台湾因此把拜登归为对台立场并不友善。

拜登核心竞选团队部分主要幕僚友台。目前，拜登团队里的几位核心幕僚，如曾任国务院及白宫高阶官员的布林肯及麦艾文，2015年与当时身为台湾大选候选人的蔡英文会面，被视为美台关系的一大突破。2020年4月，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公开表扬台湾在遭世界卫生组织排挤时，仍能防堵新冠肺炎的成就。另一位幕僚、前国防部副部长佛洛诺伊在国会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听证会上，建议美国应“探索台湾取代中国大陆在供应链地位上的可能”。麦艾文认为，美国与其和台湾达成几十上百亿的军售案，不如和台湾合作，发展不对称军力、改革后备及动员体系，并低调地与印太区域如日本等有力盟友强化战备。

民主党最新版党纲删除“恪守一中政策”条文。8月18日，美国民主党通过最新版党纲。根据民主党党纲委员会提交党代表审议的2020版党纲内容显示，民主党将以美国国家与盟友利益为指引，并以清楚、强硬及一致的方式，抵抗引发经济、安全及人权深度关切的中国政府行为。民主党对华政策不会诉诸不利己的单方面关税战，或是让自身陷入新冷战陷阱，这些错误只会放大中国的重要性、过度军事化美国政策，并伤害美国劳工。“民主党认为中国的挑战并不主要在于军事，但我们会威慑并对侵略做出回应。我们将强调我们对全球自由航行的承诺，并抵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恫吓。”

与2016年版本相比较，2020年新版党纲涉及台湾部分删除原有的“恪守一中政策”，但仍保留民主党“信守对‘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并支持两岸议题以符合台湾人民期望及最大利益的和平解决”等相关内容。2016年版本的党纲是：“我们恪守对一个中国政策及‘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也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与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

对这一变化，蔡英文当局欣喜若狂，立即表态，台湾“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均维持长期友好的关系”“民主党再度在通过党纲时列入友台文字，充分彰显民主党对巩固台美关系与台海和平的高度重视，也彰显民主党各方人士长期对我国的深厚友谊，极具正面意义”。

8月20日，台湾外事部门发布新闻稿表示，“目前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美国202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18日通过民主党党纲，在涉及亚太区域部分提及台湾，重申民主党承诺履行‘与台湾关系法’，并将持续支持符

特朗普政府美国智库台湾问题研究分析

■ 刘柳

特朗普上任后，起初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摇摆不定，一面打破惯例公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不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挑战中美关系底线，另一面又在2017年初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表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2017年年底，美国对华定位出现重大变化，公然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修正主义国家”，提出要在各领域打压中国，美国开始在台湾问题上连续对华发难，美国国内持续出现一系列不利于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消极动向：包括批准向台湾出售尖端武器，允许美国海军船只常规性停靠台湾港口，通过所谓“与台湾交往法”“亚洲再保障法案”“国防授权法”“台北法案”等，这些动作对台湾海峡乃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和中美关系构成严重威胁。拥有大量专业人士、加之与美国政府关系非同一般，美国智库的台湾问题专家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决策。面对特朗普政府一再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的种种行径，美国智库态度比较复杂。

一、美国智库加大台湾问题研究力度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遏制力度持续加大，表现之一是美国打“台湾牌”力度与频度空前繁密，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渐成为美国智库涉中美关系研究的核心议程之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舆情智能分析中心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美国主要智库涉台研究报告3384篇，远高于特朗普前任奥巴马执政时期。2017年以来，美国智库涉台研究报告数量呈逐年递增，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学界面对持续紧张与频繁动荡的中美关系，认知与反思对华政策过程中加大了对台湾问题的关注程度。鉴于美国多位台海问题学者在两岸关系议题上往往

合台湾人民期望及最佳利益的两岸议题和平解决方案。对于美国民主党在党纲中再次明确表达坚定支持台湾，表示欢迎与感谢”，并且强调“未来将持续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密切合作，稳健深化奠基于共享价值的台美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五、中国需要明智应对“中国议题”避免成为美国的选举工具

十年来美国国会的党派化十分严重，但基于台湾的战略意义、美台共同的价值观与经济联系，以台湾为棋子打“台湾牌”遏制中国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具高度共识的议题。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投入和游说，台湾在美国发展的友台网络包括美国国会、国防部、商务部及其他利益集团，这些台湾背后的操纵者会持续推进“挺台”举措，并不会因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而减少。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淀，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同时，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坚定明确的立场，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干涉，不会在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向美国妥协。同时，中国需要明智地应对美国选举期间针对“中国议题”对华掀起的新攻势，避免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工具，避免对美关系落入“对抗陷阱”。

是美国政府的咨询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帮美国政府传话，需要密切关注美国智库台湾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特点。

二、美国智库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特朗普上任以来，纵观美国主流台海问题专家的观点，对于两岸关系发展及美国在台湾问题立场的主流判断是：美国应该持续“施压”中国大陆采取弹性做法恢复两岸对话；美国应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应展现支持台湾的态度与立场，推动常态化军售等方式强化美国对台军事支持，拉拢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加大“国际参与”。

建议美国政府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面对特朗普上任后频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种种行动，美国智库多位台海问题专家表示，美国不应贸然改变“一中”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来仪称，美国对台政策若突然改变将会影响两岸关系稳定，美国“一中”政策是美中关系基石的一部分。2019年2月，美国亚洲协会发布题为《修正路线：迈向有效且永续的中国政策》报告，17名学者组成的美中政策工作小组指出，美国对台政策清晰与连贯将格外重要，美国不要贸然改变“一中”政策，应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维护台海稳定，报告警告称任何使美国对“一中”政策承诺受质疑的象征性或实质举动，都将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不必要摩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2020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到，美国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应对台湾表明绝对不会在台湾挑衅走向独立时进行驰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克维尔、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教授哈尔·布兰兹等均认为，美国应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强力规劝台湾不要采取“台独”步骤，而且不加强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但是，也有美国学者发出不同声音，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卜大年认为，“一中”政策是冷战时期美国联华制苏的产物，现在应对政策的部分内容再思考。

鼓噪美国应多层面强化“台美关系”。近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这与美国智库界在台海问题上的主流主张与观点极为相似，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智库在向政府“推销观点”过程中的较大能量。“改善美台关系”“支持台湾”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台海问题学者比较一致的共识，他们建议美国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层面，为台湾当局“提供支持”。葛来仪称，美国“应联合其他理念相同国家声援台湾，通过纳入第三方把美台双边合作平台转型为多边性合作平台”。但她警告美国政府，“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性质不可改变，以免危及台湾安全”。哈尔·布兰兹称，美国主张维持台海现状的同时，应鼓励亚太盟国发展对台关系，以此在“外交”上和经济上强化和台湾的关系。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共同主任卜睿哲等多名美国学者均认为，美国多管齐下强力支持台湾，允许美台高层官员互访，与台湾探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强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包括常态化军售，考虑与台湾举行联合军演等。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分析师蔡斯称，美国应清楚发出支持台湾的信号，包括协助台湾扩大国际参与、与台湾发展多元化经济关系，启动美台贸易协定讨论等。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经济与科技政策分析师莱利·华特斯认为，美台应该建立部长级高层经济对话，由美国贸易代表及商务部部长和台湾的对口官员就彼此关注的议题进行交流，以化解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非市场因素影响。

暗示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不屈服不挑衅”态度。2017年以来，美国官员不断释放要求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进行对话的信号，美国智库学者也多次表态希望台湾当局改善两岸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台湾当局应持续目前避免挑衅的做法，谨慎处理可能被认为是“去中国化”的议题。美国前驻华大使、美国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荣誉创始所长芮效俭称，台湾不应完全依赖美国保证自身安全，而要通过处理好两岸关系管控风险。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戴杰称，面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施加压力的局面，台湾当局应采取一直以来的因应手段即不屈服、不挑衅。他还建议台湾应多方切入以保持和美国的紧密关系，并在美国“广交朋友”，壮大国会中的“友台”力量。

抛出台湾应服务美国利益以实现美国对华诉求的观点。多位学者在文章中露骨地谈到在当前中美对抗大势面前，台湾对美国的价值有所提升，在牵制中国大陆发展方面，台湾有重要角色可以扮演。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指出，特朗普政府相信，让台湾站在自己一边是用来遏制中国大陆的一笔资产。特朗普政府以“台湾牌”作为打击中国大陆及限制其影响力的武器，把台湾视为可以在商业谈判中用来交易的筹码。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预防行动中心助理主任威尔森称，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台海地区稳定、维持对台湾安全的长期承诺，以此可以推动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其他目标的实现：包括赢得贸易战、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宣示。夏威夷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宣称，中美两国竞争及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宣示的目标，提高了台湾对美国的价值，台湾有潜在角色可以扮演。今年4月，在美国大肆污蔑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成绩时，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齐亚尼斯竟然宣称，为应对中国“掩饰疫情”，美国甚至可以考虑把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对抗手段。面对美国智库界抛出的种种“台湾棋子论”，美国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称，台湾现在同时面临美国将其“套进去”和将其“抛弃”的双重风险。她认为，台湾可能被美国“武器化”，即变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华工具，而白宫似乎把这看作是一个选项。但是一旦特朗普认为可以与中国大陆达成交易，台湾可能随时被抛弃。

三、美国智库台湾问题研究特点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美国智库台湾问题研究主要观点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国学界对于台海问题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维护美国利益是第一且唯一出发点。不论是警告美国政府不应轻易改变“一中”政策，还是对台湾当局提出“不屈服不挑衅”要求，美国学界在台海问题研究上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撰文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除了台海双方有责任外，美国也应扮演重要角色，而最重要的是对美国利益不要造成损伤”。同类观点多次出现在美国学者的分析报告中。2019年，台湾“独”派色彩鲜明的“喜乐岛联盟”总召集人郭倍宏公然宣称要“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并推动台湾当局修改“公投法”，这一动向迅速引发美国智库高度关注。卜睿哲立即在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官网发文对“台独”势力触碰红线敲响警钟。他指出，“喜乐岛联盟”的动向“触及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对台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持久利益，以及台海两岸都不应片面试图改变现状的长期观点”，“如果大陆认定这是台湾在搞分裂从而以非和平手段回应，就会涉及美国对台防卫承诺”。

智库与政府官员紧密配合为美国特定势力渔利制造舆论。特朗普上任以来，几乎每年美国智库都会掀起一波强调“台湾危险”的舆论浪潮，其中美国防务智库兰德公司、专注于亚洲问题的“2049计划研究”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2017年10月，兰德公司在题为《重新检视与中国的冲突》报告中说，“台海是美国和中国大陆可能爆发冲突的区域。根据目前解放军现代化的进程，美国协防台湾的难度越来越大”。2018年2月，兰德公司再度发布报告分析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称“由于中国大陆持续进行军事投入，并且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双

方的胜算天平正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智库发布报告的同时美国政界人士也相继访台，鼓励台湾在军购态度上进取一些。蔡英文过境美国夏威夷时，也被美国政界人士暗示要提高用于军购的财政支出比例。“2049计划研究”研究员易思安近几年通过出版专著、投书媒体等形式，持续渲染中国大陆攻台威胁，鼓吹美国增加对台军售。除炒作“两岸军力失衡”论调外，美国学者还抛出“和平统一无望”论调。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薄瑞光2019年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研讨会上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疏离过大，台湾的不认同感太过强烈，已经“不可能看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一个和平的统一”。卜睿哲在题为《从劝说到胁迫：北京对台手法和台湾应对》报告中指出，“如果民进党2020年以及2024年继续连任，将表明台湾民意出现支持民进党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两岸统一之门正在关闭”。美国学界抛出的“两岸军力失衡论”“和平统一无望”论调，有蓄意挑起两岸对抗、加剧台海形势紧张，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寻找借口的意图，其为美国军方和军工企业介入台湾从中渔利提供所谓佐证的用意昭然若揭。

台湾当局花费大量力气经营与美国智库的关系。台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智库作为台湾在美国维持能见度、强化对美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之一，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高级政策类智库的关系。一是蔡英文借助美国重要智库影响力频繁发声。2019年，美国三大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邀请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参与研讨会，为其分裂国家的行径提供言论平台。蔡英文还多次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传统基金会等多个智库组织的会议。此外，蔡英文还主动会见到台湾地区的美国智库“友台学者”，大肆谈及对美国支持台湾的感谢之情，表达加强与美国沟通力度与深度的期待。二是台湾外事部门、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等要员多次利用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主办的研讨会、座谈会，就两岸关系热点议题发表主题演讲等，借助与会美国重要两岸问题专家的影响力，向美国主流学界灌输台湾当局在推动两岸关系上充满“善意”的观点。今年6月，台湾地区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被揭露出以大量资金赞助多家美国高级政策类智库，“鼓励”学者发表报告与文字为台湾当局说话，鼓噪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当局。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在密切与美国智库关系上投入了巨大资源。

四、需对台海问题持续复杂化做好准备

特朗普本届任期即将结束，美国进入选举时刻，在当前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称，特朗普为了即将到来的大选，极有可能会采取一些越界手段插手台海事务，以达到制衡中国大陆发展的目的。另一位候选人拜登也多次强调“美中正在竞争，对华需要强硬”。应该认识到，未来美国政府将台湾当成棋子牵制中国大陆发展、干涉中国内政的动作不会停止，需对中美关系紧张可能衍生出的台海问题持续复杂化做好应对准备。通过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智库台湾问题研究的剖析，考虑到美国智库对政府的影响以及当前美国政府出台措施干扰中美正常学术交流的现状，应多措并举继续推动与美国高级政策类智库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举办线上研讨会、论坛等形式，组织中美两国台湾问题学者就彼此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客观介绍中国立场，了解美国认知，增进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同时，鼓励中国国内智库、学者及官员利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平台，阐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主张，使中国声音在国际涉台舆论场中被听到，被听懂。鉴于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对台政策方面的影响力，可考虑借助海外涉台研究智库专家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借助他们的“发声”来传播中国态度，敲打“台独”势力，维护台海局势稳定。

近期美国利用“台湾牌”对抗中国大陆的现象研判

■ 李超

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以及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应对选战的“抗中”策略主轴逐渐明晰，而操作“台湾牌”成为美国挑衅中国大陆屡试不爽的手段。不同于奥巴马时期处理两岸关系严守“一个中国”原则下美台非官方往来惯例，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政府与一心“倚美抗中”的蔡英文当局，为实现各自政治利益，不断试探中国大陆所能容忍的美台交往底线。

一、美国近期打“台湾牌”的具体动作

(一)高层互访方面，派遣卫生部部长访台

8月9日，美国以防疫合作为借口，派遣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率团访问台湾，会见蔡英文和台湾多位部门负责人。这是2018年3月美国通过旨在“鼓励美台间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后首位重量级官员访台。过去近40年，虽然美国也会打一些“擦边球”与台湾当局存在隐秘的官方往来，但此次如此高调派内阁官员访台较为罕见。阿扎访台成为民进党当局一次绝好的“大内宣”素材，蔡英文办公室、台湾当局行政机构、民进党上下及其附属媒体，不断渲染阿扎是1979年以来访台的“层级最高、排序最高”的美国阁员。近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凯斯·克拉奇率团赴台，再创美国高级官员访台记录。

(二)军事互动方面，公开美台军事合作

随着中美对抗情势的加剧，美国今年陆续通过多项对台军售案，包括爱国者三型飞弹、重型鱼雷、无人侦察机等。8月中旬，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新一轮军售合约中，台湾花费80亿美元采购的66架新型F-16战斗机位列其中。这批军售是自1992年老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以来，美国首度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也是多年来美国对台军售最大一笔。除了持续不断的军售，美国在台协会(AIT)最近积极强调8月是台美“安全合作月”，不断在脸书(Facebook)贴出美台军事合作项目图片，包括前美军飞行员和维修人员组成的美国技术协助团队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与咨询，以及台湾飞行员在美国空军基地接受美军空中加油训练的照片，并透过网站公布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解密电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还首次赴金门参加“8·23炮战”纪念活动，营造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也间接对马英九“台海战争，美国不会派兵”的喊话做出回应。

(三)立法方面，不断提出所谓“友台”法案

在对华策略上，美国国会一直扮演着“反华”急先锋的角色，卢比奥、科顿、克鲁兹、史密斯等横跨共和、民主两党的参众两院议员，长期在西藏、新疆、香港等议题上发表不实言论，起草、推动许多抹黑中国的议案和立法，而台湾议题更是他们展现对华强硬的重要战场。从“台湾旅行法”到“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从“国防授权法”到“台北法案”，一系列已成法的法案不断挑战中美关系底线。尽管这些法案多数涉台条款没有强制性，但却不断鼓噪美国行政当局采取实际挺台行动，突破美国政府原来设定的“一中政策”规程，也提供了更多筹码，供特朗普同中国进行战略竞逐。7月底，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

员游贺再提“防止台湾遭入侵法案”(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中国大陆武力攻台时，得动用武力防卫台湾，同时也鼓励美国总统、高层访台，并欢迎蔡英文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等。如果该提案通过并经签署实施，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台海和平的冲击将难以预测，其严重程度超过美国国会过去所通过的其他涉台法案。

(四)经济方面，施压台湾开放美猪美牛入台，提高特朗普在农业摇摆州支持率

8月底，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选在特朗普被共和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的同一天，无预警亲自召开记者会，宣布开放美猪、美牛入台。美猪美牛议题在台湾争议近十年，蔡英文选择此时开放，显然受到美国难以推卸的压力——特朗普目前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等几个“摇摆州”民调输给拜登，而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又是美国畜牧业州，蔡英文宣布开放美猪、美牛进口，旨在拉抬特朗普在几个州的选情。同时，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特朗普政府也会把美台双边贸易协议当作筹码，向中国大陆施压获取相关协议上的利益。

(五)政党层面，共和党、民主党竞相利用党纲“挺台”

近日，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先后举行全国党代表大会。共和党虽沿用2016年党纲，维持“对台六项保证”“支持对台军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等涉台部分内容不变，但民主党为免遭共和党“对华软弱”的攻击，其通过的最新版党纲相较于2016年版本更为激进，在涉及台湾部分删除原有的“一中政策”，仅保留承诺遵守“与台湾关系法”，并支持两岸议题以符合台湾人民期望及最大利益的和平解决方案处理——民主党在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上已向共和党看齐，以迎合美国国内日益抬头的“反华”情绪。

(六)个人层面，蓬佩奥等多次在社交媒体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

5月19日蔡英文第二任期即将开启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蔡英文发去贺电并直接称其为“总统”，称赞台湾是“强而有力，且极可信赖的伙伴”。这是美国国务卿几十年来第一次公开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启新的任期。同时，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政客也向蔡英文发去视频贺辞。而在蔡英文宣布开放美猪、美牛入台之后，蓬佩奥再度在脸书直呼蔡英文“总统”并称赞她的领导风范。美国官员不断在对台称呼上玩弄文字游戏，意图在国际上造成“一中一台”的假象，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也违背了国与国交往的诚信原则，是一种对中国主权完整严重的挑衅行为。

二、美国打“台湾牌”愈演愈烈的原因

与以往美国历届政府与台湾当局的往来较为低调，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刺激不同，现在的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对于台湾的支持已经日趋公开化、台面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对华强硬成为美国政坛的跨党派共识

上个世纪的中国，虽然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但无论经济、军事、科技和国际影响力等，各方面仍然与美国相距甚远。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体制优势逐渐显现，经济总量在成长为全球第二的同时，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和高技术含量的企业，特别是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部分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佼佼者，世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声音，这对奉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来说，当然是一种威胁。因而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抽身的美国已逐渐重返亚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识形态更为激进的共和党特朗普上台后，利用“印太战略”全面围堵中国更是成为其执政的战略重心，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公开发出呼吁“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对抗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冷战”檄文。在特朗普政府的不断抹黑以及西方媒体充斥着政治正确和冷战思维宣传之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从两年前的53%下降到26%历史最低值，进一步助长了美国政客靠煽动对华敌意、

操弄中美议题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心理，“逢中必反”成为两党的默契和共识。无论未来特朗普还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都不会跳出中美长期竞争对抗的大格局。

（二）特朗普寄希望“抗中”拉抬低迷的选情

在美国大选最后阶段，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美国街头持续的反种族主义活动，特朗普选情持续低迷，民调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对内无计可施的情况下，特朗普寄希望于炒作民粹主义，把疫情、经济衰退、失业等一切问题归罪于中国，燃起美国人的“仇中”心理，转移自己施政不力的焦点。因此，从中美贸易战、围堵华为、禁止抖音国际版（TikTok）、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驱逐中国记者和公费留学生等，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举动层出不穷，而“台湾牌”更是连续不断、花样百出地上演。美国希望通过挑动台湾议题惹怒中国，导致中美之间或海峡两岸双方爆发短暂、局部军事摩擦，特朗普不仅可展示危急时刻的领导力，还可趁机将美国民族主义民粹引向高潮，从而提振选情。

（三）民进党当局无底线“亲美”使美国“台湾牌”有着巨大的空间和利益

民进党由于其“逢中必反”和追求“台独”的意识形态，具有坚定的“倚美抗中”决心。他们企图通过“亲美”，形塑“台美关系友好”“美国会出兵保护台湾”来提高自己在岛内的支持率，为“台独”意识形态保驾护航。因而在美国的“抗中”战略中，台湾当局亦步亦趋，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而在美国给予一些口头上的恩惠之后，作为回报，台湾当局对于美国的予取予求几乎无底线配合。无论是对台军售、开放美猪美牛入台、美台官方来往等，台湾当局无一具有讨价还价空间。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能否真正洗刷近代遭受列强侵略瓜分的耻辱，抚平历史创伤，事关中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反对分裂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因而，台湾问题也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挑动全体中国人民的敏感神经。美国也正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会不断变换方式操作台湾这颗棋子，刺激中国大陆的反应。因而，只要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美国的“台湾牌”就可以以最小代价攫取最大利益——美国各政党当然对“台湾牌”乐此不疲。

三、美国打“台湾牌”对台海局势产生的影响

（一）强化了蔡英文当局“倚美抗中”的决心

蔡英文依靠“抗中”和炒作“芒果干”（亡国感）赢得连任，从其第二任期上任伊始的就职演说以及近期举动看，尝到甜头的蔡英文在未来四年将率领其执政团队，更加死心塌地拥抱所谓“印太战略”，继续“倚美抗中”道路。同样，在已经确定对华强硬、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为战略中心的情况下，美国也需要台湾当局不断挑衅刺激中国大陆。美国接二连三的“台湾牌”，称赞台湾防疫、派遣高官访台、强调“美台伙伴关系”等，在绿营媒体添油加醋之下，完美地成为蔡英文所谓“外交突破”的大内宣素材，满足了民进党政客的虚荣心。民进党籍县市长、民意代表无不以“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台湾被世界看见”等对外宣示，在台湾民众心中营造了一个“美国一定会出兵保护台湾”的假象。在种种虚幻的蝇头小利拉拢诱惑之下，对当前国际形势存有误判的蔡英文当局认为，中美由战略合作变为战略冲突，为台湾在外事、军事上都提供了机会，台湾应把握机遇，变“棋子”为“棋手”，争取“台独”的空间。因而，蔡英文将更加坚定地成为美国的“代理人”，充当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的马前卒。台湾已被美国、蔡英文牢牢地捆绑在美国的“抗中”战车之上。蔡英文越“独”，美国就越加鼓励，蔡英文的“台独”动作就愈加激进，危险的恶性螺旋已经形成。

（二）吸引国民党领导层跟进亲美的步伐

美国对台湾的种种动作，无论是对台军售还是所谓防疫合

作，或是美国卫生部部长赴台，国民党上至中央大佬，下至县市议员，无不表示肯定，乐见“美台关系友好”。即使如蔡英文开放美猪、美牛这种在岛内具有明显反对声浪和极具争议性的议题，国民党也不敢全力发动支持者抵制抗议，几乎未引起太大的声浪和关注度。从国民党的反应看，他们唯恐被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而“亲美”则几乎成为党内跨派系共识。尤其是国民党现在及其未来可能的领导人物江启臣、朱立伦等，过往的亲美意图毫不隐晦。美台关系在民进党任内屡屡取得突破，对国民党内亲美派的触动不可谓不小，“国民党不如民进党亲美”或“美国认识不到国民党亲美”的意识将促使他们挟持未来的国民党中央更加积极地追随美国，而在两岸关系上反而意兴阑珊，犹豫不前。

（三）对台胞、台企赴陆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中美贸易战、美军舰艇南海航行、断供华为、禁止微信抖音等，美国对外展现了全面遏制中国的决心。而对美国唯命是从的蔡英文当局不仅多项政策紧跟美国步伐，某些领域甚至更为激进，以求得到特朗普的认可。蔡英文当局不仅以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华为，近日更是专门立法禁止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在台湾运营，防止所谓“文化渗透”。而在防疫期间，蔡英文禁止口罩出口、阻碍台胞返台、区别对待陆生等泯灭人性的举措都在在向台湾民众展示，民进党可以为了“抗中”和“亲美”不顾任何观感。这对意在赴陆发展的台企和台胞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他们可能因为中美贸易争端和日益恶化的两岸形势，导致缺乏安全感而裹足不前。部分在陆台企出于避险心理，也会选择把生产线迁回台湾或转移至东南亚。长此将不利于两岸融合发展。

（四）易在国际上引发“蝴蝶效应”，其他国家可能跟进打“台湾牌”

除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小动作不断之外，近来台湾当局在外事上的炒作和跃跃欲试不可谓不频繁，疫情期间的所谓“口罩外交”、与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访台以及捷克参议长率团访台等。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更是屡屡投书丹麦、爱尔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外媒，甚至包括塞尔维亚这样与中国大陆拥有传统友谊国家的媒体，叫嚣“台湾参与联合国”等，一系列行径展现了本届台湾当局外事团队所秉持的“攻击性”外事理念。而美国连续的“台湾牌”，意图在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博弈中获利，更是极易在国际社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及其他西方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或在香港问题上报复中国大陆，也会选择在对华关系上打“台湾牌”而敲诈政治和经济利益。捷克参议长访台，在台湾立法机构发表支持台湾的演说，换取口罩生产线和台湾对捷克的投资就是典型案例。同时，由于国外复杂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竞争，在对华关系上议会机构与行政当局双重嘴脸，或在野党为制衡执政党与台湾当局眉来眼去的现象极易发生。中国大陆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及时因应美国不良示范效应下的外部势力与台湾当局勾结串联。

几乎可以判定，特朗普为拉抬选情，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民调，一定会继续在疫情上“甩锅”、抹黑中国，并利用“台湾牌”挑衅中国大陆，制造台海动荡。然而，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牢不可破，美国、“台独”势力的小动作反而证明了他们在改变两岸总体大势上无计可施。中美冲突的爆发点，不在于美国怎么做，而在于中国大陆怎么回应。因而，在美国大选前的三个月，中国大陆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勿跳入特朗普设定的选战节奏随之起舞。同时，要加强对美国打“台湾牌”下一步动作的研判，对外传所谓美国更高级别官员访台、蔡英文赴美国国会演讲、美国军机军舰停靠台湾等特朗普向中国大陆极限施压的情形做好预案，应对中美双方在台海议题上摊牌的可能。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四）

四、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历史飞跃。通过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改革的全面完成，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奴不再被当作农奴主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婚嫁、流动、居住、劳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接受教育等权利的制度枷锁，百万农奴实现了真正的人身解放。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记录了受访农奴对获得人身自由的描述：“我原来总想送儿子上学识字，学点手艺，如裁缝什么的，可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已在内地上学了，将来回来，会成为有技术的工人，他再也不用像我那样，被繁重的负担压弯了腰。”

民主改革废除了寺庙的一切封建特权。僧尼获得了平等权利和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许多处于底层的僧尼冲破束缚，还俗返家。仅甘丹寺就有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还俗的僧人，政府按照路途远近分别发给足够的路费和安家费。同时，将要求参加工作的13名青年僧人介绍到拉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选送了一些年幼的僧人去学校读书。对于愿意继续留在甘丹寺的312名僧人，做了保障日常生活的安排。民主改革还废除了寺庙向宗（县）、谿卡（庄园）、部落摊派僧额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当僧人。

——建立人民政权行使当家作主权利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与此同时，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相继被撤销和结束工作。自此，西藏结束了几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西藏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1959年7月中旬，西藏第一个乡级农会凯松农民协会和第一个县级农会乃东县农民协会先后成立。昔日的农奴当选为农会主席和农会委员，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到1960年底，西藏建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县级政权78个，专区（市）级政权8个，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4400多名翻身农奴成为基层干部。1961年下半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获得翻身的广大农奴彻底改变了昔日“会说话的工具”的地位，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西藏的政治舞台，成为新西藏的主人，开始享有宪法和有关法律所赋予的旧社会所没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以高涨的政治热情投入到选举工作中，选举产生了基层各级权力机关和政府。在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了通过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地方政权。到1965年7月，普选工作基本完成，普选出的2600多名人民代表中，贫困农奴就有2200人。江孜县的选民把选民证称作“当家作主证”，把选举看成一件大喜事，积极主动地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

1965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议

案。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西藏自治区，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大批翻身农奴担任了自治区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西藏自治区及其自治机关的成立，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西藏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始全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79年，西藏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的规定，西藏各族人民充分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1978年以来，西藏依法进行了11次乡级、10次县级和8次设区的市级以上的人大代表选举。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藏各族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权利。目前，西藏自治区有35963名各级人大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2.18%。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和发展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保持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据统计，自治区成立以来，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批准地方性法规和作出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300余件，切实履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自治区各方面工作已经实现有法可依，推动法治西藏建设取得巨大成就。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顺应人民群众的政治意愿，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获得解放。

——充分保障各族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为切实保障社会各界参政议政权利，1959年12月，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成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依法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在西藏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政协第十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就围绕西藏制定实施“十三五”规划、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方面共提出提案2401件，立案2347件。在西藏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各阶层广泛参与，充分发挥作用。如政协第十一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518个委员中，宗教界（佛协）80人，排名第一；民族界64人，排名第二。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改革后，西藏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1980年，西藏全区开展了乡级直接选举，1984年后扩大到县。1987年，西藏自治区作出《关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农牧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决定》。经过多年探索，西藏逐步发展形成了农牧区基层民主制度。农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城市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了充分的组织保证。在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广泛推行。截至2018年底，全区有基层工会组织5756个，工会会员497082人。

通过民主改革，西藏社会各界人士有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1959年7月，区、地两级行政机关含上层人士565人，其中贵族、官员和宗教界人士415人。在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曾有两位副主席吉普·平措次登和拉巴平措，都出生在吉普庄园，但在旧西藏，前者是农奴主，后者是农奴，而在人民政府里都当选为自治区副主席，成了共同参与人民政府决策的同事。民主改革使妇女获得了政治权利，广大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Sixty Years On(Ⅳ)

IV. The People Have Become Masters of Their Own Affairs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 feudal serfdom under theocracy in Tibet was abolished completely, bringing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Tibetan social system. It was a historic leap. Due to democratic reform, about one million serfs were liberated. They gained personal freedom and became masters of the new society.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form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in Tibet.

– One million serfs were liberated and gained personal freedom.

When feudal land ownership was abolished in democratic reform, serfs were no longer treated arbitrarily by serf owners as their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ersonal ownership of serfs by serf owners came to an end.

Tibet's democratic reform destroyed the institutional shackles which infringed serfs' rights to subsistence, marriage, migration, residence, work, personal freedom, human dignity, and education. Thanks to this reform, one million serfs gained true personal freedom. Anna Louise Strong, a renowne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included the remarks by a serf interviewee in her book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Always I wanted to send my son to school to learn to read and to have some trade like a tailor. This was impossible, but now my son has gone to study in the interior and when he comes back he will be a skilled worker for a factory. He will not be weighed down by all those things that weighed down my head."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 all feudal privileges of monasteries were annulled. Monks and nuns gained equal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be the masters of their own destiny. Many of those who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erarchy broke free of their religious bondage and resumed secular life. In Ganden Monastery alone, more than 300 monks demanded to return home or resume secular lif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the monastery. The local government granted them the fare for their journey home and a settlement allowance. It also found jobs for 13 young monks who asked for employment at the Lhasa Department

妇女通过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成立妇女组织等积极参政。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巴桑和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才旦卓玛，是妇女界参政议政的典型代表。就连出生在拉萨一个大贵族家庭、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唐麦·贡觉白姆都说："在旧社会封建农奴制度下，连地方政府噶伦的夫人，在政治方面都没有过问的权利，那都是男人的事情。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男女平等了，女人也有权利了，这方面变化很大。"（待续）

Store Company, and sent some child monks to school. As to the 312 monks who wanted to stay at the monastery, the local government made arrangements to ensure their daily life. In democratic reform, the system by which monasteries assigned monk and nun quotas to counties, manors and tribes was abolished. Monasteries were prohibited from coercing people to become monks or nuns.

– People's governments were established at various levels for the peopl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On March 28, 1959, the State Council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was dissolved. The Qamdo People's Liberation Committee and the Panchen Kampus Assembly were also abolished, thus ending the coexistence of political powers of different natu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governments were gradually set up at various levels. In mid-July, 1959, the first township-level peasants' association, known as the Peasants' Association of Khesum Village, and the first county-level peasants' association, known as the Peasants' Association of Nedong County, were established. Former serfs were elected as chairs o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s, leading the people to conduct democratic reform. By the end of 1960, Tibet had established 1,009 organs of state power at township level, 283 at district level, 78 at county level and eight at prefecture (city) level. The number of officials from Tibetan and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otaled over 10,000. More than 4,400 liberated serfs became officials at community level.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61, a general election was held all over Tib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ormer serfs were no longer regarded as "speaking tools", and emerged on the political stage as the masters of the new Tibet.

Now enjoying the broadest possible democratic rights endow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laws that they had never had in the pre-liberation society, former serfs engaged in elections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elected organs and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ibet, local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were elected in a democratic way through people's exercise of their right to vote and to stand for election. By July 1965, general elections had been basically completed. Among the 2,600-plus deputies elected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2,200 were former impoverished serfs. In Gyantse County, voters called their electoral certificates "masters' certificates". They saw elections as joyous event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elections of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On August 25, 1965, the bill to establish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bled by the State Council, was approved at the 15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Thir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rom September 1 to 9, 1965,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rst People's Congress of Tibet was held. At this sessio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People's Committee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came into being by election. Ngapoi Ngawang Jigme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A large number of liberated serfs held leading posts in organs of political power at various levels of the Reg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organs of self-government of the Region realized the historic leap from theocratic feudal serfdom to people's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signified that Tibet had set up a people's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begun to exercise thorough-going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In 1979,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as

elected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Third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on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fully enjoy the right to vote and to stand for election. Since 1978, Tibet has held 11 elections of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township level, 10 at county level, and eight at the level of municipalities having subordinate districts. The people in Tibet can directly el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county (district) and township (town) levels, and these elected deputies will then elect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the autonomous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Through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various levels, the people of Tibet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nd local affairs.

Currently, there are 35,963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all levels in Tibet. Among them, deputies from the Tibetan and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account for 92.18 percent. Uphold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Party leadership, the running of the country by the people, and law-based governance,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guarantee and develop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be their own masters through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channels,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enjoy broad rights and freedom, and expand citizens'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y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deputies to the people's congress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the deputies and the people, they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eople and accept their oversight. They work to safeguar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ibet and promote well-rounded human develo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in 1965,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have enacted or approved more than 300 local regulations,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of a regulatory nature. In so doing, they have fulfilled the rights of autonomy of the localities enjoying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Now, work in various respects in Tibet has been law-based, an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promoting rule of law in the Region. On January 19, 2009,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Ninth Reg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voted and adopted the Decision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o Establish the Commemoration Day for the Liberation of One Million Serfs in Tibet. According to the decision, March 28 was designated as the day to commemorate the event.

–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lib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have been fully guaranteed.

To fully ensure that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lib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was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1959. According to the Charter of the CPPCC, the CPPCC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performs the duties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deliber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mocratic reform,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ibet. Focusing on formulat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of the Reg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projects, developing industr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s, and developing non-public economic sectors, the 10th CPPCC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alone made 2,401 proposals, among which 2,347 were accepted for deliberation. At the sessions of the CPPCC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in Tibet, people of all social strata have broad participation and play their role to the full extent. For instance, among the 518 members of the 11th CPPCC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80 – the highest number – are representatives of religious groups (Buddhist associations), and 64 are from ethnic minority groups, the second-highest number.

Community-level democracy is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After democratic reform, people's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were established in Tibet. In 1980, direct elections were held at township level all over Tibet, and they were expanded to county level starting from 1984. In 1987,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sued the Decis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level Power Organs and the Decision on Strengthening Community-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Through years of experimentation, Tibe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formed community-level democratic systems in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In rural areas,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meeting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urban communiti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ngresses and community committees have been set up, providing a soli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self-governance of urban residents. In enterpri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system of employees' congresses is widely practiced. As of the end of 2018, there were 5,756 community-level workers' unions, having 497,082 members.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ibet have gained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In July 1959, there were 565 members of the upper class working in the executive organs of the government at district and prefectural levels. Among them, 415 were aristocrats, officials of former government, or religious figures. In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 former serf owner and a former serf were successively elected to the post of vice chair. They were Kyibuk Phuntsog-Tseten and Lhagpa Phuntshogs. Both of them were born at the Kyibuk Manor prior to the liberation, and they became colleagues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Through democratic reform, women were empowered with political rights. They took an active part in political affairs by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of various levels, serving as leading officials at various levels, and establishing women's organizations. Pasang, 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nd Tseten Dolma, 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r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women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Thangme Konchog-Palmo, a former vice chairwoman of the CPPCC Tibet Autonomous Regional Committee, was born into an aristocratic family in Lhasa. She made the following comments: "Under the feudal serfdom of the old society, even the wives of the kalo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no political rights, which were enjoyed exclusively by men. Afte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men and women became equal. Women are empowered with rights. This was a huge change." (To be continued)

万里情牵华夏梦 只缘神矢入灵台

——记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李锦辉

万里海外 赤子情深

旅居巴西32年的李锦辉先生，在异国创业发展的过程中，时刻心系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创业之初，李锦辉便投身海外反“独”促统运动，1995年加入由张无咎先生等侨领于1991年成立的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原名巴西华侨祖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1997年出任常务副会长，主持日常会务工作，默默耕耘20年，组织了一系列反“独”促统和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活动。2015年，李锦辉接任会长，开始新的征程。身为侨领，李锦辉努力团结巴西各界侨胞尤其是台胞，共建和谐侨社、共襄爱国义举。李锦辉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除担任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外，还是巴西华人协会永久名誉会长，以及圣保罗广东、浙江、福建闽南、湖北、冀鲁等侨团荣誉会长或顾问，同时担任一些台胞社团名誉会长。有人曾问李锦辉，一路走来，何以如此？李锦辉自喻：“万里情牵华夏梦，只缘神矢入灵台。”



“中国文化日”向利美拉市市长赠旗

李锦辉出生于浙江温州，生于1949年10月的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生、共成长。作为共和国同龄人，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屈辱，浴火重生后迎来的伟大变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梦想，已深深嵌在他心里。无论他走得多远，无论身处天涯海角，始终初心不忘。

历尽艰辛 走向成功

从1988年年初到巴西，李锦辉的移民之路充满辛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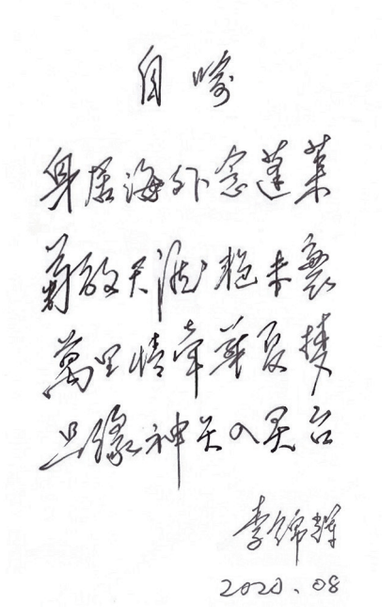
初到巴西，李锦辉选择开设电动式炸鸡店作为立身之本，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一条发展连锁店的康庄大道似乎正在铺开。但是，他却离开舒适区，执拗地将视野转向另一片天地——将中国电子产品引入巴西市场，开始追求更高的事业目标。他创办进出口公司，选定电子节能灯作为迈向销售高科技电子产品的“敲门砖”。

李锦辉对高科技电子产品情有独钟，这与他曾就读浙江大学半导体专业有关。上世纪80年代初，李锦辉离开政府机关到温州某国营无线电厂，领衔组织质量攻关，为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凯歌”“飞跃”和“金星”三大国产彩电大会战配套工作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他下

海创办汽车电器厂，研制的水温感应塞能与当时的日本同类产品媲美。这些经历为李锦辉在巴西实现其事业目标奠定了基础。由于懂技术、懂市场，1994年，按他要求制作的节能灯在巴西一炮打响。许多华商纷纷跟风，形成了“节能灯热”。但是，不久后便遭遇大量低劣产品冲击，商品滞销，不少中国厂家因此关闭，李锦辉的企业也面临危机。199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由于进口数额巨大，李锦辉的公司遭受重创。

经历了几年的崎岖坎坷后，巴西开始制定节能灯标准，节能灯市场逐步走上正轨。然而，这时的李锦辉又把眼光转向了方兴未艾的半导体照明领域。

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李锦辉在LED照明领域采取了“从高端入手，先登公共照明，居高临下，推向市场”的独特路径。对他而言，走这条路除了是借鉴以往经验教训的结果，也是现实情势所逼。当时大量低端LED产品涌进巴西市场，竞相杀价，却无法真正占领市场。鉴于这种情势，李锦辉认为，只有从高端入手，用最优秀的LED产品进军公共设施领域，发挥特殊广告作用，才能真正占领巴西市场。他把巴西的团队作为一线实验室，注重高科技和适用性相结合，改进产品结构。同时，与巴西本地公司结为伙伴，由当地安装公司作前锋，开拓公共照明和公共装饰市场。追求实效、不图虚名，这是他在巴西为中国新能源照明开拓市场的一种方式。面对跨国巨头仍然占据市场主流的态势，与对华友好的巴西企业结成伙伴关系，甘做绿叶，可避免跨国巨头绞杀，从而立足巴西市场。



自喻诗

经过几年努力，李锦辉终于在高端LED领域获得成功，以圣保罗作为基地，开始向巴西各地推进。

心系祖国统一民族复兴
投身反“独”促统25载

创业正酣的李锦辉不忘关注中国统一大业，他说，鲁迅先生的诗句“心灵无计逃神矢”与他相通。因为在1995、1996年间，台湾地区正是李登辉当政、“台独”势力猖獗的时候，海峡两岸关系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祖国统一大业牵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在巴西，张无咎先生等反对“台独”的侨领成立了统促会，但是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正当统促会需要之时，李锦辉毅然从祖国统一大业之重出发，不顾创业繁忙而倾力投身其中，先是担任副会长，后又担任常务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李锦辉作为大会总指挥，举办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千人联欢大会，宣传“一国两制”，为两岸统一造势。1999年5月，惊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李锦辉与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同仁连夜组织侨胞千人，并取得当地警方支持，在警车开道、电视台直升机直播和巴西民众簇拥下，浩浩荡荡走向美国领事馆进行严正抗议。1999年7月，李锦辉代表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应邀出席以台湾梁肃戎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和平统一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发言编入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6月，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在南美洲最大城市举办中南美洲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圣保罗大会，李锦辉担任大会秘书长，负责具体筹办。全球30多个国家40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出版了《论文集》，收入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论文59篇。

同时，李锦辉代表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为首次全球反

“独”促统大会——柏林大会专门设点宣传，并相继参加了柏林、澳门等地举行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在圣保罗陆续举办20多次反对“废统”“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行径的座谈会。在反“独”促统的洪流中，砥砺前行，坚持不懈。

2015年，李锦辉接任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他上任后明确提出：统促会更替班子是为完成使命，必须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不是西方的“轮流坐庄”。因此，工作向更广泛的侨社、特别是台胞群体深入拓展。他经过细致考察和交流，吸收了更多促统骨干，凝聚了更大侨界力量，其中台胞占4成。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成员从90多岁的原国军抗战老兵，到中共革命前辈子女，到两岸同胞中三四十岁的侨领和青年才俊，人才济济，会务兴旺。

李锦辉带领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同仁，在新形势下举办座谈会、发表声明，为捍卫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发声，坚决投身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坚决反对包括“台独”“港独”“藏独”“东突”在内的一切分裂势力的罪恶行径。

2015年，配合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大活动，李锦辉负责筹办了有国共抗战将领子女参加的“铭记历史 圆梦中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座谈会，两岸侨界100多位代表出席，请国共抗战将领子女发言，激发两岸同胞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共同信念。李锦辉为此次活动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寻找失联的原国军抗战将领子女，整整奔波两个多月。2016年1月，民进党赢得台湾岛内大选，李锦辉发动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与各侨团一起，在圣保罗举办“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座谈会，严正要求蔡英文当局必须遵从“九二共识”即“一中原则”。多位台胞发言批驳“台独”。2016年11月6日，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与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共同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座谈会，100多位侨界代表参加，李锦辉作主题发言，再次发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铿锵誓言。

李锦辉注重发动各侨团和广大侨胞一起投身海外反“独”促统运动。借2017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访问团、2018年中华海外联谊会访问团访问巴西的机会，举办规模100人以上的侨界“反‘独’促统 筑梦中国”座谈会，加强海内外相互交流，激励侨胞爱国热情。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作重要讲话，李锦辉率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联合巴西洪门总会等社团，在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支持下，举办题为“开启新程 促统圆梦——巴西侨社学习习近平对台重要讲话”座谈会，两岸侨胞各界代表100多人出席，纷纷发言，侨界反应甚佳。

2019年6月，李锦辉不顾足疾，毅然率领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代表团，出席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马尼拉）大会，并作为嘉宾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

2020年5月29日，巴西处于新冠病毒肆虐期，为配合中国纪念《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活动，李锦辉发动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骨干，在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支持下，克服抗疫期间的困难，举行了视频形式的座谈会，表达了在新形势下反“独”促统的坚定意志。

李锦辉团结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台胞骨干，注重落实团结台胞青年大学生工作，扎实推进、壮大会员群体。他紧密配合中国涉台部门和驻圣保罗总领馆，从2017年开始就下决心改变以往的困难情况，采取多层次发动、细致工作的方式，解决巴西大学生假期与中国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使2018、2019年报名参加中国夏令营的台胞青年人数呈“井喷式”增加。在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全力帮助向国内争取增加名额后，他们还为台胞青年大学生专门组团，提供开营前和结束后的全程服务，而且参加夏令营的台胞学生从巴西扩展到巴拉圭。圣保罗夏令营团队是巴西唯一的团队，也是全球各国参营团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故在

中国夏令营开营仪式上，巴西圣保罗团队领队作为学员代表讲话。

针对2019年6月开始至2020年愈演愈烈的“港独”和极端激进势力反中乱港逆行，同时针对美国反华势力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重大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分裂势力的卑劣行径，李锦辉第一时间在《统一之声》和《南美侨报》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会同华人协会一起发动侨胞在圣保罗安年比国际展销馆广场上示威，表达反对“港独”、反对暴力、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中央政府举措和香港国安法、维护“一国两制”、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坚定立场。

扬中华文化行民间外交
兴爱国赈灾援祖国战疫

正如李锦辉先生所说，他爱国、投身反“独”促统是心之所驱，因此这份发自内心的爱国之情也体现在行动上，所以，他一直坚持投身海外反“独”促统。他爱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宣传和民间外交多年来身体力行，在圣保罗周边各城市组织举办“中国文化日”影响极大，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互鉴，也起到了民间外交使者的作用。对于祖国发展，他时时关切，除了以自己的事业推动中国产品走向世界，还通过经贸交流、合作支持祖国发展外，每遇祖国遭逢重大自然灾害，他必然要带头发动赈灾，包括驰援祖国战疫。

李锦辉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使海外侨胞在推动中华文化与各国交流方面方向更明确。他在圣保罗各城市开展以“中国文化日”为品牌的活动，以文化为引领，推动中巴经贸、“一带一路”及各方面合作，并为推动中国统一、中华民族复兴营造更好国际环境。

“中国文化日”活动从2016年的一个城市开始，到2017年东部6城市共办，再到2018年东北部8城市共办“中国文化日促一带一路”，2019年西部8城市共办“中国文化日庆中巴建交45周年”，至今已遍及24个城市。每次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都组团出席，总领事与各地市长交流互动。在活动庆典晚会上，“圣保罗华星艺术团”精彩表演之前，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总领事和市长以及来自海峡两岸的侨领共同登台向巴西民众表达：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引起当地政要和民众共鸣，影响深刻。2019年8月2日的“中国文化日”活动，吸引巴西最大电视台《环球》关注并跟踪报道，第一时间播出相关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中国文化日”工作一切就绪时，活动中心城市所罗卡巴市发生政治风波，市长面临市议会罢免，如果“中国文化日”继续进行，特别是邀请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总领事访问并与市长交流互动，将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事关重大，李锦辉紧急召集会议，在迅速获得州议会支持后，随即果断地改变了活动中心城市，抓紧时间重新筹备，避免了负面影响，而且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支持祖国赈灾方面，仅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李锦辉带领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与巴西华人协会和各侨团一起发动侨胞捐款赈灾。他不仅带头捐款，而且奔走动员，使巴西圣保罗侨胞的捐款数在全球侨社中名列前茅。

2020年，为了驰援祖国抗疫，李锦辉迅速行动，在9位台胞侨领的支持下，与华人协会一起发出倡议进行募捐，仅十多天时间，圣保罗侨界就募捐300多万巴币(约合人民币500万元)，购买医用物资分批运抵中国。当得知中国抗疫第一线最缺防护服，李锦辉与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台湾侨领商议，成立专项捐赠，携若干台胞和各界热心人士，紧急购置防护服驰援。李锦辉还与台胞侨领一起拟定动员口号：中华民族骨肉相连，支援抗疫义不容辞。祖国暂时面临困难之际，决不容许西方敌对势力落井下石，决不容许岛内“台独”势力借机挑衅。战“疫”必胜，民族必兴!

李锦辉表示，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作为海外中华儿女必须与祖国休戚与共。保持定力，排除万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团结各国人民，战胜反华势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再谱新篇!

“台独教父”李登辉:于国于民有大亏欠

■ 杨仁飞

7月30日，97岁、祖籍福建永定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病亡，于8月14日日本投降75周年前夕火化。

新华社一篇评论指出，“李登辉在台湾当权的十多年间所推行的路线，概括而言，就是对内打着‘本土化’‘民主化’幌子，打击赞成统一的力量，培植‘台独’分裂势力”。“对一个于台湾民众与中华民族都有大亏欠的历史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我们不妨对李登辉下一个较为客观的结论，“于个人无风节；于国家、于民族有大亏欠；于台湾祸遗数十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一、于国、于民族有深重罪孽：“两国论”遗祸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对德国媒体公开宣称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在两岸及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两国论”是由李登辉提出、以特别费的方式、暗地组织包括蔡英文在内的岛内政界、学界人士，历时9个月才完成的系列报告。

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一个系统的“台独”论述，既包括两岸关系的基本定位，也提出了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准则。它的出现对之后台湾政治制度、政党竞争、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它的基本目的是分裂国家，搞“台独”。提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关系的核心是所谓的“两种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在两岸谈判中，两岸将进入“国对国政治谈判”阶段，以“三通”、两岸经贸关系为筹码迫使大陆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在国家认同方面，“新台湾人主义”成为“国家认定和共识”的开始。在法律层面上，以“修宪”确定台湾作为“独立国家”的法理基础，以台湾“安全”“民众福祉”为优先政策考量。因此，“两国论”的目标是“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企图达成“两个中国”的目的。

“两国论”是李登辉系统改造台湾、撕裂两岸关系的重大政治宣示与分裂图谋。

由于受到两岸民众的强烈反对，为自圆其说，李登辉声称自1991年开始设计一套“两国论”，且认为“两岸关系定位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因此并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不过，修正后的“两国论”更具欺骗性。

李登辉“两国论”一出，国民党面临重大政治危机。因为背离传统国民党政治信念与目标，李登辉被剔出国民党。2000年，在李登辉的加持下，民进党的陈水扁趁虚而入赢得台湾执政权，国民党沦为在野党。自此，台湾进入政党轮替的新时期。

“两国论”不只改变台湾政治生态，而且也再造了民进党。李登辉这一套主张与论述，同期成为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核心思想与政策基础，对民进党产生持续而深远影响。而作为李登辉“两国论”出台的重要幕僚，蔡英文一手打造了“两国论”，并在2016年代表民进党赢得台湾执政权后，形成了更加具体的政策指引：“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它的名字刚好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与治权不及大陆”。蔡英文当局推动新南向政策，继续塑造、强化台湾“主体性”，与祖国大陆进行对

抗，这些想法与做法可谓与李登辉一脉相传。李登辉因此也有了“一个国民党主席、一个‘台联党’精神领袖、半个民进党主席”的复杂身份。

始作俑者李登辉及蔡英文共同打造的“两国论”遗祸台湾近30年，严重冲击两岸关系。2005年，祖国大陆出台《反分裂国家法》，因应与防范台湾走向“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问题等极端情况。

二、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有大亏欠：“文化台独”荼毒莘莘学子

李登辉时代开始的“去中国化”教育遗祸深远，导致台湾岛内集体出现“我是谁”的认同迷失。

李登辉向中国历史与文化开刀，大搞“去中国化”系统工程，其心可诛。1998年6月，台湾教育部门推出了一本面向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在其中的“历史篇”中，“台湾400年前是无主的土地”“我们都是台湾人”“台湾魂”“台湾精神”等字眼处处可见，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词统统被删。2000年民进党开始执政，加快高中历史课程改造。2003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发表《高中历史新课程纲要草案》，以“同心圆理论”为框架，将明代中期以后、清史、民国史全部放入“世界史”。而蔡英文2016年上台以来更是全面推进“文化台独”，继续修改社会、历史教科书，而且制订“文化基本法”“语言基本法”等法律，进一步厚植“台独”文化土壤，巩固“台独”意识形态，企图进一步从文化上、精神上斩断两岸的联系。

李登辉执政以来“去中国化”教育宣传后果严重，直接导致台湾青年价值观崩塌，国家民族认同也被人为扭曲。

三、“歌颂殖民”，令岛内亲日媚日大行其道

李登辉掌握权力之后，干脆不再掩饰自己的国族认同，不再掩饰自己对日本的“赞美”。他承认22岁前自己是日本人，日本殖民统治有益台湾，甚至认为台湾人应感谢日本统治。这种荒唐的认知背后是“殖民先进论、西方文明先进论”作祟的结果。李登辉曾经说过：“台湾成为日本领土后的第二年，日本便很快地从夏威夷引进新品种甘蔗。而1905年日俄战争时，台湾也较日本先进口德国的化学原料。而民政局长后藤新平与总督儿玉源太郎搭档创设独立财政、公卖制度、台湾银行等，奠定了台湾发展的基础。工程师八田与一从大正十年(1920年)起，花费了十年时间，在广阔的嘉南平原建立伟大的水库及大大小小的水道，肥沃了近15万公顷的土地，而使近百万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

可以说，对殖民时代的怀念与推崇，使得李登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忘记自己曾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一政治身份，忘记拿着台湾民众缴纳的税金、享受着优渥的卸任待遇，却做出卖中华民族与台湾人民利益的事。2007年6月7日，李登辉以祭拜兄长亡灵为由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2008年9月24日，李登辉在冲绳宣称：“钓鱼台(钓鱼岛)以前就是日本的。”晚年的李登辉甚至想到日本终老，以至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李登辉是比日本人还懂日本的台湾人。

李登辉的媚日立场、政策、行为留给台湾社会的负资产持久而深远，亲日媚日蔚然成风，大多数人不以为怪、不以为错。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实施历史再造工程，相继重建了台中日本神社、台中铁路站线、日本“帝国糖厂”台中营业所、日据时代的林田神社、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台北支店、新北市水滴洞地区与瑞芳区造炼厂遗址、高雄市“左营旧城”等。

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悲歌抗日的台湾先民何曾想到，如今台湾岛内到处有歌颂日据时代历史的声音，这其实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成果的否定，是对台湾抗日志士的背叛。

总之，在李登辉与民进党“本土化”“主体意识”“台湾优先”的洗脑下，台湾出现不知两岸历史，不知两岸同属一中、命运相

连的所谓“天然独”。他们拒绝“和平统一”，拒绝“两岸融合”，拒绝做中国人，与祖国大陆日益离心离德。因此，李登辉开启的“去中国化”教育对中华民族有大亏欠，罪孽深重。

四、“黑金之父”终结蒋经国清廉政治的理想

朱松岭教授认为，“黑金政治”是指某些社会经济势力与政客勾结，共同盗取执政权柄与社会公共财富。在“黑金政治”下政治人物借“权”捞钱，形成黑白合流、利益共生互享的恶质政治。

1988年，因为蒋经国突然离世，李登辉继而成为国民党主席，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为巩固权力，排挤国民党政治精英，大搞“黑金政治”，甚至联手黑道势力和地方财团建立一套所谓“桩脚”与“金脉”体系，纵容金钱与选举挂钩，甚至主动进行政商不当接触，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打造了台湾政商结合的“恶质”政治文化，成为后来蓝绿政党都无法摆脱贪污、腐败的魔咒。

李登辉背叛了蒋经国清廉勤政的作风，更成为国民党党内最大的贪污犯。李登辉是国民党党产的乾坤大挪移者，导致国民党党产亏损427亿元新台币。李登辉生前更是卷入拉法叶军购舞弊案、新瑞都案、国安密账等。然而因为李登辉为人阴险、狡猾，台湾岛内没人敢办案，而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最终不了了之。

李登辉终结蒋经国苦心改造国民党、发展台湾的一番心血，并将腐败披上了“民主选举”的外衣。民进党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克隆了李登辉金钱政治与金权勾结，成为“掮客型政党”。与李登辉情同父子的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因涉重大贪污案而被判入狱的领导人。而蔡英文执政4年多，蔡英文办公室人员公然走私，蔡英文搭档苏嘉全的侄子苏震清涉贿2000万元新台币等弊案层出不穷。民进党快速腐化，难逃“黑金政治”魔咒。

五、没有节操的政治人物终将被钉在耻辱柱上

纵观历史，守节操者流芳百世，无节操者，为世人所不齿。

李登辉就是典型的贰臣，毫无节操可言。

从共产党、国民党、“台联党”，李登辉毫无政治信仰可言。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他永远是那个站立城头的易帜者。97年人生中，李登辉在不同政党与“国族”身份间转换，可以说是台湾社会最没有节操的政治人物。蔡英文、蓬佩奥虽然高度评价李登辉是亚洲乃至国际的“民主典范”，但这样的评价不知是否脑壳坏掉，还是忘性很大？

李登辉嗜权如命，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置国民党、全台湾民众的利益而不顾。他骗过了蒋经国、一手肢解了国民党；他将民进党送上权力的巅峰，但又组建了“台联党”。李登辉将权力玩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显然是弄权的高手，哪有“民主先生”的风范？因此铁杆“台独”彭明敏称，李登辉当年从来不表达对“台独”的兴趣。民进党民意代表梁文杰则认为，李登辉并不是什么“民主先生”，李登辉没有给民进党“奶水”。曾是民进党党员的沈富雄评论李登辉，处于一种“场所的悲哀，一辈子呆在不想呆的地方，明明是受益者，硬将自己说成是受害人”。如今蔡英文之流的阿谀奉承遮掩不了李登辉以民主为玩物、嗜权如命的事实与本性。

李登辉是变节者。李登辉1946年加入共产党，1947年作为“匪干”的李登辉介绍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叶城松入党。“二二八”之后，李登辉一度被捕，但不久重获自由。在当时的叶城松案中，除了李登辉之外，15人被起诉，有的被枪决，有的被判五至二年刑，可以说无一幸免（《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中评社文章指出，许多人坚信，他通过出卖同志才安然脱身，之后能够出国留学，唯一可能是“戴罪立功”。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有人变节，有人贪生怕死，而李登辉就是那个贪生怕死者。

总而言之，虽然李登辉病亡了，但是他的遗毒犹存，未来必须清理他的负资产，让历史的指针重回正确轨道。

无欲则刚才能追求历史定位

■ 台湾 纪欣

8月10日，马英九在扶轮社演讲时指出，若两岸开战，“首战即终战”，台湾根本没有机会等美军支援，且现在美军根本不可能来。8月22日，马英九又在马英九基金会举办的“国家不安全研讨会”上，指责蔡英文一味向美国倾倒，并抛弃“九二共识”，把台湾人民推向战争边缘，两岸若有冲突，台湾很可能会变成美国的“弃子”。

马英九以上发言遭到民进党当局、台湾行政部门、民进党三方全力批判，蔡英文也在脸书(Facebook)上写，“别以为在主权议题上卑躬屈膝，就能换来所谓的和平”。马英九则反击蔡英文当局才经常卑躬屈膝，应该先好好检讨自己。双方火力全开，至今余波荡漾。

台湾舆论说马英九出手是起于对时局的忧心，也有媒体及网民猜测，马英九是在为竞选2021年中国国民党主席暖身，甚至不排除他会回锅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笔者认为，不论马英九的动机为何，在蔡英文亦步亦趋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起舞，甚至加码配合之际，台海是否难逃一战，早已成为台湾社会热议话题。马英九以其位阶频频示警，拉高“战争无情、和平无价”的社会话语权，值得赞赏。

不过，笔者要善意地提醒马英九，只有无欲则刚，才能“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才能取得历史定位。1993年11月，台湾前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公开唾弃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并宣布退出当时“丧失了党魂”的中国国民党，从此致力于反“独”促统大业。200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布《两岸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二者皆是无欲则刚的典范，亦均为自己取得了历史定位。

不可否认，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迎来了“三通”直航，两岸“两会”签署了23项协议，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局面。但因马英九坚持要当“全民”领导人，始终贯彻“不统不独不武”“只经不政”“只易不难”政策，台湾偏“独”的政治氛围未见改变，反而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令人惋惜。

2012年，马英九连任后公开表示，“将在第二任追求历史定位”，使得蓝营及统派团体对他充满期待，多番郑重建议他及早开启两岸政治对话，恢复“国家统一委员会”，更希望他能大刀阔斧地删除中学历史课纲中的“媚日、分离史观”，以期扭转青年学子错乱的国族认同。结果四年下来，除2015年11月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外，两岸政治对话从未开启，连历史“课纲微调”都因起步太晚，又承受不起“独”派师生的反弹，只落得功败垂成。这一段过程，相信马英九点滴在心头。尤其，近日台湾新闻揭露，初二历史教科书变本加厉地“去中国化”，从商周到隋唐2400年的历史仅以1600字讲述，导致“三国、武后消失”，《史记》《汉书》也只字未提，引起台湾社会一片哗然，也使马英九未在任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往事，重新浮上台面并遭到批评。

历史不能改变，但诚如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敦义所说，“马英九年华正盛，可以为人民、为两岸继续努力”。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只是马英九卸任四年多来，国际及两岸形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马英九若想有所表现，至少应有以下几点认知。

警惕蔡英文当局利用“台独”智库强化对美游说

■ 储斌

民进党历来重视对美国的政治游说，认为“必须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增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变得更加敏感与复杂。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打“台湾牌”对中国大陆施压，并不时向岛内传递某些“支持台湾”的错误信号。面对国际和亚太局势的重大变化，民进党和岛内外各种“台独”势力不甘寂寞，积极串联。2016年9月1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一个新的“台独”游说机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后，立即展开各种形式的对美游说活动，不仅在美国各界进行政治公关，替蔡英文当局“力抗中国”的政策辩解，而且大肆兜售“台独”理念，将游说的触角伸向美国社会和民间，企图从更深层次培植“亲台”“反华”势力，破坏中美关系大局和中国统一大业。

一、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台独”本色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表面上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智库”，实际上是一家由“台独”分子资助、旨在帮助民进党和绿营对美国进行政治游说、帮助“台独”势力推动台湾“走进国际社会”“建设正常国家”政治图谋的游说机构。

其一，马英九执政时的“和陆亲美”策略，不再适用于今日。特朗普总统近来为了拉抬自己的选情，不断加大其打“台湾牌”的力道，更不惜采取一切卑劣手段，在台海问题上火上浇油，频踩中国大陆的底线。台湾若想“和陆”，恐怕就难以“亲美”，如果二者不能兼得，孰轻孰重，应如何取舍，考验着马英九的智慧。

其二，马英九在位时所采取的“搁置主权争议”，如今已行不通。“九二共识”虽不等同于“一国两制”，但依据史实及两岸现行法律，它确实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国家统一”。马英九很清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始终是大陆对台方针，40年未变。若继续强调“各表”，只会造成“一中”淡化、虚化，绝非大陆所能容忍。若只想维持现状，刻意模糊统一目标，则只会造成台海对峙的长期化、固定化，也根本无法达到两岸和平共处、稳定发展的目标。笔者以为，马英九既然珍惜和平的可贵，就应当带领中国国民党作为两岸民主协商的领头羊，开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为台湾人民谋福祉，也为国民党创造重返执政的机会。

其三，看蔡英文近来不惜以进口美国含瘦肉精猪肉牛肉、采购大量美国昂贵先进武器，企图换取美国保护看来，蔡英文极可能继续“装睡叫不醒”。马英九若想发挥其影响力，就得先说服党内同志及蓝营选民，再唤醒广大台湾人民，对执政当局发出“要和平、反战争”的怒吼，以迫使蔡英文当局停止对大陆继续挑衅，并设法改善两岸关系。

统一是大势所趋，无可回避，但能否和平统一，取决于台湾人民的抉择。愿台湾所有爱好和平者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作者为统一联盟党主席、《观察》杂志发行人)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员众多，基本上都是活跃在台湾地区以及欧美国家的“台独”分子，如：荣誉主席吴荣义，系民进党资深人士，与陈水扁关系密切，曾连续多年担任“独”派大佬辜宽敏创办的“新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2001—2005年担任陈水扁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国策顾问”，2005—2006年担任台湾行政部门副负责人，并于2006年出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董事会主席赖义雄，系“台独”组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NAPTA)前会长；执行主任萧良其，曾在美国专注台海关系研究的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在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任国家安全研究员，与民进党高层尤其是吕秀莲关系密切；副董事长胡兑昀，系民进党新世代人物，先后担任陈水扁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英文秘书”、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研究委员，2003年担任陈水扁创办的民进党外围组织、“台独”培训机构“凯达格兰学校”公共事务部主任；副董事长叶介庭，系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台独”作家。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由众多“台独”人士募款设立，成员涵盖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台湾地区。其中，“台独”组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为中心发起募捐，得到众多“台独”分子和亲绿台侨、台商的支持。其他出资人还包括：民进党资深人士、2000—2008年担任陈水扁当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张富美；民进党内“台独联盟系”大佬、资深“台独”资本家、“台独”组织长老教会前总委长老、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主席、台湾“民视”董事长郭倍宏；“台独”企业家、民进党重要金主、陈水扁的重要支持者、长期资助“台独”运动、被称为“独派军师”的纽约台商黄文局，等等。

二、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美国推动的议题

虽然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自我标榜是一家在美国注册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是其根本目的与宗旨却是帮助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对美国进行政治游说。因此，自从成立以来，中心便凭借其身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优势，密集谋划创设议程、制造话题，大肆推动与台湾相关的公共议题在美国进行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美台关系

虽然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关注的议题非常丰富，但美台关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中心高度重视美国的对台政策，极力推动“1994年美国对台政策检讨”的修改与更新。2016年9月28日，中心成立不到半个月就在华盛顿举办了正式的研讨会，主题为“回顾22年来的美国对台政策”，邀请多位美国知名智库学者和台湾问题专家，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罗曼，以及美国前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处处长、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副处长的葛天豪。会议分析美台关系情势，以及美国参众两院提出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取消台湾高层官员不能访问华盛顿的“台湾旅行法”。另一方面，中心致力于在已有基础上提升美台关系，包括美台在亚太地区的海洋合作、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为此专门召开会议，邀请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罗斯雷提楠进行研讨。罗斯雷提楠在中心表示，“美国对台湾整体安全的承诺必须提升”。

(二) 台湾涉外关系

作为“台独”智库和绿营外围组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也积极为民进党当局的对外政策做各种解释说明、摇旗呐喊工作，关注台湾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例如，蔡英文当局力推的“新南向政策”，甚至将台湾与缅甸的关系也纳入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在台湾所谓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上，中心与民进党步调一致、紧密配合，极力鼓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各种国际事务，争取“国际活动空间”。例如，罗斯雷提楠出席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开幕式时表示，“美国国会每年都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努力”“近几年来加速推动台湾安全，协助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等机构”。

(三) 两岸关系

民进党认为，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向美国陈情、

替台湾发声、给中国大陆施压这些工作，由身处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出面往往比由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处出面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两岸关系议题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自然也成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关注的重点。例如，2017年9月14日举办的研讨会，邀请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海戴维就台湾所谓的“安全问题”发声。海戴维谈到台湾军事问题时声称，“中国大陆将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他还宣称，美国应全力协助台湾，包括提供武器设备、进行训练以及与台湾防务部门官员进行对话，做必要的沟通与交流。

（四）美国对华政策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做手脚，是民进党一贯的伎俩。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深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所以抓住这个特点，紧盯与台湾相关的美国对华政策，并积极纳入讨论议程，意图向美国施加相应的影响力。2016年10月13日，中心举行主题研讨会，邀请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研究员、对华军事问题专家易思安，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前政治军事幕僚安大维等人出席，就亚太地区海洋安全、南海问题、台湾“潜舰自造”等问题广泛讨论。易思安在研讨会中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妄称“当前的三大威胁是中国、俄罗斯、伊斯兰国”“未来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国”。他还抱怨，“受制于美国政府不承认台湾，与台湾无正式邦交，台湾在美国的重返亚太策略中明显遭到低估”。另外，他还鼓吹“台湾在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中可以扮演要角，建议……开放美台官员互访”。

三、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对美国进行游说的方式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美国进行游说的形式多样，就连其副董事长胡兑昀也坦言，“不会只有智库的功能，还会有其他的企划，草创之初会以政策讨论的方式与大家互动”。从实际运行来看，中心最常见的游说方式就是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有影响力的美国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联邦议员、智库学者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通过政策讨论，影响这些人的思想与观念，进而形成有利于台湾的政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建构与美国国会的密切关系

民进党深知，在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议会被视为“民主的殿堂”，因而把推动“国会外交”当作其“务实外交工作重要的一环”。蔡英文上台以来，更加重视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因此，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方面积极与美国国会议员“攀拉”关系，建构起亲密的私人关系网，以私人关系推动涉台事务；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研究人员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深度建构与国会及国会的工作关系。例如，2017年6月15日，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其就亲自参加美国众议员外事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从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美台关系的重要性。

（二）举办各种活动与美国重要人士攀拉关系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经常利用自身的资金和平台优势，帮助美国高校学者、智库专家、政府官员以及国会议员举办各种活动，借此搭建人脉、攀拉关系。2017年5月24日，中心为白宫前国安会议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亚洲与日本事务资深副总裁葛林举办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葛林不仅对蔡英文执政一年来的各项政策积极评价，而且还就台湾经济发展等相关议题为蔡英文当局建言献策。此外，中心还为众多美国专家学者举办新书发布会或著作讨论会，如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美国企业研究所迈克尔·奥斯林等。

（三）借学术研讨会收集资讯、影响政策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不仅经常单独举办研讨会，还常常与美国高校、智库联合举办研讨会，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BR）、2049项目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通过研讨会，使自己作为一个讨论平台，一方面了解美国对台政策的最新动态和走向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向这些足以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参会者传递台湾当局的立场、想法与关切，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形成过程。

（四）借典礼、节庆活动邀请美国政学界人士为台湾发声

为了更深入地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和国际社会，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经常借典礼、节庆等活动邀请美国政学界人士为台湾发声。如开幕典礼上，即邀请了美国主管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以及国会议员出席。曾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经过重重检查站与蔡英文在迈阿密会晤的罗斯雷提楠，甚至从对外贸易、国际空间、防卫安全等方面公开为台湾发声。

四、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对美国进行游说的特点

自成立以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便以“见缝插针”的方式对美国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游说，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可以发现，中心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呈现以下鲜明特征：

（一）点与面相结合。“点”是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对美国进行游说的重点，“面”是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涉及的范围与领域。从针对的目标和对象看，中心一方面深知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出发，美国国会对于台美关系的重要性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仍将游说重点放在国会上，紧盯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另一方面则根据形势变化和条件允许情况，视情挖掘可以利用的其他资源，重点是美国国务院官员、智库专家、高校学者等可以对美国涉台政策施加影响的群体。

（二）官与民相结合。“官”是指美国官方人员，“民”是指美国社会与民众。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始终以对美游说、提升美台关系为根本目的，因此其一方面紧紧锁定美国官方人士和具有官方背景的相关人员，将游说的触角伸向可以对美国官方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的一切人员，包括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国务院官员以及智库专家等；另一方面也积极扮演民进党在美国的“代言人”“代理商”“经纪人”角色，努力开展“公共外交”工作，通过把握美国媒体、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的特殊心理，向美国各界广泛宣传“台独”势力的政策、理念和价值观，塑造对台湾有利的舆论氛围和政策环境。

（三）旧与新相结合。“旧”是指台湾对美游说所依靠的传统力量，“新”是指对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有用的新资源与新人脉。从使用和依靠的力量看，中心一方面全盘接收了历史上台湾对美游说的传统，重用在美国政学界具有政策影响力的资深人士，包括美国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以及在美国具有声望、地位和影响力的台侨，把他们当做资深且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极为重视青年工作，努力培养“台独”势力的接班人，不仅重用新一代台裔美国人，还积极培养年轻世代，以期“把强化台美关系的愿景传承给下一代”。

（四）近与远相结合。“近”是指聚焦热点，关注当下；“远”是指放眼未来，布局长远。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一方面始终紧跟时事动态，围绕美国与海峡两岸互动的最新情况，推动各类涉台议题的讨论和政策辩论，进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的议程设置；另一方面还立足长远规划，通过为美台双方的科研人员、青年学者等提供奖学金、常驻研究岗位等机会，培养新生代的美国“台湾通”和台湾“美国通”，培植美国的“亲台人士”，以图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蔡英文的对外战略中，寻求美国支持、培植美国亲台势力、发展美台关系是重中之重。近年来，民进党和各种“台独”势力积极串联，为蔡英文当局“力抗中国”和“渐进台独”的政策服务。在这些谋划之下，“独”派势力动作不断，频繁与各种国际亲台势力进行接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得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有了一个全新的对美游说平台，以“智库”身份做掩护，利用其在美国登记注册的“合法身份”，发挥所谓的“学术研究”功能，实际扮演民进党当局的“白手套”角色，发挥着代表民进党和“台独”势力对美国进行游说的作用。这个“有台湾背景专注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智库”，正一步一步成为蔡英文当局和“台独”势力期待的华盛顿地区“以台湾为研究核心、规模最大的智库”。对此，中国大陆应高度重视，警惕蔡英文当局利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对美国进行的“台独”政治游说。

台湾“全民防务教育”综述

■ 瞿定国

2000年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承袭李登辉“两国论”衣钵，在第一任期就提出“一边一国”论，大搞激进“台独”活动。到了陈水扁第二任期，台湾当局又于2005年推出台湾“全民防务教育法”，在全社会开展所谓“全民防务教育”，为推行“台独”路线大造舆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后果。

一、制订“全民防务教育法”

2005年2月2日，台湾当局公布“全民防务教育法”，共15条。第一条明确指出，是“为推动全民防务教育，以增进全民之防务知识及全民防卫意识，健全防务发展，确保安全”。“全民防务教育法”还对推动教育的主管机关、实施范围、教育内容、奖惩事项等做出明确规范，为开展“全民防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

翌年2月2日，“全民防务教育法”正式施行，主管机关为台湾防务部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台湾防务部门全权负责各项推动事宜，整合相关“部会”、各地方主管机关、“全民防卫动员体系”、各级学校及社会团体等单位，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结合各项文宣及多元化辅助活动，将“全民防务”理念及知识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之中，借以提升教育效果。

2005年6月1日至30日，台湾防务部门举办网际网络公开票选活动，并经行政部门核定，以每年9月3日(台军“九·三”军人节)为“全民防务教育日”，在台湾各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结合进行“防务教育”，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使民众深化“爱国爱乡”情怀，激发守护家园的“忧患意识”。

二、施教范围涵盖全社会

根据“全民防务教育法”，台湾防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经常方式实施为原则”，透过教学课程安排，结合文宣与多元辅助活动，从多方面开展“全民防务教育”，努力扩大教育成效。

(一)学校教育

台湾各级各类学校，依据“全民防务教育法”规定，必须将“全民防务教育”纳入教学课程，使学生能透过多元、活泼、自然且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建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凝聚守土有责信念，“发挥总体防卫力量”。

为建立全面性“整体防务安全观”基本概念与共识，台湾防务部门强调推动“全民防务教育”的扎根工作。整合防务与教育资源，将“全民防务”内涵融入中学、小学现行课程中，包括语文、社会、自然科学、乡土文物、生活与伦理等，培养学生“爱乡爱国情操”。配合周会、月会、团体活动，运用电视媒体教学，每月实施2小时宣导教育。

在高中(职)学校中，结合现行“防务通识”课程，包括与“防务军事”“全民防卫”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心理等内容，均应安排学习。3学年内必须完成4学分必修课及4学分选修课。每月实施2小时宣导教育。

大学教育，结合现行“防务通识”课程，包括两岸关系、“防务组织”、军事交流、区域安全实施等内容，均应安排学习。依大学教学自主政策，提供4学分选修课程。每月实施2小时宣导教育。

(二)政府机关(构)在职教育

台湾当局认为，公务人员是各项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必须了解现代“全民防务”的重要性及精神要义。政府各机关(构)

依据其工作性质，通过行政部门“人事行政局”“保训会”等现有教育训练管道，对所属人员定期实施“全民防务教育”，每人每年4小时。

台湾防务部门以“国际情势”“防务政策”“全民防务”“防卫动员”“防务科技”为五大教育主轴，通过“全民防务在职教育课程”，增进公务人员“防务知识及防卫意识”。力求公务人员在未来执行“国土防卫”、灾害防救或是公民教育相关工作时，都能将“全民防务理念”融入其中，使人人都能为“保乡卫国”尽一己之力、提升“总体战力”。

（三）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主要内容包括军民关系、社区民防、灾害防护、反恐演练等，借以“储备社区防卫潜能，战时转换为保乡保土力量”。

由各级主管机关制作全民防务教育电影片、录像节目带或文宣数据，透过大众传播媒体播放、刊载，积极凝聚社会大众的“全民防务共识，建立全民防务理念”。

强化网络平台，结合时势潮流运用互联网、社群网络，扩大宣传效益，分享信息并创造与民互动议题，强化民众参与，并争取青年族群的支持与认同。

（四）防务文物保护和教育

为持续结合文物观光导览，彰显“防务教育”理念，台湾各级主管机关负责管理各类具有“全民防务教育”功能的军事遗址、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文化场所。加强对具有“防务教育”意义文物的搜集、研究、解说与保护工作。运用辖区内网站和文宣平台提供相关信息，介绍其历史背景与“防务教育”内涵，达到“全民防务”宣教目的。

台军军（队）史馆现有158处，其中“国军历史文物馆”“空军军官学校校史馆”“防务医学院院史馆”3处，可以自由参观；其余155处，因分散在各营区内，只有在节庆、恳亲会、“全民防务活动”，以及经公务机关专函申请后才对外开放。

三、教育活动方式多元化

（一）举办假期“战斗营”

1.“暑期战斗营”

2006年台湾正式施行“全民防务教育法”，台军当即推出“全民防务教育暑期战斗营”活动。由台湾防务部门主办、教育部门军训处协办。一年举行一次，至2019年已举办14次。每年各营队均以多梯次、每梯次5天左右实施，参加人员一般3000名左右。

历年的“暑期战斗营”，设置有“金门战斗营”“马祖战斗营”“澎湖两栖战斗营”“伞训特战营”“铁甲战斗营”“两栖勇士挑战营”“飞行暨防空体验营”“海上体验营”“成功岭战斗营”“铁卫战斗营”等。为了最大程度吸引青年对参加“战斗营”的兴趣，台军安排了多种体验项目，包括“战技实作演练”“轻兵器实弹射击”“野外求生辨识”“高塔训练”“战车炮实弹射击”“AAV7两栖突击搭载训练”“T-34、AT-3教练模拟机体验”“夜战训练”“90手枪实弹射击”等内容。通过“实训、实作、实况”，引导青年体验“防务”的重要性。

每年4、5月，“暑期战斗营”开始在“全民防务教育全球资讯网”上报名。台军《青年日报》、汉声电台、各高中（职）大学教官室、“国军人才招募中心”、各县市宪兵队等场所亦提供相关资讯。报名表上需要家长（或监护人）、学校（教官）签章同意始能受理。学员参加的项目不同，所需交纳的费用也不同。

据报道，“暑期战斗营”结合防务专业和军事特色课程，采取“寓教于乐”的活动方式，实施多元教学，受到了青年学子的喜爱。

2.“寒假战斗营”

鉴于“暑期战斗营”不能完全满足青年学子的需求，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第二年，开始增加举办“寒假战斗营”，规模较“暑期战斗营”略小一些。例如，2018年“寒假战斗营”分别由“陆军司令部”(2次)、“海军司令部”(1次)、“空军司令部”(9次)、“宪兵指挥部”(1次)及防务部门“政治作战局”(3次)等单位办理，共计18类营队，21梯次，接训1290人。

3.“南沙研习营”

台湾当局为了强化民众认识与支持其奉行的南海政策，建立了“南沙研习营”，以南海历史考证、海洋法制研习、战略情势研究及海洋生态体验为主轴，借实地考察，深耕疆域意识，激发青年学子热情，凝聚“全民防务共识”。鉴于南海局势诡谲，且组织赴南沙太平岛的人员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所以不宜称“战斗营”而改称“研习营”。“研习营”活动一般纳入当年“暑期战斗营”规划中。

例如，2012年“南沙研习营”活动，分别由台湾成功大学（第1梯次）、台湾大学（第2梯次）各遴选教师2人、博士硕士生12人组队参加。台湾“国安会”还邀请佛光大学教授王汉国、“国防大学”教授马振坤，分别担任1、2梯次随队老师，通过举办讲座，增进学员对南海情势和战略的认知。第1梯次于7月9日至15日完成。第2梯次因台风影响延长时日，于8月19日至29日完成。航程期间，师生见证了舰上实施实务操作，登太平岛探访文物史迹，并与岛上驻防官兵一起举行升旗典礼，激发青年学子“爱国”热情。台湾海军也派遣官兵代表登岛巡礼，激励捍卫疆土的使命感。

又如，2018年“南沙研习营”于4月至7月举办，分4个梯次，开放岛内各大专院校系所研究生报名组队。每梯次由3所学校师生组队参加。第4梯次专案办理，由台湾教育部门遴选中小学从事“全民防务教育”课程教师21人参加，以扩大“全民防务教育种能”。共计9所学校、84名师生参与活动。各学校随队教师兼任正、副领队，担负讲授研究领域相关专业课程的任务。各梯次学员按惯例参访太平岛五号淡水井景点，并举办升旗典礼。此次研习营活动，还链结全岛校园网络，举办网络抽奖活动，提升了教育能见度。

（二）开展“防务体验之旅”

台湾防务部门为推广“全民防务教育”，以“防务施政透明化”为宗旨，在不影响战训本务遂行下，每年为岛内民众、学生、媒体和民众团体，举办“防务知性之旅”。本着“南北城乡平衡、军种不缺席”原则，由各作战区统筹地区内三军部队，选择大型营区，配合重要庆典、民俗节日、部队队庆及地方大型活动等时机，扩大办理营区开放活动，借以呈现多元、丰富的“建军备战”成果。活动内容静态陈展有：各式主战装备、军史文物、营区设施等；动态战技操演有：实兵战术演练、装备性能操作、特勤队战技操练等。仅“全民防务教育法”公布当年“双十节”后的8周，台湾防务部门组织“防务知性之旅”77场次，近50万民众到台军各部队参观。

“防务知性之旅”活动，由军方采取主动邀请或受理申请方式办理。各界申请参访及支持相关活动属单一军种、单位范围者，由单位依权责办理，申访单位可以径洽各军“司令部”、“国防大学”、本部及所属直属单位协调办理，以缩短申访流程，有效运用“全民防务教育”资源。

（三）结合军事演习宣导

台军军事演习繁多，“全民防务教育”主要是与后备动员类演习相结合：

一是以军警民联合防空为主要内容的“万安”演习，自1978年以来每年举行1次。演习由防务部门负责，后备司令部组织执行。采用预警方式，在各地区分场次进行。每一场区演习参演人员多达数万人，各型车辆近万辆。重点演练电力、电信、供水、天然气等特种工程抢修和紧急疏散、避难、灾民收容救济等科目，以此检验全民防空意识和措施，地方重要政经设施安全防护能力，以及民间动员力量和支持军事作战效能。

二是以检验完善后备部队动员计划的“同心”演习，配合年度“汉光”演习专设的人力、物力动员演习。演习均采取无预警方式实施，旨在强化后备军人“立即动员、立即作战”能力，测试后备部队动员效果，以及各项动员计划的可行性与指挥作业能力，考验后备军人闻令应召的守法习惯。

三是以验证战时岛内各行业人力、物力动员情况的“自强”演习。一般要开设“军征联合物资征集场”，将所征得的油料、卫材、建材、交通、机械、燃料

等物资，通过县府、团管部、警消、民间厂商等单位，对后备动员部队实施补给。同时，地区的油库、医疗院所、汽车保修、后勤厂库和运补单位还要进行征用演练。

四是以“核安”“化安”等为内容的核化类演习。主要目的是演练军民排除核污、化毒救灾。通过民众参与实际演练，增进对核意外事故的了解和防护，每年进行1至2次。由台湾行政部门“原子能委员会”“核事故处理委员会”“核能研究所”“卫生署”和陆军防化部队、“警政署”空警队参加。

这些演习均属于“全民防卫动员”，主要是人员、物力和财力的动员。各级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社区大学、社区发展协会等民防体系，一方面参与完成演习任务，另一方面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对民众进行“防务教育”。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强化单位整合

由台湾防务部门牵头，成立“全民防务教育委员会”。台湾教育部门依据“各级学校全民防务教育课程内容及实施办法”，行政部门“人事行政总处”依据“政府机关机构全民防务教育实施办法”，文化部门依据“防务文物及军事遗址管理实施办法”，相互协调、共同推动教育开展。各“直辖市”、县（市）政府遵照上面部署，开展教育活动，并进行考核评鉴，奖励绩优，促进深化。

（二）筹划师资教材

在“全民防务教育”正式开始前，台湾防务部门即抓紧培养近程师资。从各单位遴选具有博士、硕士或战略、指参、政战研究班军队干部共800名，台湾教育部门军训教官1600名，共计2400名。通过举办8个梯次的短期研习班，将他们培养成“教官种能”。

由“国防大学”纳编各军事学校、中山科学研究院、“总政战局”，成立“编审委员会”准备教材。根据授课对象与程度，编撰教材及录制录影带，发放各单位教学运用。根据国际形势、两岸情势、岛内时事发展，适时修改和调整教材内容。

（三）总结教育经验

为统一各单位教育做法及业务横向联系，台湾防务部门与各“部会”、各县市政府建立良性互动，及时召开工作推展研讨会，邀集相关单位业务主管及承办人出席会议。通过专题报告、经验分享、政策说明与观摩学习等方式，搜整兴革意见，提供政策参考，精进“全民防务教育”推展。“国防大学”亦适时举办学术研讨会，研讨和解决教育中遇到的问题，更好地推动教育活动的落实。

每年度，台湾防务部门负责汇整各项事业主管机关、台军联参及相关单位、各军“司令部”、后备指挥部“防务教育”执行成效，并研提精进做法，向立法机构“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函送“全民防务教育推展执行成效项目报告”，供其了解情况和审核指导。

五、思考和评说

在台湾实现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后，从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尽管在战术手段和策略运用上有所不同，但在战略上都是顽固不化地全面推行“台独”路线。其中有两大“政治工程”（马英九语）举措应予特别关注：

一个是调整“课程纲要”，篡改历史。陈水扁上台时就搞了个“去中国化”的课纲，马英九执政后，进行了课纲微调，但并未真正“拨乱反正”。蔡英文上台后，不但否定了马英九的课纲微调，更作了大幅度修订。现在曝光的台湾“12年国教社会领域课程纲要草案”，宣称将原本“以汉人为主轴的史观”改为“重点放在台湾最近五百年脉络”，把高中历史科目的中国史列入东亚史，并要构建“以台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

另一个就是“全民防务教育”，旨在毒化民众，以祖国大陆为敌。2004年陈水扁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更是猖狂地说：“中国是另外一国，不是本国，是敌国”，不能“错把敌国当祖国”。在视导台军演习时，陈水扁以解放军为敌，强调“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孙子兵法》）。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前者是要“断其根”，把台湾从中国和中华民族分裂出去，后者是要

浅析“台独民粹主义”的特征、形态及对策思考

■ 周天柱

2020年以来，涉台研究领域出现一个新的政治术语“台独民粹主义”，让初见者大感突兀。

欲剖析“台独民粹主义”，先说说“台独”的兴起与发展，以下三个时间段很能说明问题：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台湾当局镇压、打击，军国主义分子与汉奸在台湾建立的“台独”组织被迫移居海外，依靠美、日等外国势力支持生存发展；1977年8月，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公开提出“台湾的将来应由1700万住民决定”的“台独”主张；1986年9月成立的民进党，通过党纲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1991年10月，民进党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政治诉求列入新党纲。

政治学针对民粹的定义为：“煽动庶民偏见且经过政治精算的一种意识形态。”这20多年台湾的民粹现象，一开始带来所谓的“民主”，但是民主化的持续民粹，看似由暴民集体分享所谓的社会成果，但实际上是沦为特定政治势力及政治精英所操弄，权利根本与庶民无关。

台湾的政治民粹一旦与“台独”紧密相连、相合、相融，越显其互相依靠、互相作用、谁也离不开谁的特质。其发展的动向必然是陷入走偏锋、极端化、失去掌控的暴力倾向而无法自拔。

“台独民粹主义”的特征

翻阅欧美西方史卷，追踪、总结民粹主义的特征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内涵及表现形式的民粹主义一般都具有三大特征，即非理性、对抗性、极端性。这三个特征在学西似西、学西胜西的“台独民粹主义”那里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蔡英文感到光有这“三性”还不够，她所发挥创造的第四性，即外溢性，则有助于扩大“台独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与蛊惑力，从而有助于民进党在岛内一党独大，长期执政。

特征之一非理性：“台独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以两岸经济合作为例。台湾岛

“树其敌”，把祖国大陆和解放军树立为“台湾的敌人”，恐吓台湾民众。两大“政治工程”相互衔接、互为作用，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其实质都是在以“文化台独”为“政治台独”打基础。有台湾网友分析，蔡英文今年的胜选，正是得益于上述教育的成果，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投了她的票。值得重视和警惕的是，春节期间，蔡英文志得意满、别有所图地前往台军部队视导慰问，抛出了“改国名”的新招，诡称“中华民国台湾”已经“独立”，要求台军“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坚定对“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旨在把台军绑在“台独”战车上，达到“以武谋独”的目的。然而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的，蔡英文等顽固“台独”势力在《反分裂国家法》的强大威力面前，其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距离祖国大陆相当近，缺乏独立、完善的工业农业体系，当年因认同“九二共识”的国民党当局与祖国大陆协商所签订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让台湾获益匪浅。可以很明确地说，近10年每年台湾在两岸进出口贸易中平均顺差600-800亿美元，都离不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台湾目前正在享受的出口祖国大陆的539项产品零关税，以及从祖国大陆零关税进口的267项产品，都极具价格竞争力。

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尽管民进党当局没有明确接受“九二共识”或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但祖国大陆基于善意，让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协议继续运行，耐心等待民进党当局迷途知返。但民进党当局不仅继续坚持“一边一国”“一中一台”的两岸关系政治定位，而且大肆推动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台独”分裂活动，极其顽固地以“亲美反中”路线对抗祖国大陆。如此非理性地颠倒是非曲直，是祖国大陆绝对无法接受的。

特征之二对抗性：当今的台湾，“台独”合法化后，由民粹作为支撑，蔡英文当局什么都不怕，似乎胆子越来越大。某些以前敢做不敢说的“台独”，如今不但敢做，也敢说了。而其护身符很简单，只要转嫁于“主流民意”，抬出各种受其蛊惑、煽动的民调即可。如此这般，其对抗性自然就大大增强。这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放出魔鬼“台独”，搅乱了台湾社会，引起思想混乱，认同混乱，造成族群对抗，蓝绿对抗，统“独”对抗，社会对抗，政治对抗，台湾陷入一个处处与祖国大陆对抗的泥潭。分裂主义的发展，造成民粹主义泛滥与盛行，民粹如同幽灵始终笼罩在台湾上空。带有分裂主义印记的“台湾”一词被神化，它代表着“国家”，代表着“正义”，代表着“主权”，丝毫不能被“矮化”，不可“退让”。“爱不爱台湾”是衡量一切问题的惟一标准。在此逻辑下。民粹主义进一步猖獗，进一步蔓延，连纯医学领域的疫情防控也涂抹上对抗、抵制祖国大陆的色彩。可以慷慨地将几千万只医用口罩主动捐赠给美国，但一只也不会送给祖国大陆，自认为以此就可以羞辱、中伤、折损祖国大陆。而没有连任压力的蔡英文及其团队，把更多统“独”议题摆上台面，如推动华航改名；进一步检讨“中华民国护照”的英文“国号”；欲伺机进行“台独”“公投”等，公然摆出一副为所欲为、四处挑衅的架势。

特征之三极端性：民进党的“斗争政治”以网络社群作为新的场域，谁能在网络上呼风唤雨，谁手上豢养的网军战力最强，谁就能冒头分得一杯羹。即便在现实政治落选也无碍，照样有酬庸和资源作为补偿。在这种生态下，民进党一方面延续了原有派系和家族的政治传承，另一方面也及时发掘和补充了新生力量，并且在培力过程中扩大了青年支持基础，进而和“反中民粹同温层”的建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然，这也造成了当下“反中”民粹覆水难收的困境。这是民进党在网络时代操弄权力政治的必然结果，给两岸关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议题排异”的极端性则是“台独民粹主义”最爱采用的煽动方式。民进党通过各种议题，如“转型正义”“守卫家园”等煽动民粹，形成各种有利于“台独”的认同，形成全方位垄断的“合法”地位和越来越偏激偏“独”的强制性，造就夺取阵地、同化异端和巩固“台独”阵营的结果。

“台独民粹主义”的极端性在两岸经济交流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确。既要考虑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要首先考虑政治安全。台湾积极争取外资，却拒绝与阻碍祖国大陆资金流入，对陆资大力设卡与管制，但对美、日资金不设限。不开放祖国大陆农产品入台，不开放祖国大陆劳工在台合法就业，而与此同时在台的外籍劳工超过了40万人。如此不讲理的极端性，在当今世界堪称独此一家。

特征之四外溢性：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充分利用“台独民粹主义”，与一切旨在谋求

分裂中国的境内外分裂势力互相勾结或进行外部整合，呈现向外延伸的发展态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勾结、支持香港反对派，暴力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反对祖国大陆。

2019年“台独民粹主义”势力与外部势力联手策动的香港“反修例”风波，运用所谓的“民粹政治”，攻击中国中央政府，极力歪曲抹黑“一国两制”，妄图趁乱夺权，颠覆香港特区政府。当风波越闹越大后，被煽动者只能被动跟着“送中”这个符号走，理性思考与修例意义被彻底扭曲。“台独民粹主义”利用香港风波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一是蔡英文当局利用香港风波，全力反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提出的五点主张，要印证“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二是依此进一步推理，蔡英文一直就是坚决反对“一国两制”。只要选民支持其连任，保证台湾决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蔡英文狂胜对手265万票的成功连任，大大激发了“台独民粹主义”外溢的非理性、对抗性、极端性与冒险性。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认为，民粹主义的温床是各国、各地区的重大选举。但选举过后，竭尽种种手段胜选的派别或政党，为稳妥上台执政，发热发烫的头脑会逐步冷却下来，不断修正超越底线的政治轨迹，使得社会秩序恢复走上正轨。而台湾民进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度政治化的台湾社会在民进党操持、蛊惑、煽动下，以祖国大陆为最大对手，千方百计在“去中国化”的绝路上越走越快。

“台独民粹主义”的形态

回顾台湾历史，在岛内政坛盘踞70多年的“台独”，已不是简单的“台湾独立”，而是具有更为复杂形态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培育、纵容、唆使下的“台独民粹主义”，具有更为危险、好战的特性，主要表现形态有以下几种：

“中华民国台湾”。这种形态的创造发明权应归属于蔡英文。其文理、文法不通暂且不说，因蔡英文说得太多，自我感觉好像知名度有所提升，但可惜的是即使受惠台湾的15个所谓“邦交国”代表，在联合国提案时也仅说“中华民国”，气得蔡英文暗自叫苦，做的全是无用功。

民进党在“台独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上花了很大“心血”。从“中华民国在台湾”，到“中华民国是台湾”，确确实实是向着“台独”迈进了一大步，再进化到“中华民国台湾”，实在是让台湾民众一头雾水。从表面上看，“中华民国”与“台湾”等同，但究其实质，究竟是“中华民国”的“台湾”，还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条让人明白，宪制性规定的“一个中国”已束之高阁。所谓的“中华民国”仅仅是“台湾”的遮眼布。“中华民国台湾化”是当下在民进党当局一手操弄下，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趋势。

“一边一国”论。这个论述自成的形态，是陈水扁在李登辉“两国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台湾国家论”。历经近20年风云，已被绿营公开定位为“台独民粹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

尽管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的第一份就职演说提到“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时，自辩“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但整个论述仍然是“台湾—国家”框架，其策略是偶然用“中华民国”，如今是干脆不用，而在涉外正式场合一律用“中华民国台湾”。于是形成了蔡英文的“台独”新表述：“中华民国＝台湾＝国家”。

“台湾历史与起源建构论”。蔡英文首度胜选上台后不久，即以台湾地区领导人身份正式向原住民道歉，推动“原住民转型正义”，以确立原住民是台湾真正的主人，而汉人仅是外来者，以此从历史源头否定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的论述。

为切割两岸血缘关系，建构“血缘”上的“去中国化”，民进党当局炮制的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煞费心机地加入“南岛语族”与“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等概念后，再用粗糙与错误的数据，

力主台湾近85%以上的人都有平埔族的“南岛语族”血统。这种“台湾国族血统论”自然经不起遗传学的科学检验，但是却被民进党拿来作为“教育台独”“文化台独”的依据。蔡英文2017年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时，即别有用心地定名为“寻亲之旅”。在蔡英文眼中，太平洋岛国的原住民才与台湾是一家亲，进而想尽办法杜撰了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论”，认为“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族”。这样做的玄机何在？蔡英文当局幻想用“南岛语族”取代“中华民族”地位，甚至从脱氧核糖核酸(DNA)角度否定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试图从民族角度“去中国化”，配合捏造“台独”理论中的重要支撑——“台湾民族论”。

变相“法理台独”论，即推动“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许多学者认为，蔡英文第二任期不会也不敢推动“法理台独”。但应该看到，所谓的“法理台独”也有两面性，一面是刚性，如公开制定“台独”“宪法”，或公开宣布建立“台湾共和国”，这些是标准的“法理台独”；但与此同时，另一面是渐进的，即“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李登辉大搞“修宪台独”；陈水扁一味推动“公投制宪”，故被称为“制宪台独”；蔡英文则更进一步，提名公然宣扬“两国论”的“台独”大法官，未来存在“释宪台独”的可能性，即通过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政治定位与台湾“国家性的宪法”解释，就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释宪台独”。

对策思考

今天的台湾，面临的最大现实是如何面对祖国大陆。台湾无法回避祖国大陆，无法回避两岸议题，无法回避两岸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为此，当下就祖国大陆而言，如何遏制、打压“台独民粹主义”显得格外重要。

为迎头痛击“台独民粹主义”的猖狂势头，加快两岸统一的步伐，可以同时抓两手，一手抓15年前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的升级版，针对“准法理台独”与“释宪台独”等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与宣示。进一步阐明台湾岛内外最为关切的祖国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红线。另一手更为重要，要适时、尽快颁布实施《中国统一法》。

需要明确，民粹决不等同于民意。民粹是被某种极端势力操弄、引导、偏向的民意，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与冒险性。岛内民意呈现多元、复杂、多变，甚至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对于多变、捉摸不定的民意，需要冷静、及时、实事求是地进行一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分析。祖国大陆关注的民意，是指与两岸关系变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岛内主流民意，囊括岛内同胞的思想、思潮、动向、意识等。要想引导台湾的主流民意向着祖国大陆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决非易事，这是祖国大陆必须面对的现实，但这也不是意味着祖国大陆无所作为。

欲改变“台独民粹主义”思潮，可抓住涉及两岸关系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做工作。譬如突然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蔡英文当局想方设法“以疫谋独”而责怪祖国大陆。要通过实例，向岛内民众讲清楚，只有两岸合作抗疫，才能真正战胜病毒，双方彼此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命共同体”。近来，台湾各界十分关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期后，祖国大陆会不会续签协议。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沈荣津多次强调，就算大陆停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清单，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也非常小。而事实是，少了这一块，岛内会有很多企业活不下去，会有很多劳工失业。需要提醒的是，岛内外有多家权威机构预言，后疫情时代很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经济大萧条。台湾靠贸易撑起经济发展，一旦出现人、货交流锐减，甚至停滞的逆转局面，台湾受伤的状况难以想象。紧紧抓住一个个重大事变后的教训与反思，才能让台湾民众有切肤之痛，才有可能回归理性思考，才能逐步认识“台独民粹主义”的极大危害。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解决台湾问题，不完全靠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更重要的是靠祖国大陆的综合实力和坚强意志。

从高雄市市长补选看国民党

■ 刘红

8月15日举行的高雄市市长补选，国民党候选人李眉蓁输了。作为1月台湾大选以来连续出现的“三连败”，对于国民党来说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只是愁云惨雾中再多一片乌云而已。9月6日，国民党第20届第4次全代会举出“世代合作，组织再造”“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大旗，雄心壮志之下，面临“三难”。

一、参选难

6月6日，民进党借助大选余波，生拉硬扯把韩国瑜从高雄市市长位拉下来后，形成了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李眉蓁、民进党的台湾行政部门副负责人陈其迈、民众党的亲民党籍高雄市议员吴益政参加高雄市市长补选格局。

（一）参选起跑不同

虽说是平等参选，虽说都是候选人，但实力、气势、影响大不一样。对于高雄市市长补选，国民党颇有自知之明，自觉缺乏胜选条件。

3党3人参选，民进党一党独大，陈其迈气势逼人，国民党、民众党无法匹敌。如吴益政代表的民众党号称岛内第三大党，但影响力不出台北圈，虽然党主席柯文哲借补选要为台北市市长届满后的政治升级在南部布局，但一方面缺乏实力，只是试水同类选举；一方面向亲民党借将吴益政，带来事实上蓝营分裂的结局，不仅不是为同为在野阵营的李眉蓁助攻，而且还要分走蓝营中本来支持国民党的选票。

相对国民党，民进党在高雄市的民意基础要深厚一些。民进党自1998年谢长廷依靠制造“录音奥步”，从国民党吴敦义手中夺得高雄市市长后，连续执政与“绿化”高雄20余年。今年1月大选期间，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高雄狂扫110万票，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自己任市长的高雄只得61万票，得票率差近20个百分点，得票差近50万票。到韩国瑜的市长职务被57万多票罢免，两败之下，在顺势而来的高雄市市长补选中，国民党和民进党不在同一重量级。

（二）辅选较量差距

高雄市市长补选，国民党、民进党都很重视，民进党视为报“九合一”选举败选之耻的复仇之战，国民党视为韩国瑜罢免后继续维持党在高雄影响力的保卫战。双方辅选文宣、喊话针锋相对，但是无论实力还是气势，无论政治动员还是支持度民调，陈其迈始终占上风，民进党锁定胜局。同时，在罢免韩国瑜案通过情况下，民进党料敌从宽，御敌从严，不敢轻视2018年“九合一”选举让韩国瑜拿到80万票“韩流”的存在，一方面倾全党之力进行辅选，蔡英文利用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进党主席双重资源全力助选，制造全党抬一人气势，一方面挹注巨资竞选，并将陈其迈包装为“暖男”和“清廉爱乡土”形象，“绿大蓝小”差距再被扩大。

观察李眉蓁参选，国民党辅选无力。受蔡英文当局“不当党产条例”打压等因素影响，国民党负债运行，无力为李眉蓁提供必要资金支持。国民党“团结罩门”始终难解，“大咖”辅选大都出人不出力，出力不出心。部分重量级人物甚至不参加辅选，14位国民党籍县市长南下

高雄辅选者不足一半，造成李眉蓁的选情一直处于危急之中。

选举结果不出所料，当然是李眉蓁输了。陈其迈获得67.1万票(70.1%)，李眉蓁24.8万票(25.9%)，吴益政3.8万票(4.06%)，与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李眉蓁333防线(得票率3成、得票逾30万、输对手30万票以内)有点差距。

(三)蓝营斗志缺乏

从迎战高雄市市长补选过程看，国民党显然无心再战，心有惧且力不足。

如消极迎战。作为岛内两大党之一，实力和形势不利，只要尽力尽心，把参选变成宣传和动员民众、揭露和批判“台独”施政的主阵地，也能唤醒社会，振奋党心民心，虽败犹荣。可是在补选初期，国民党就挂起“免战牌”，高调声称此仗重在练兵不为胜选，只是“以战养战”，紧急“止血”。先谈妥协应对，不谈如何杀敌，从气势、信心和士气上就先输一着。“补选战”仓促上阵，后勤保障和前线人力严重不足，“以战养战”成为“自生自灭”，“练兵”成为虚应故事，全党成为“受气包”，补选成为走过场。

如不敢应战。这是国民党的痼疾。长期以来，每逢重大选举，只要选情对国民党有利，党内大佬、大家族和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是见利就夺，见权就争，违纪参选成风，严重削弱党的候选人竞争力。远的不说，因为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狂胜，似乎为今年大选胜选打下基础，国民党党内初选出现严重内讧，成为韩国瑜惨败主因之一。

只要选情对国民党不利，党内大佬、大家族和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是萎缩不前，不敢出战。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这样，此次高雄市市长补选也是这样。台湾媒体点名称，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前党主席朱立伦等党内选举战将纷纷避战，唯恐败选伤及个人“政治温度”。能战的不敢战，敢战的不能战，国民党如何能赢？高雄市市长补选只能是一场消耗战。

(四)人选形象欠佳

无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是民意代表选举，特别是高雄市市长补选，都有关于国民党候选人不合适的议论。特别是后者，候选人李眉蓁更是被国民党内某些势力、部分社会舆情认为是败选主因之一。李眉蓁缺乏选战经验，在选战节奏和议题的掌控上欠缺火候，特别是“论文抄袭门”事件重创其形象，让选情雪上加霜。后阶段虽以主打民进党贪腐为突破口，链接韩国瑜时期的清廉形象，但选情难以逆转，拉票效果有限。

李眉蓁参选过程的局限性确实存在，一方面是她确实不是和陈其迈同级别的选举战将。在国民党内，要说在补选中一定胜选的人不多，但比她更合适出任候选人的有的是。一方面是赶鸭子上架，台湾媒体认为，国民党应该请一位在地清贫家庭出身、正派有口碑、有相当学养、打绿营陈菊贪腐卓有表现、对高雄市政有一定看法，可以随时修理陈其迈，把蓝营士气拉上来的候选人。

显然，李眉蓁与之有较大距离。李眉蓁的“论文抄袭门”选前在党内就有人提出，江启臣置之不理；李眉蓁不具备市政和反贪论述能力社会上早有议论，江启臣不为所动；李眉蓁遇到绿营攻击等造成的竞选困境，江启臣无力扭转。显然，李眉蓁败选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键是在众多男性“大咖”说了算的国民党官场，李眉蓁能够站出来，敢于斗争，勇于领战，还是值得肯定的。前有2015年3月洪秀柱“一人救一党”，站出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今有李眉蓁“一人救一市”，站出来投入高雄市市长补选。国民党如何克服重大选举时实力人物的个人盘算，减少政治算计，在补选一仗中再次提了出来。

二、在野难

国民党遭受“三连败”，士气、斗志、实力接连受挫。作为最大在野党，当好“称职在野党”也有难度。在野党称职与否的标准，众说纷纭，在野党称职与否的行动，多种多样。

但在台湾有个特殊之处，就是民进党两度在野，是如何利用在野党的身份和地位，为胜选执政创造条件的？国民党2000年3月首度失去执政地位，代表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连战只拿到21% 选票后，是如何复兴的？这些都可以从形式上成为评估国民党是否尽到在野党责任、实现在野党抱负的重要参照点。

（一）“绿强”压力空前

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生存环境较为恶劣，最突出的一点，是作为政治对手的执政势力野蛮生长。即使是补选过程，也有效地集结民进党等各类绿营力量。补选过程中，蔡英文全力助选，民进党各派系要角纷纷赴高雄站台。丰富资源的支持，多管齐下的辅选，无孔不入的宣传，使得陈其迈整体选情始终占优，成为对绿营基层支持者的政治动员。虽说陈其迈没有蔡英文在高雄的110万得票高，但也拿下七成选票，与“罢免韩国瑜”一事相配合，绿营在高雄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有所稳固。

高雄市市长补选后，“民进国退”态势进一步加剧，岛内政治版图更趋“绿化”。有祖国大陆学者指出，罢免韩国瑜案和补选获胜，进一步完成民进党在台湾南部的“拼图”，高雄成为其“政治禁脔”。同时，民进党在南部龙头高雄地区基础稳固，除嘉义市和台东县外，执政范围覆盖浊水溪以南。此外，民进党在1月大选中拿下台湾地区领导人及立法机构过半席次，控制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部门，已实现“完全执政”，达到“权力历史巅峰”。

在县市长层面重新取得高雄市市长后，民进党执政版图将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复仇之战”“雪耻之战”达标，再加上3战皆捷，这为打拼2022年“九合一”选举和2024年“二合一”选举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不仅是政治生态占尽优势，蔡英文当局更是利用“全面执政”的机会和舞台，全力打压国民党，政治追杀和经济打压双管齐下，更是逼得国民党透不过气，在野党的日子不好过。

在野党要有民意和民众支持，国民党并不乐观。台湾媒体认为，国民党没有出现气势回稳的迹象，1月大选中不分区民意代表得票数与民进党不分上下，分别约占33%（民众党11%），然而到了7月，就政党支持度而言，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民进党仍保有34.2% 支持度，而国民党却已跌至17.6%（民众党8.3%）。作为在野党，国民党要做“称职的在野党”，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不理想，需要通过发挥在野党作用去改善。

（二）抗争方式退化

遭受全景式打压、“三连败”下的国民党，与发挥在野党作用、努力改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个“称职在野党”还有一定距离。

一是加强对执政党的“议会监督”。在野党在立法机构监督执政党天经地义，民进党在野时，在立法机构监督国民党可谓“独”心所欲，弄得国民党手忙脚乱，束手无策。

马英九执政第一任期，在第7届立法机构113席中，国民党拥有86席。可是，被媒体誉为“可以横着走”的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几乎寸步难行，只有27席的民进党在立法机构横行霸道，多次成功阻止国民党所提法案。如在马英九上台之初，为缓解岛内大学面临的“招生难”，为岛内教育提供再度发展的机会，提出修改相关的3个“法令”，招收祖国大陆学生。民进党为了“台独”目的，不赞成两岸青年学生往来，阻挠“三法”通过。由于拥有席位太少，只得发挥27个民意代表的打架功能，霸占主席台阻止开会，最后将招收祖国大陆学生拖延3个学期实施。

马英九执政第二任期，在第8届立法机构中国民党64票对民进党42票。按照流行和习惯的“议会法则”，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提案和审议时应该是畅通无阻，事实上却处处受阻，事事难过。影响最为恶劣的是审议《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事件。绿营无视常识和惯例，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

主张“用政党数而不用席次多数”，造成两岸服贸协议搁置而引爆“太阳花事件”。

现在国民党已经在野近5年，在立法机构仍有38席，可是在学习民进党在野期间的“议会监督”方面，成事无几，当然也无法像民进党那样把立法机构当成影响社会、提高政党支持度的舞台，无法通过在立法机构的抗争对社会支持群体进行深度政治动员。显然，作为在野党的“议会路线”，国民党要多向民进党学习抗争手段、策略和战略，才能成为“称职的在野党”。

二是学习民进党组织群众运动。抓住执政当局的施政问题，发动和指挥群众上街抗争，这样能够加快社会议题发酵，引导政坛和舆论走向。这种“街头抗争路线”，民进党在野时成为主要抗争方式，或者说是民进党看家本领。

在成立至上台执政的前14年间，民进党主要是走“街头抗争路线”。2008年民进党第一次下台后，街头抗争成为常态，身为党主席的蔡英文亲自披挂上阵，指挥群众，围攻首度到台湾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至于马英九当局提出研究“进口美牛(肉)”规划，民进党更是组织民众上街，尤其是带领农民上街抗议，马英九被骂成是“出卖台湾人民利益、换取美国支持”的十恶不赦之徒。

国民党对“街头抗争路线”不屑一顾，一再错失战机，一再错失动员和发动民众的时机，一再错失提高国民党社会支持度的机会。如在“百万红衫军反贪倒扁”运动中，国民党有多少贡献？如蔡英文上台前两年的施政系列过失，很多民众自发组织过很多次上街抗争，国民党有过多少作为？

特别是民进党激烈反对、现在又反过来进口含有“瘦肉精”、危害民众身心健康的“美猪(肉)”，国民党似乎忘了当年民进党是如何反对准备进口“美牛”的马英九的。对于国民党反“美猪”时的表现，桃园市议员褚春来说，国民党不够理直气壮，才刚跳出来反“美猪”，“就又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有蓝营支持者在国民党官方脸书(Facebook)支持者专栏表示：“国民党已经被民进党生吞活剥还顾忌什么？还等着让人碎尸万段吗？就将这些绿营政客及蔡英文当年谩骂瘦肉精及美牛的影片、海报一一呈现给大家看！国民党的那些据点都可以放在外墙上每天播放啊！国民党继续只会用嘴巴无作为等着被歼灭吧！”

可以说，和民进党在野时“文武兼备”的“议会监督”“荤素不忌”的“街头抗争”相比，国民党“议会监督路线”是监少督无力，“街头抗争路线”是“温良恭俭让”。当在野党都当不好，还想当执政党？更有甚者，国民党第20届第4次全代会开会时豪情万丈，结果是高喊4年多的“重返执政”口号都不敢喊了。作为岛内两大党之一的国民党，作为政党轮替的第一竞争者，“重返执政”是第一位的。国民党竟然不敢提，缺少应有的政治自信到如此地步，令人瞠目结舌。

三、改造难

国民党参选和在野的难题，都是由党自身的问题造成，只有靠改造来解决。问题是国民党满身毛病，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党的改造要理想完成，有一定难度。

(一)核心论述要明确

只要说到国民党，都会说它的“核心论述”出了问题。党代会上江启臣致词表示，基于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的“九二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并寻求互动方式的与时俱进。党务报告表示，国民党“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与大陆的‘一国两制’”，主张“两岸交往与台美合作同步并行”，以维护台海和平；尽早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以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的服务贸易协议与货物贸易协议；呼吁两岸“官方”保障民间交往，避免干扰两岸正常交流。从内容上看，在保留6月改革委员会提出“新论述”主要内容的同时，将肯定“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

程中的历史性贡献，提升到肯定“九二共识”在“延续两岸互动，并寻求互动方式的与时俱进”的作用。

国民党党内几个月来围绕承认“九二共识”展开争论，江启臣听取党内意见、经过思考后，部分回到应有的立场。对此有媒体指出，国民党的“核心论述”为“九二共识”设置限制性条件，为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发展扮演积极角色设置障碍。国民党自我设限的后果是，不但提不出积极性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而且原有优势也进一步流失。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发展前景极不乐观，但可能正是国民党竞争对手民进党所乐见的。

台湾大学教授、曾在年初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张亚中认为，国民党拿着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喃喃自语，不能正视两岸政治难题，无法提出两岸解决方案，这是国民党长期的大问题。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内涵从缩小到异化，江启臣的两岸论述算是意味着国民党正式放弃了两岸核心论述。民进党笑了，期盼两岸和平的国民党党员也只能无奈地对空长叹了。

台湾媒体认为，江启臣主导下推出的“核心论述”“得到了中央党部系统以及地方派系的认同”，包括黄复兴党部在内认同两岸统一核心价值的反“独”力量已经离散，“部分党内高层在内部会议已经公开呼应所谓‘华独’主张，认为这是国民党唯一要走的路，年青世代则更为激进”。

曾任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副主任及青年部副主任的中评委、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则说，国民党要明确方向和终极目标在哪里。“国民党应先讲好自己与大陆和共产党的故事，梳理清楚两岸之间的关系，在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方面先下操作型定义，拿出具体作为帮台商、台生、陆配排忧解难，处理能够说到做到的部分，才能一点一滴争取台湾人民的认可与认同。”放弃“核心竞争力”、失去了两岸优势的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关键是，如果继续激化两岸政治矛盾，偏离坚持“九二共识”和坚决反对“台独”的“核心论述”，国民党的改造缺乏精神支柱，党的改造成“软脚蟹”，基本盘主体又要有松动。

（二）党的团结最重要

国民党组织问题很多，不团结排首位。作为“百年老店”，国民党内部存在派系、类似派系和派系式运作难以避免，如果处理得好，能够与中央党部和决策保持一致，人无二心，路无二道，那么便于全党动员和组织，如遇选举拉票，应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处理不好，另搞一套，则有很大破坏力，团结成为空话，干扰党的工作目标实现。

对国民党团结杀伤力最大的有两类，一类是实力人物之间的内讧，最为典型的有2013年10月的马英九、王金平之争，引发党内两大势力拼杀，成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2016年“二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主因之一。有2015年8月的“换柱”，在党内诸位大佬、大咖、战将不敢出战情况下，巾帼洪秀柱勇敢站出来参选国民党籍台湾大选候选人，被当时所谓“党内头号种子选手”朱立伦取代，引发一些党的支持者队伍的分裂投票。有今年1月大选，在国民党趋势看好、胜选有望情况下，出现韩国瑜、郭台铭、王金平3大势力参选，引发党内各大势力合纵连横，明里拆台，暗中扯腿，成为蔡英文狂胜、韩国瑜惨败主因之一。

另一类是派系的不同选择，严重威胁全党的一致行动和团结。就现有力量分布看，有“正统系”的马英九、连战、吴伯雄、吴敦义、王金平等多种组合，随着蒋经国、李登辉的集权统治结束，随着党内民主风气兴起和机制建立过程，各自确立起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基本是国民党核心圈主要成员，他们的态度和立场，是党内其他决策者做出决策时必须听取的。有侯友宜、卢秀燕等地方掌权派，由于是胜选上台的县市长，他们成为国民党政治实力、执政基础的重要象征，是国民党有所作为的实施和依靠力量。

有高育仁的南部大系，王金平的“王家军”，廖了以和颜清标等台中县“红、黑派”，嘉义地区的“萧家班”和云林的张荣味家族，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家族，台东饶颖奇家族，花莲傅崐萁夫妻档等，由于都在当地有很深的渊源，因而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重大选举时，对蓝营在当地的选票有相当大控制度。

作为“百年老店”，国民党长期执政和两度下台，内部形成不同政治势力实属难免，在党的运作过程中发生相关作用也很正常，只是此类问题已经严重干扰国民党的前进脚步。解决好利益分配、资源互补、相互支援问题，把重量级人物、县市实力派、地方大家族纳入全党发展轨道，特别是在重大选举时服从党中央的调度，成为国民党改造的重点。

（三）扶持人才要重视

国民党的人才，无论是技术型官僚，还是选举型人才，都要比民进党多。尤其是各类公职选举时的领军人物，国民党不比民进党差。问题出在，选情看好时，一拥而上，内讧不止；选情不顺时，无人挂帅，不敢迎战。该参选的不出场，不该参选的乱参选，该支持的不支持，该反对的不反对，在近几年来的选举中尤其明显。

从近几年的国民党官场和参选情况看，党内有人能够站出来，成为新领军人物。最为典型的是2015年5月和2019年8月参选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洪秀柱、韩国瑜，今年3月当选党主席的江启臣，今年6月参加高雄市市长补选的李眉蓁。尽管新人有不理想的地方，但主要问题是，很少得到全党、特别是传统上层势力的全力支持。台湾媒体认为，国民党传统势力往往带着有色眼镜，只想接受一些“党内官二代、核心圈人物、大佬代言人”。所以，新人不仅不能改变党内的“酱缸文化、老人政治”，而且还要时而被扯后腿。

在支持新人方面，国民党要向民进党学习。民进党党内权力、派系斗争之普遍和激烈，应该说超过国民党，但是民进党各派系和支持者，在党中央决定选举候选人后，基本能够搁置派系恩怨，都能自觉支持党的候选人。例如2008年5月党主席选举、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面对党内“三个太阳之争”，拒绝谢长廷、苏贞昌等资深大佬，接受党内资历浅薄、为党服务没有建树的蔡英文，出马代表民进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并胜选。国民党如果能够这样，韩国瑜就不会成为悲剧性人物。所以，国民党有新人，国民党不缺参加2022年“九合一”选举和2024年“二合一”选举的人选，关键是要摆脱“血统论、正统论”影响，一心一意扶持根据党内游戏规则冒出的新人。

说到人才建设，培养年轻群体十分重要。国民党缺少年轻党员，现有约34.5万党员中，30至39岁的只有6253人，占2.71%；20至29岁的只有2657人，占0.92%；19岁以下的只有212人，占0.07%。年轻党员不过3.6%，在岛内政党中少见。国民党不为年轻人所待见，在岛内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空前低。“台湾民意基金会”6月公布民调显示，20至24岁青年31.4%支持民进党，19.7%支持民众党，18.3%支持“时代力量”，支持国民党的为0。这就表明在每4年进行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和“二合一”选举中，新增加的约120万年轻选民“首投族”不会投票给国民党，这是胜选的重大障碍。

国民党在年轻人中的“零支持度”如何改变？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褚春来表示，国民党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重用年轻人，营造出一股新气象，不能只有一些口号，并没有太具体的行动表现。要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就要有吸引年轻人的地方，“三连败”后的国民党要解决这一难题。

论述好、团结好、人才好，是对有作为的“称职在野党”基本要求。国民党喊了很多年，现在更需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否则，在岛内在野党都做不好，还想当执政党？

美台公开联合军演影片目的分析

■ 程光

日前，一组视频展示了美军与台军一起进行军事训练的画面。这虽然并非美军首次公布与台军进行军事交流的影像，但内容直接证实美军派遣战斗部队人员到台湾并与台军联合演训，此举极为罕见。因此，该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极大关注度以及热议。

一、美台公开联合军演视频

视频来源于美军特战第一总队，视频中大量使用了美军与台军一起进行训练活动的素材，目的是为了进行部队形象的国际宣传。数十年来，美军多次远赴台湾协助台军进行军事训练，不过训练实况从来没有公开，台湾当局防务主管部门也一直将其视为机密。许多台湾学者表示，有关美台联合军演的信息此前一直都保持低调甚至视为机密，此次主动曝光美军与台军共同训练的实况，这是多年来极为罕见的。

视频时长44秒，被公布在美军特战第一总队官方网站与社交媒体上。视频内容是美军特战第一总队与台湾陆军特战部队进行战伤救护、室内攻坚以及人员撤离的操练画面。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许多美军教官分别和一名台湾陆军特战官兵搭配训练，主要训练项目是模拟进行战术搜索、攻坚，并搭载黑鹰直升机撤离，活动地点则为台军营舍。影片中，直升机尾桁上“陆军”字样清晰可见，显示了美军所处的位置便是台湾。

二、近年来美台军事交往回顾

尽管该影片是首度公开曝光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但其实双方交往由来已久，且近年来更趋紧密。

美军入台由来已久。早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就有美军特种兵赴台协助台军训练。美台双方还有相对应的“训练对口单位”。例如，台军航空特战部队训练“对口单位”是美国陆军的“绿色贝雷帽”，每年都在台湾中部谷关山区举行“互动操演”(Balance Taper)；而台湾陆军101两栖侦察营、海军陆战队两栖侦搜大队，“对口单位”是海豹部队，训练地点在澎湖，每年都要搞一次代号为“闪光操演”(Flash Taper)的“协训”。不过当时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尚处于保密状态，外界很难窥其全貌。

美台联合军演从秘密走向公开。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台联合军演从秘密走向公开，显示近年来美国对两岸态度的转变。201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部长推动加强与台湾的安全交流政策，适当参与双方军演。法案预示着美台展开协同作战演习也成为可能。法案通过数日后，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葛来仪就在推特公开称，“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在太平洋的伙伴，将参与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但现在正式公开宣布”。葛来仪的言论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意味着美台军事交流升温，甚至是再突破。

美国对台军售已呈现常态化趋势。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台军售与前任相比已发生明显变化。与奥巴马政府时期包裹式军售不同，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呈现化整为零、小步快跑、每年例行、鼓励商售、配件为主特点。即采取量少批多的形式，以实现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降低军售敏感度。

尽管今年全球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美国对台军售并未因疫情而停止。5月20日，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当天，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宣布，国

务院批准售台18枚MK—48重型鱼雷，包括辅助设备及技术支持等，总金额约1.8亿美元，被称之为是送给蔡英文连任的“贺礼”。7月9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国务院批准将向台湾出售“爱国者”3型导弹重新认证的设备与技术，金额约6.2亿美元。由此看出，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过去是攒起来做一笔较大军备交易，现在成了台湾随要随买，美国随卖随批。

美军在台海出没频率增加。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军机绕台常态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军飞机舰艇频繁在台海以及台湾东部海域活动。美军在台湾的行动不仅越来越高调，且与中国大陆较劲意味颇浓。岛内各界将美军频繁在台海出现解读为美国对中国大陆加强对台军事压力的回应，同时也是为“台独”撑腰，释放所谓“保台”信息。

美台军事合作不断加强。蔡英文上台以来，意欲在军事安全方面强化台美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包括加大对防务的投资，启动“潜艇自造”计划，寻求美国军工企业对台转移关键装备与技术；加强台美军事技术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争取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和制度化，等等。蔡英文当局还有意将里根时期对台“六项保证”与美国现行台海政策挂钩，图谋削弱《八一七公报》对美国的限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大背景下，蔡英文当局提出的一些政策动议，逐步被纳入美国国会亲台势力推动的涉台立法当中。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与台湾交往法”“台湾安全法”，以及近几个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均能找到台湾的影子。

随着美国把中国大陆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势必会通过加大对台军售、强化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提升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大陆的战略目的。未来，美台军事安全还会不断加强。

三、美台公开联合军演视频的目的

严格说来，此次公开的美台联合军演视频只是将美台之间秘密军事交往公开化，但却传递出与以往不同的信息。

美台公开联合军演视频的目的。一是传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近几年来，美国通过多项涉台法案，在法律层面对美台军事合作予以保障。美国的目的在于把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更看重其服务于美国整体战略中的作用，尤其是要利用台湾制衡中国大陆。而此次公开美台联合军演影片的目的，就是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民众传达信息：特朗普政府正在以实际且实在的行动给予台湾坚定的支持。美国的做法也让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看到了“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希望，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设置更大障碍。

二是美国意图牵制中国大陆军事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也在不断提升。因此，美国加大了“台湾牌”中的军事分量，意图牵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观察近年来美国通过的诸多“法案”，不少涉及到加强美台军事关系，包括提升军方人员往来层级，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加强双方军事训练演习等，助力台军提升战力。近期，美国国会开始炮制“台湾保卫法”，重在确保美国履行对台安全承诺，遏制中国大陆“武力攻台”。法案要求要确保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以“拒止”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既成事实”策略。而过去，美国对是否协防台湾态度暧昧、模糊，这也使得“台独”势力心里没底，既憧憬着有美国协防，可以放心大胆搞“台独”；也担心美国不协防，台湾将不堪一击，不敢轻易与中国大陆摊牌。而一旦“台湾保卫法”炮制成功，美国协防台湾态度明朗，台海局势将更加脆弱。

三是台湾当局企图借美军“震慑”中国大陆。此次事件一出，台湾立即表示，此次演习属于“正常军事交流”。其实类似的“擦边球”事件早已屡见不鲜，也非蔡英文上台后才有。但今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中美关系处于“非常时期”，而选择此时公布敏感视频，令人不得不怀疑此举的动机。这应该是蔡英文当局故意传递给祖国大陆的信息，绝不可能是简

简单单的“无心之失”，蔡英文想借美军“震慑”祖国大陆，向外界宣告自己背后有美国“撑腰”。

按照岛内媒体的说法，未来美台还将继续增加双方特种部队协训次数、频率，在专业项目与专家交流等部分，也将进行持续的提升。因此，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事介入并不会随着美国总统大选或台湾政党轮替发生根本性改变，将对两岸及美中关系产生极大危害。

一是造成两岸渐行渐远。自去年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台湾与祖国大陆渐行渐远，这与美台关系越来越密切不无关系。而美台军事合作的加深，使岛内“台独”势力有恃无恐更加猖獗。

二是加深两岸之间的战略疑虑。此次公开美台联合军演非常罕见。按照惯例，这些画面都应该被严格保密，此举直接证实了美军与台军联合进行军事训练的事实。将原本都保持低调的军事训练变得“台面化”，或许是为了响应美国国会近年提升与台湾军事交流的声浪。但美台军事交往的公开化，不仅可能使台湾被美国绑得更紧，更频繁地被美国当作对付中国大陆的“棋子”，也势必会加深两岸之间的战略疑虑，扩大双方的裂痕。若继续发展下去，两岸擦枪走火并走向兵戎相见也不是没有可能。

三是导致两岸战争风险增加。美国打“台湾牌”，涉入军事领域越来越多，充分暴露出在台湾问题上军事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图谋，尤其是未来可能重新派军队进驻台湾，加大对台军事协防，此举危害性极大，破坏力极强，不仅重创中美关系，也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大大增加爆发战争的风险。

四是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良影响。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与台湾军事合作加深对其他国家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国家借疫情不断指责中国大陆，而台湾则借此开展疫情“外交”，企图“以疫谋独”。台湾当局借疫情在欧美国家的卖力表演确实赢得了一些掌声，西方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两岸问题上紧随美国的脚步，尤其是本来就对台湾武器市场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军火企业，更是渴望加入对台军售行列，与台湾的军事合作有望取得突破。

四、应对美台军事合作升级的一些建议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未来美国政府将会在强化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帮助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如何应对美台军事合作升级事关台海和平和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不可掉以轻心。

中美合则两利。如果中美关系良好，“台湾牌”则大大失去其效用。因此，在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王毅曾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之间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竞争，这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现象，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7月9日，王毅再度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而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美合作已经办成了很多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的大事。有人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历史另起炉灶，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强行脱钩。而是应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王毅的讲话表明中国希望中美继续合作双赢。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曾表态中美要脱钩，7月10日又声称，中美关系因新冠疫情受到太大损害，降低了人们对中美达成第二阶段经贸协议的期望值。因此，如何转变美国对中美合作的态度是当务之急。

对美台军事合作升级保持定力的同时划出红线。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台的军事合作就在不断升级，此次美台联合军演视频的流出让双方军事交往的秘密放到了台面上。对此，中国大陆应保持足够定力。毕竟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解决台海问题的主动权越来越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台湾当局“联美抗陆”的策略

台湾当局海洋政策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

■ 杨晶华

6月8日，台湾“海洋委员会”在高雄展览馆举办“第一届‘国家’海洋日庆祝典礼”，由行政部门副负责人陈其迈主持，并在会上表示将在年内推出“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以“建构生态、安全、繁荣的永续海洋‘国家’”为愿景，提出“建构区域战略思维，保卫海域主权权益”“落实海域执法作为，促进区域安全合作”等六大政策目标。14年后再次推出“海洋政策白皮书”，台湾当局着力于海洋政策的调整，并试图加强海洋方面的法制化建设。

一、重要海洋政策文件回顾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实施“戒严”政策，管制军事，封锁海岸，推行“海禁”政策。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且海洋事务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增，台湾先后通过两部重要海洋基本法律，即“领海及邻接区法”和“专属经济海域与大陆礁层法”，并制定相关配套法律。1993年发布“南海政策纲领”，即第一个海洋政策文件，随后分别于2001年、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发布“海洋白皮书”“海洋政策纲领”“海洋政策白皮书”“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等一系列海洋政策文件，作为处理海洋事务的主要指导文件。

（一）“南海政策纲领”（1993年）

1992年12月3日，台湾当局成立跨“部会”“南海小组”，置于内务部门，专门负责制定并检讨当局南海政策，由内务部门负责人兼召集人，内务部门政务副负

难以改变两岸统一的走势。

不过也应该看到，美台联合军演视频的公开也给民进党和“独”派势力打了“强心针”，未来他们可能会更肆无忌惮游走在中国大陆划出的红线边缘，在“台独”路上越走越远。民进党民意代表王定宇就声称，这一事件是台美军事交流台面化、正常化的重大进展。因此，有必要让美国了解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坚定决心与信念，使美国在打“台湾牌”时有所顾忌，不至于不顾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同时也要给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划出明确的红线，避免“台独”分子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挑战一个中国底线。

提升国防实力让美台有所顾忌。诚然，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台公开联合军演视频是借此向中国大陆“秀肌肉”。从长远看，只有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能够真正与美国相抗衡，美国才不敢为所欲为，“台独”势力挟洋谋“独”的迷思才会被打破。因此，要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升国防实力，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保持对“台独”的军事震慑力。

加强对网络民意的引导。中美关系走到如此地步，网络民意的推波助澜不容忽视。尤其新冠疫情发生后，在中美两国关系上，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民调，但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应加强对网络民意的理性引导，避免中美关系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责人兼副召集人，外事、防务、经济、交通、“农委会”、“卫生署”、“环卫署”、大陆事务主管部门、“国科会”副负责人以及高雄市市长任委员。10月，台湾当局发布公告，“南沙(太平岛)地区和东沙地区的海空域限制区，将东沙岛及南沙太平岛周边海面6000米上空宣布为限制区域，周边海面6000米为限制海域”，并于1993年4月13日制定“南海政策纲领”，作为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准则。

“南海政策纲领”为框架性文件，核心在于重申南海主权及处理南海主权争端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5个目标：坚定维护南海主权，加强南海开发管理，积极促进南海合作，和平处理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并从“内政”“国际合作”“安全维护”“交通”“卫生”“环保”“两岸关系”“学术研究”“资源开发”等9个方面提出相应实施纲要。对于“南海政策纲领”提出的实施计划，仅有一小部分被落实，如筹建海域巡逻警力，台湾当局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升格改制为“警政署”水上警察局，2000年1月28日正式成立“海岸巡防署”负责海上执法，并接替台湾陆战队驻守太平岛。交通方面，台湾当局在太平岛建立卫星通讯设施，加强气象台设施与功能，扩建码头等设施。但大部分实施计划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未能落实，两岸共同维护南海权益计划更因民进党的“台独”主张而无法推进。

(二)“海洋白皮书”(2001年)

1998年7月，台湾行政部门召开“海洋政策研讨会”；8月，行政部门“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着手研订并于2001年3月发布第一版“海洋政策白皮书”，也是民进党执政后首次推出的海洋政策文件，从海洋事务发展、海洋教育、海洋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规划，展现出台湾当局积极发展海洋的战略企图。相较于“南海政策纲要”，“海洋政策白皮书”更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反映台湾当局整体海洋政策，涉及范围更广、更细，在南海事务上并未过多着墨且没有强调南海为其固有历史性海域。

(三)“海洋政策纲领”(2004年)

2004年1月7日，台湾当局成立行政部门“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包括海洋策略、海域安全、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及海洋科研等6个工作组。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推出2004年版“海洋政策纲领”，将最终目标设定为建设“健康的海洋环境、安全的海洋活动与繁荣的海洋产业”，提出9大政策与24项实施计划，相较“南海政策纲领”是更全面的海洋政策，除了宣示“主权”外，更加侧重海洋产业、环境保护与海洋文化等方面建设，但这仍然是一个框架式文件，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性意义。2005年4月25日，“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第3次委员会议通过“海洋事务政策发展规划方案”，共计列入105项工作计划，预算经费349亿元新台币，作为“海洋政策纲领”的具体实施方案，纳入其后的各部门预算工作进行实施。2008年8月，“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更名为“海洋事务推动小组”。

(四)“海洋政策白皮书”(2006年)

2004年“海洋政策纲领”颁布后，台湾当局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推出“海洋政策白皮书”，对2001年版“海洋政策白皮书”作了较大修正和改动，内容扩充的同时架构也更加完整，新增有关“新兴海洋科技产业”等方面论述，并提出建立“海洋发展指标”及未来“白皮书”的“检讨机制”，还将“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第3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海洋事务政策发展规划方案”中的工作计划列入“海洋政策白皮书”具体工作方案。“海洋政策白皮书”目标设定较为宏大，但其中部分理念和构想由于未能通过“立法”程序，也未编列相应预算，难以得到政策实质推动与执行，因此发挥的效果也相对有限。

二、台湾当局海洋政策演变及特点

台湾属于海岛型地区，其海洋政策影响整体发展，伴随海洋事务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增，海洋政策与发展也更加重要。从此前发布的一系列海洋政策文件看，台湾当局对于海洋政策的重视与日剧增。事实上，1996年彭

台湾海洋管理体系

	机关	权责
海洋策略	“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	海洋“白皮书”修订 海洋重大计划管制考核
	“经济建设委员会”	海洋经济建设计划审议
	“新闻局”	海洋政策与施政宣导
	“外交部”	涉外海洋事务、经济海域重叠协商、与相关邻国就重叠海域进行划界谘商
	“陆委会”	协调各主管机关处理两岸海洋事务
	“农委会渔业署”	全球及区域性渔业养护及惯例事务的参与
	“内政部”	海疆划界与勘测、领海基线及外界线规划与勘测、海域基础资料库建制与管理、海底电缆管线划定许可、海域基本图测制
	“财政部”	海洋“国有非共用”土地管理、海岸土地放租供观光、浴场、造林及养殖使用
海洋安全	“海岸巡防署”	海岸管制区管理及安全维护事项; 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运输工具安全事项; 海域、海岸、河口与非通商口岸查缉走私、防止非法入出境、执行通商口岸人员安全检查及其他犯罪调查事项; 执行“海洋污染防治法”、维护海洋秩序管制及维护、海上救难、海洋灾害救护、海上纠纷处理、渔业及渔业资源维护及海洋环境保护保育等事项
	“国防部”	军事防卫政策制定及相关海上作战指导、台湾四周海域水深探勘、水文汇整、海图制作、海岸管制区
	“内政部”	海难空勤救助
	“财政部”	海关缉私
海洋环境与资源	“农业委员会”	海埔地水木保持; 野生动物及生态保育、自然保护及珍贵稀有动植物等自然文化资产维护、保育及管理; 保安林、造林管理; 划定沿海保护区, 保育水产资源; 自然文化景观维护、保育、宣扬及管理机关监督等; 渔业资源维护、海洋渔业发展、渔业巡护与纠察及处理、渔事纠纷处理、远洋渔业涉外事务辅导与交涉、取缔非法捕鱼; 海岸地图绘制、航空照片
	“环境保护署”	管理海域及海岸地区水体污染防治、海岸清洁维护及废弃物清理; 制订海洋污染基本措施, 防止陆上污染源、海域工程、海上处理废弃物、及船舶对海洋污染, 规范船舶对海域污染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制订重大海洋油污染紧急应变计划, 以安全、即时、有效、协调应变作业; 海域水体特质规范其适用性质及其相关环境标准制定; 重大开发计划对海域环境冲击评估、审查及管理
	“内政部”	台湾沿海地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研订海岸发展海岸管理计划、推动海域复育计划及永续海岸行动方案、海埔地开发管理、研修都市及区域计划法相关子法、筹设海洋公园等
	“经济部”	河川水资源利用及水道防护等管理事项; 划定地下水管制区, 防止地盘下陷及海水入侵; 海堤兴建、海堤区域管理; 近海水文监测

	机关	权责
海洋产业	“交通部”	海洋观光、近岸海域游憩活动管理；风景特定区规划、开放及管理维护；商港内海域油污、有毒物质、垃圾及船舶油污等污染防治；海岸公路整建、兴筑、拓宽工程；制订海运、港埠政策、发展航运与管理、海难救护、外国船舶停靠台湾的港湾管理、危险物品入港检查与管理
	“农业委员会”	海洋渔业发展渔业巡护渔事纠纷处理远洋渔业涉外事务辅导与交涉、取缔非法捕鱼
	“经济部”	海砂开发海矿资源管理海洋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利用及管理，其他海洋非生物资源探采、利用及管理、海水淡化；公营事业利用海洋的管理；设置仓储转运专区
文化教育科研	“文化建设委员会”	推动海洋文化、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研究等相关工作
	“国科会”	推动海洋基础科学研究
	“经济部”	调查研究周边海域地质实态与资源调查
	“人事行政局”	海洋专业人才任用
	“中央研究院”	海洋生态、文化、环境、资源基础调查研究
	“教育部”	制定古物与民族艺术保存、维护、宣扬、全力移转及保管机构；培育海洋教育、海事人员、海洋专业人才
地方海洋事务	“直辖市”及县市政府	限制河口地使用，以及办理河川新生地整体规划、开发；划定土地使用为保护区、保存区等，限制建筑使用；管理地下水管制区凿井饮水行为；管理海堤区域内申请农、渔、游憩等行为许可、防汛抢险及一般性海堤巡防；核准私人申请海埔地开放许可，管理造地施工及其土地使用；受主管机关授权，执行地区内文化资产保存及管理工作

资料来源：“海洋政策白皮书2006”，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发行，2006年

明敏在参加大选时，曾提出“海洋国家的远景”作为竞选主轴。陈水扁执政后，也提出“海洋立国”战略，在南海议题上使用“生态牌”，试图以“环境外交”拓宽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并借机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突破台湾无缘参加南海争端多边对话机制的困境。尽管提出相关政策主张及文件，但核心仍然放在“台独”上，对于海洋事务的实质推进作用不显著。马英九执政时期，提出“蓝色革命、海洋兴国”口号，希望能够统筹海洋事务，设立“海洋部”，跳脱“重陆轻海”思维，走出岛链的地缘定位和“锁国思想”，同时重申台湾地区对于南海、东海固有领域与传统渔场的主权和权益，确认“没有主权就没有渔权”原则，持续与经济海域重叠国家或地区进行渔权谈判。海洋政策的具体主张包括“蓝海战略”“设置专责机构”“海洋产业”“海洋解严”“航运发展”“永续渔业”“生态保育”“研究发展”等8项。但因执政受到掣肘，马英九的海洋事务发展规划并未落实，并且运作机构仍然相对单薄。

就海洋管理体系而言，台湾目前的海洋事务管理组织分散于各个涉海部门，由各个部门分别就其本身业务权责分别管理，没有建立统一的海洋事务管理专责机构，而依各部门功能划分相应权限。海洋事务的推进，除了政策与相关事务机构设置外，海洋“立法”也是海洋政策重要方面及完善度的衡量指标。台湾当局于1998年出台两部“海域基本立法”，1999年公布“第一批领海基线、

领海及邻接区外界线公告”，宣示“领海主权”，以及“专属经济海域”内权利后，2000年1月16日通过“海巡五法”，2月1日成立行政部门“海岸巡防署”作为海域执法专责机关，11月公布“海洋污染防治法”。此后，台湾立法机构从海洋策略、海洋安全、海洋产业以及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制定相关专法，或是在其他法律条文中增加涉海洋事务相关规定。在第八届立法机构“立法”工作中，通过“国土三法”(即“湿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国土计划法”)与“海洋四法”(即“海洋委员会组织法”“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组织法”“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组织法”“国家海洋研究院组织法”等海洋委员会相关组织四法)，以此建立台湾海洋治理基本框架，明确“海洋委员会”及下属单位的职责和机构设置，为“海洋委员会”正式成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蔡英文当局的海洋政策及动向

民进党一直坚持“海洋立国”构想，并试图推动其发展。蔡英文当局执政后，多次强调“海洋国家”主张，并从战略、政策、机构、法律等方面围绕海洋事务进行重要调整。

战略上，借助实现“海洋国家”构想，行销“海洋国家台湾”理念，在海洋事务上推进“渐进式台独”，同时试图通过海洋资源保护及海洋产业发展等国际平台的参与，开拓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另外，配合蔡英文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发展战略，寻求与东南亚、东盟、印度等国家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产业以及海洋资源保育等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推动台湾贸易多元化，并强化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关系，以期实现经济上逐渐“脱中”的战略构想。此外，因应美国的海洋和海权战略推进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转移新态势，以及日本新海洋战略的发展，蔡英文当局也将未来发展规划重心放在海洋战略等方面，试图提升战略地位。

机制上，历经8年筹备的台湾“海洋委员会”2018年4月28日正式在高雄挂牌。2010年2月3日，行政部门提案修正“行政院组织法”，规定增设“海洋委员会”，但因各方分歧较大，一直未能落实。此次设立的“海洋委员会”是继2000年成立“海巡署”后，向统一海洋管理体制迈出的一大步，为“中央二级机关”，下设“海巡署”“海洋保育署”及“国家海洋研究院”，改组后，“海巡署”也从二级机关降为三级机关。台湾当局对“海洋委员会”成立格外重视，蔡英文、赖清德、陈菊等民进党高层罕见共同出席成立仪式。蔡英文在讲话中对“海洋委员会”提出“健全海洋法制、发展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研究”三项工作任务，展现蔡英文当局试图整合海洋事务的政治目的。台湾此次涉海管理机构改革，对于未来两岸海洋产业合作、维护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处理两岸渔业冲突等可能产生影响，建议对相关情况密切关注并进行跟踪研究。

法律上，台湾立法机构于2019年11月1日三读通过“海洋基本法”，确定6月8日为“国家海洋日”，当局须在法案施行1年内，提出“国家海洋政策白皮书”，并对海洋事务提出政策方向，订定海洋污染防治对策，健全海洋产业发展。同时要求宽列海洋事务预算，设立海洋发展基金，将海洋重要知识内涵纳入“国民基本教育”与公务人员培训课程，各级政府也应在“海洋基本法”施行后2年内检讨法规。“海洋基本法”是调和所有海洋相关法令的上位母法，用以明定海洋法规大方向，其他具体相关子法，如“海洋保育法”“海洋管理法”及“海洋产业发展条例”等，目前也在草拟中。

由此可见，蔡英文当局在推进海洋事务发展上展现了较大决心，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负责整合多个相关机构及业务与产、学、研资源，还制定专涉海洋事务的基本法，加强海洋事务法制化发展。但从此前实践看，在海洋事务发展上，台湾当局普遍存在目标宏大落实迟缓问题。未来海洋政策将成为台湾当局着力的重要支点之一，但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尚难以评估。

民进党当局“媚日”政策评析

——以钓鱼岛“更名”为例

■ 王强

近期，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以多数票赞成”通过所谓钓鱼岛“行政区划更名”议案，声称将于10月1日起正式生效。此次日本挑起钓鱼岛“更名”事件，严重挑衅中国领土主权，引发两岸强烈不满和共同抗议。岛内社会群情激愤，保钓团体强烈抗议，宜兰县抢先更名反制。然而，民进党当局不仅毫无作为，却忙着“颠倒是非”“甩锅大陆”，其所作所为又一次充分暴露了毫无底线的“媚日”嘴脸。

日本右翼重提“更名”议案，挑拨中日关系

当前，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日本右翼势力又开始动起挑拨中日关系、破坏地区稳定的“歪脑筋”。自从2012年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后，日本右翼分子持续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动作”。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惯用的伎俩就是通过篡改名称混淆视听，强化“实际控制”假象。此次日本右翼分子上演钓鱼岛“更名”闹剧，实属蓄谋已久，尤其是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等人长期充当“急先锋”角色。2010年中山义隆就任石垣市市长，至今连任3届，是日本地方“罕见的右翼政治家”。在任期间，中山义隆不仅参与了“购买”钓鱼岛的闹剧，而且提出将钓鱼岛列入日本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甚至还邀请过李登辉访问石垣市演讲。2017年，中山义隆就明确表示过提出钓鱼岛“更名”议案，但是连续三年搁浅。今年再度旧案重提，石垣市议会“以13票赞成，8票反对”通过议案，折射出日本右翼势力从未放弃这一“有计划性的操作”。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国内实际上存在愈来愈多不同的声音。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钓鱼岛的历史和主权》中说出了“尊重历史的正直声音”，他坦言“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体现出日本史学家的良知。岛内舆论称，钓鱼岛周边海域是台湾渔民传统作业海域，日本挑起“更名”事件“实属居心叵测”；日本右翼分子以“避免混淆提高行政效率”为由制造“钓鱼岛属日”假象，有挑拨中日关系之嫌；石垣市议会“假反制中国大陆之名，行扩权之实”，反映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稳定向好大局的图谋。

民进党当局颠倒是非，尽显“媚日”丑态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动作”，引发两岸强烈不满。就在中国大陆海警出动宣誓主权，岛内民众集体抗议表达心声之际，民进党当局却在忙着颠倒是非黑白。蔡英文打着“不谈政治”的幌子在岛内官员陪同下忙着拜庙“扫货”。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则将责任“甩锅”中国大陆，竟称是由于大陆公务船活动骚扰了附近渔民才导致风波发生。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象征性表示要“尽责尽力”。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称，“台日这么友好，应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竟称，“希望地方事务不要影响台日友好”。台湾外事部门发言人顾及所谓“台日友好”，诚恳呼吁石垣市议会“勿让地方性事务影响台日全面友好伙伴关系”。

蔡英文当局明显避重就轻的“媚日”言行不但引起岛内舆论挞伐，更遭到民意强烈反弹。国民党谴责蔡英文“一见到日本人就矮一截”，由“辣台妹”变成“软骨妹”；怒斥谢长廷是“助

日代表”，不去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却撰文声称“日本有事实管领权”；批评民进党当局“懦弱无能”“卑躬屈膝”，“表现软弱毫无作为，才让日本不断得寸进尺”。岛内媒体评论称，“遇日则软”的民进党不愿得罪日本，企图通过“出卖钓鱼岛”获取日本好感，一遇到日本“大哥哥”膝盖就不自觉软下来；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对日退让”“自我阉割”“只是说些场面话，根本无意反制”“丢盔弃甲到令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日本人内心也看不起这群人”。香港中评社称，蔡英文当局将责任“甩锅”中国大陆，“如此颠倒是非为日本帮腔，俨然一副奴才相”。岛内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言论“逻辑不通”，有网友讽刺称“改名的是谁不清楚吗”“自己不敢出声，赖给大陆就对了”。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当局太软弱。有将近7成民众认为“应该以强硬态度响应日本”；约5成民众同意“在更名议题上，民进党只是嘴巴说说，不会有具体行动”。蔡英文声望急剧下滑，大跌10.5个百分点。民进党支持度也“从云端掉落地面”，支持者大减13.6个百分点仅获得28.2%支持，“流失之快，史上首见”。岛内舆论认为，蔡英文高票连任后，政策作为荒腔走板，与民意期待有极大落差，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

“逢日必软”，民进党当局包藏“台独”祸心

实际上，民进党无底线的“媚日”行径早就有迹可循。从取消护渔、要求台湾渔船“主动避让”日本公务船，到无视渔民生计放弃“冲之鸟礁”立场；从废止“课纲微调”，宣扬“台独”思想和“皇民史观”，到公然宣称台日关系如同“夫妻关系”；再到如今“更名”风波中“毫无作为”唯恐伤及“台日友好”。民进党当局之所以“逢日必软”有着“不能明说的顾虑”，包藏着“台独”祸心。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达50年之久，尤其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媚日”“台独”分子。这些日本殖民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抱有一种“以当日本人为荣”的扭曲心理。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军军国主义分子不甘心归还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密谋台籍汉奸策划“台湾独立”运动。最早的“台独”组织就在日本右翼势力庇护下形成，并将日本作为“台独”运动的海外基地。日本右翼分子纵容支持“台独”势力，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成为“台独”势力重要国际支持力量。民进党上台后，不遗余力美化“日据”历史，刻意宣扬“台独”史观，加重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幻想“挟洋自重”实现“台独”党纲。

近年来，在两岸实力对比日益拉大的背景下，“台独”分子“不安倍增”。蔡英文为骗取选票强打“主权牌”，大肆叛卖“芒果干”，肆意挑动两岸民意对立。蔡英文上台后，实行“渐进式台独”策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使两岸关系面临日趋复杂严峻的局面。民进党当局企图“倚日抗陆”的战略勾连需求更为迫切。蔡英文当局将台日关系列为外事重点，多次公开声称台日是“命运共同体”，强调“台湾在参加国际组织上需要日本的援助”，不断在一中原则上打“擦边球”，谋求台日实质关系“软突破”。在这种政治算计下，民进党当局“只会用嘴巴爱台湾”，“一谈到钓鱼岛，就立马成了缩头乌龟”。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背叛民族大义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都负有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责任，应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然而，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族利益和尊严，为一党之私数典忘祖、卖台求荣、“反中抗中”，肆意践踏岛内民意、挑起两岸敌意、背弃民族大义，百般阻挠台湾爱国同胞发起的“保钓”行动，一厢情愿期待日本“友台”右翼分子为台湾风险买单。民进党当局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最终不得不吞下“挟洋自重”的恶果。

蔡英文当局将加速挑动两岸关系

■ 韩冰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第二任期拉开帷幕。受民进党“台独”政治立场、两岸实力对比态势、“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嬗变等多重因素影响，蔡英文相关论述与做法继续偏离“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回避两岸关系性质本质问题，透露出的是其政治军事维度“亲美抗中”、经济产业层面“远中脱中”、社会意识领域“恨陆仇中”的精心算计。民进党当局顽守“台独”路线与“反中”立场的做法，不但使已陷入僵局的两岸关系难以迎来转机，还为台海地区更添一重阴霾。未来几年，两岸关系势将进入一个充满冲突与动荡的新周期。

一、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充当“遏中”战略棋子

过去几年，蔡英文当局“抗中”路线与美国政治精英群体“以台制中”“以台遏中”政策逻辑高度契合。以此为前提，民进党当局数次调整施政方向，迫不及待地充当美国“抗中马前卒”。在业已展开的第二任期内，蔡英文大概率会将“挟洋自重”与“依美抗中”策略发挥到极致，持续向祖国大陆发起“台独”攻势。

一是高度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围堵中国大陆。在中美战略博弈大局中，台湾原本就是两国地缘政治角力的重要战场。在围堵、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初步成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驱联动”的排他性联盟呼之欲出之际，美国又明火执仗地将台湾打造成多层次、网络状的“印太安全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受惠”于美国政治承诺、安全保护的民进党当局，则对在“印太战略”前沿充当美国“制中”“遏中”棋子甘之如饴。因此，蔡英文在其第二任期内，只会以彻底倒向美国的政治取向，更加积极主动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与美并肩、抵制大陆”，进一步将两岸关系拉入中美战略竞争格局。幻想以美国为“台独”靠山，拉抬民进党在岛内的政治行情。

二是“挟洋自重”冲撞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2016年以来，台湾“国际活动空间”日益萎缩，除无缘世界卫生大会 (WHA)、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ICAO) 等国际舞台外，还经历了数波“断交潮”。为增强国际社会能见度，蔡英文在此次就职讲话中称，将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和美国、日本、欧盟等“共享价值的国家，深化伙伴关系”，更积极参与区域的合作机制。由此不难推测，民进党当局为合理化美国等域外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的行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会更加卖力地向国际社会兜售“中国透过各种压力手段意图介入台湾民主机制运作”“中国正在破坏两岸和平现状”等陈词滥调，用来博取国际舆论同情，并通过搭乘美国、日本、欧盟等国“便车”的方式，提升台湾同全球或区域多边机制的联系，放大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声量，借机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体育赛事等国际场合肆意踩踏一中原则红线。

三是加大对美军购强化“不对称战力”。蔡英文上台以来，美国密集铺陈对台军售案，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嵌入第一岛链军事版图。蔡英文当局也一门心思要与美国加强防务产业合作，其意图不仅是获得军事武器制造技术，更是想借此植入美国全球防务产业链，进而炫示自身与美国的密切关系，满足民进党支持群体“以武拒统”的狭隘政治想象。在这次就职讲话中，蔡英文也不加掩饰地宣称，在其第二任期内将加速发展“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有效应对“网络战”“认知战”“超限战”

的威胁。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民进党当局的盘算就是要在潜艇、无人机等领域“贴紧美国”，以扩大对美军购的方式提升台军“不对称战力”。话音未落，5月21日，美国国务院就批准售台18枚 MK-48 重型鱼雷及相关设备与技术。这也是美国第二度售台 MK-48重型鱼雷。2017年6月，美国就曾首次向台湾出售46枚 MK-48重型鱼雷，供台湾海军“剑龙级”潜舰使用。今年8月，美国与台湾又首次就购买4架 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进行磋商。未来几年，不排除美国进一步在武器装备、技术保障等方面与台湾当局暗通款曲，不断提升对台湾的军售数量与水平，把台湾打造成第一岛链“火药库”。

二、主动转移产业链，加速“经济脱中”图谋

在美国以疫情为借口，伺机争夺中美战略博弈主动权，对中国大陆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并进行极限施压的背景下，蔡英文当局“唯美是从”，意欲通过绕过中国大陆市场、向美国转移优质科技产业等做法，向美国递交“抗中投名状”，以达到深化美台关系的政治目的。

一是绕过中国大陆开拓国际新市场。早在第一任期内，蔡英文就竭力降低两岸经贸联系，企图通过“新南向政策”，驱使台商将资本、技术和产业从中国大陆转向东南亚地区，逐步实现两岸经济“脱钩”。在第二任期就职讲话中，蔡英文声称已注意到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强调要摆脱依赖，宣称要持续开拓有潜力的市场。“后疫情时代”，国际产业链重组、区域贸易关系重构初现端倪，蔡英文当局势必趁机以“摆脱台湾对中国的依赖”为借口，加大对两岸经贸活动的限制，逐步解构两岸产业联结，达到用“经济脱中”推进“台独”系统工程的目的。近期，蔡英文不顾岛内民众反对，径自宣布自2021年1月1日起，开放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 美猪及30月龄以上美牛进入岛内市场，目的就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取得与美国经济对话的“敲门砖”，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拼凑一幅“投美脱中”拼图。

二是加速美台科技产业合作。中美贸易摩擦龃龉不断，美国屡屡向华为、中兴等中国大陆科技企业下手。美国迟滞中国大陆信息技术进步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意图不言而喻。台湾当局延续“依美抗中”调性，竭力要与美国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做法同频共振。蔡英文在就职讲话中重点提及的“信息及数字相关产业发展”“结合5G 时代与数字转型”“接轨全球的生物及医疗科技产业”“国防及战略产业”“绿电及再生能源产业”等“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也成为未来台湾产业链转移、进一步深化与美国技术合作的重要领域。日前，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及“美国在台协会”(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共同发表了“台美5G 共同宣言”，宣示将携手制定5G 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作建立在非平等的美台关系基础之上。依据以往的经验，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场域向来唯美国马首是瞻，经贸合作方面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任由美国宰割。从台积电近期被迫赴美投资120亿美元设厂生产世界最先进的5纳米芯片一事，即可清晰看到美国与台湾打交道时的“主子心态”——不仅要台湾开放市场，还要后者主动拿出全球领先的制造、设计能量为美国所用。

三、煽动岛内“反中”民粹，持续恶化两岸关系

民进党经历2018年“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迅速拾起“反中”大旗，以激烈的“亲美反中”意识形态点燃岛内民粹野火。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和民进党更是将“芒果干”(亡国感) 当作唯一选举利器，捞足选票和政治红利。出于“台独”政治本能以及靠“反中牌”煽动岛内民粹、凝聚选举力量的现实考虑，民进党当局不愿看到两岸关系改善，反而希望升高两岸对立情势，以台海紧张状态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焦点，掩饰民进党当局执政羸形垢面的现状。

一是任用“深绿人士”延续“两岸敌对”政策。经历2020年大选一役，蔡英文“绿营共主”地位得到巩固，在人事任命方面获得更大权力，可依据个人政治喜好“封官加爵”。善于操弄“台独”话术的

2020年8—9月
海峡两岸大事记

8月

2日，乡村振兴闽台合作成果展在福建福州市三坊七巷举办，推介展示台湾团队参与祖国大陆的特色乡建乡创项目和文创产品

3日，2020台湾大学生江苏实习就业特训营在江苏南京台湾青年创业学院开营

4日，第十届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夏令营在福建厦门开营

6日，“相约苏州”2020苏台大学生暑期传媒研习营开营，苏台两地近40名大学生齐聚江苏苏州开展实习交流

7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7月对大

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长于制造两岸对立情绪的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潘文忠均获留任。此外，“绿营”律师出身、“台独”意识形态鲜明的顾立雄转换跑道接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职，开始涉足防务、外事与两岸关系事务。这些人事任命充分表明，未来四年，蔡英文没有意愿打破两岸僵局，更不会轻易放弃“两岸敌对”政治路线，巩固民进党“绿色执政”才是其首要政治考虑。

二是持续煽动岛内“反中”民粹。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利用“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被“台独”势力长期“污名化”甚至“妖魔化”，以及多数岛内民众对其理解不深刻、不全面的现状，肆意扭曲这些概念，并炮制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论调，在岛内营造出“恐中”“反中”社会氛围。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岛内“反中”民粹从特定族群的政治选择，上升为整体社会的“政治正确”。特别是以岛内年轻人为主体的“反中民粹同温层”，更是成为民进党当局“新票仓”。食髓知味的民进党当局不会轻易放弃“反中牌”，反而会变本加厉地制造争议性议题，坐等两岸民意对撞。这是民进党操弄“民粹”政治的必然结果，也只会让两岸关系陷入螺旋式下沉的恶性循环。

三是着力钳制两岸交流。蔡英文当局为屏蔽祖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使出浑身解数拉大两岸同胞心理距离，不断为两岸交流设置“红线”。妄言祖国大陆以“利中”为核心，用“经济统战”利诱台湾技术、资本及人才“西进”，破坏台湾内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借机力推“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意欲进一步限缩两岸民间既有交流渠道。从绿营民意代表肆意攻击祖国大陆影音平台爱奇艺“非法入台”、大肆炒作“共谍案”等事件看，在蔡英文第二任期内，民进党当局会继续以“行政”“司法”手段制造“寒蝉效应”，把“项庄之剑”砍向两岸交流，进而达到收窄两岸民众正常往来道路、深度恶化两岸关系的目的。

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以来，逐步打破两岸关于“九二共识”的默契，导致两岸关系由和平稳定转向动荡不安。目前来看，蔡英文未来依然会顽固坚持“台独”意识形态，无力且无意改善两岸关系。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误判了基本形势和历史大势——“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总而言之，民进党当局沉醉于“挟洋自重”的政治迷思，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执意走分裂祖国的邪路，两岸关系只会朝着激化对抗的方向演进，甚至不排除“地动山摇”的可能，到头来“损害的是台海地区的和平，损害的是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陆（含香港）出口额 125.8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2.7%，占台湾总出口额 44.6%，大陆（含香港）持续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14 日，台湾当局统计部门表示，2020 年经济增长率估计为 1.56%，比今年 5 月预测的数值下调 0.11 个百分点

据统计，2020 年上半年台湾经济增长率 0.78%，第三和第四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 2.01% 和 2.56%。

15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之际，“反殖民与台湾光复” 台湾民众史图文馆在苗栗县开馆

15 日，2020 年海峡青年云上峰会在福建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6 日，首届闽台人才协作论坛在福建福州举行

论坛是第八届海峡青年节的人才特色主题交流活动，100 多位台胞代表、青年人才代表以两岸连线的形式，围绕海峡两岸生活文化、赴闽就业创业等主题分享他们的“登陆” 故事。

18 日，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发布新闻，将在台湾地区代理或经销大陆地区的互联网视听服务（OTT-TV）纳入商业禁止项目表

预告期间为 14 日，9 月 1 日预告期满后，规划于 9 月 3 日正式公告。

19 日，苏州市台办、市工商联主办的“民企台企相携手 融合发展再出发” 活动在江苏苏州举行

20 日，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汇海上 · 2020——两岸电竞文化节” 正式启动

21 日，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毛铸伦先生、前副主席王晓波先生追思会在台北举行

22 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表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废弃两岸政治互信与共同政治基础，对外关系向美倾斜，“联美抗陆” 使得台湾卷入“大国斗争”，这些正是让台湾濒临险境的祸因。回到“九二共识” 的正途，才是解决台湾当前危机的根本之道

24 日，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称，“淘宝台湾” 虽由英商克雷达分公司经营，但经调查，该部门认定克雷达可被陆资阿里巴巴实质控制，判定“淘宝台湾” 为陆资，依相关规定处 41 万元新台币罚款，限期 6 个月内撤资或进行所谓改正

25 日，2020 年温州、台湾两岸青少年数学交流活动在线上举行

28 日，第三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

28 日，2020 台北观光博览会开幕

两岸旅游业者努力通过精彩的旅行方案和详细的文宣资料，给台湾游客“种草” 祖国大陆的人文自然风光，为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大力开拓市场做准备。

28 日，“2020 广州 · 台湾商品博览会”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办

30 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宣布，经过互联网票选，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 和“圆圆” 的第二只幼崽正式命名为“圆宝”

31 日，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在广东广州市白云区汇龙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揭牌成立

9 月

1 日，第 26 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山东潍坊开幕

旨在推进鲁台产业合作，服务稳订单、稳贸易、稳投资。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本届鲁台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为主的模式举办，海峡两岸工商界等 2000 多人参加活动。

2 日，广东广州市出台《广州市支持台资企业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惠台暖企” 若干措施》

从 10 个方面支持台资企业应对疫情影响，克服经营困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措施规定，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 给予稳岗补贴。

7 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8 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 144.6 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新高，较上年同月增长 26.9 亿美元，增幅 22.9%；累计 1 至 8 月，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 938.8 亿美元，较上年

同期增 100.7 亿美元，增幅 12.0%，出口规模创历年同期新高

8 日，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经验交流会在江苏南京举办

9 日，台湾当局金融监管部门最新发布的统计显示，上半年，台湾上市、上柜公司赴大陆投资收益达 1543 亿元新台币，创历年同期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 417 亿元

11 日，出入境管理局消息，9 月 20 日，最后一批本式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将到期失效，所有持本式台胞证的台湾居民须换领电子卡式台胞证或申办一次有效台胞证来往大陆

19 日，一年一度的“上海孔子文化节”在上海嘉定孔庙启幕

孔子文化节以“儒行双城”为主题，上海和台北两座孔庙首度“牵手”，共同缅怀先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19 日，2020 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开幕

两岸 200 位名家的书法篆刻展、100 位青少年的汉字艺术创作展、26 个书法篆刻团体参与的“汉字艺术嘉年华”等活动，让民众近距离体验汉字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20 日，江苏昆山市金融支持深化两岸产业合作改革创新试验区启动建设

这是继 2013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后，昆山再次接过两岸经贸改革重担。

20 日，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视频致辞。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各项交流。

21 日，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投资审议委员会公布，前 8 个月核准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金额同比增加 49.5%，核准陆资赴台投资金额同比增加 54.2%

21 日，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8 月台湾企业外销到大陆（含香港）订单 128.8 亿美元，比上月增长 7.5%，比去年同期增长 21%

22—25 日，2020 年港澳台代表人士炎帝故里中华文化研修班在湖北举行

24 日，国台办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开放合作 · 融合发展”的第十七届赣台（吉安）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吉安开幕

26 日，第十二届海峡论坛 ·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在福建福州召开

26 日，第三届中华设计奖“生活美学”设计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宁波举行

26 日，第三届海峡两岸暨港澳无人机航拍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在广东深圳举行

台湾汉翔航拍团队的《大湾区》、湖北武汉悦影霏视团队的《汉》和山西臣禾航拍团队的《边墙》，分别获得大赛金、银、铜奖。

27 日，以“京台社区同心 两岸抗疫同行”为主题的 2020 京台社区发展研讨会在北京西城区和台湾高雄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两岸社区治理、规划设计领域专家学者、基层工作者，通过主题演讲、“社区议事厅”等形式，共同分享两岸基层防疫与社区治理的经验和故事。

28 日，40 多幅以高质量数字技术复制的唐代壁画作品在台湾师范大学展出

28 日，2020 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在“中国第一水乡”江苏昆山市周庄镇点亮

28 日，以“深化两岸乡镇交流，促进闽台乡村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二届海峡论坛 · 两岸特色乡镇交流对接暨乡村发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28 日，“云月寄相思，潇湘中秋情”2020 湘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启动仪式暨庚子年两岸大学生潇湘中秋夜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举行

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南华大学等 7 所高校的 150 余名台湾籍学生与约 300 名祖国大陆师生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29 日，“我家的两岸故事——迁台历史记忆桃园巡展”在桃园马祖新村眷村文创园区开幕（吴亚明）

香港国家安全法对香港社会的积极作用

■[尼日利亚]胡介国

6月30日下午，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闭幕会，经表决，全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

西非暨尼日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处热烈庆祝并坚决支持香港国家安全法通过。正逢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是喜上加喜。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实施对热爱香港、希望香港繁荣稳定的全体中华儿女，包括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振奋人心的。填补了制裁“港独”分子的法律漏洞，“港独”分子不会再抓了放，放了抓。对于明显侵犯国家安全的行为，之前的犯罪分子只会受到社区劳动和处以罚金的惩罚，“港独”分子有恃无恐、行为越来越暴力，更加破坏了香港的稳定。“港独”勾结境外势力意图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胆大妄为，无法无天。因此，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实施是必要的、及时的，显示了中国中央政府出重拳打击汉奸走狗的坚定决心。

香港国家安全法对更好地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一国两制”是中国的智慧，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新鲜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一国两制”不是轻易即可做到万无一失的，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历史的问题和国际关系的问题。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实施是“一国”这个前提的法律性保障，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更好地实施“一国两制”。

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实施将对香港教育界产生影响，使香港的教师队伍和教学内容必须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香港教育界以前并没有把爱国主义作为主要内容，香港国家安全法让教育界知道，只爱香港不爱国，只宣扬爱香港，不宣扬爱国是不正确的。反修例风波的主要成员是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教育的反应，所以香港国家安全法会对香港教育界进行方向性导引，让教育回到爱国爱港的主旋律。

香港国家安全法将对香港各级公务员队伍、媒体、舆论大咖等产生规范性影响。公务员、媒体、舆论大咖是引领社会思潮社会风气的重要部分，之前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些假民主自由之名施反中叛国之实，是急需整肃打击的对象。自由民主一直是美国对别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绝对的自由民主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也不会存在，自由民主只能是相对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会把让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工具加以限制，让港人在爱国护国的前提下享受充分的自由民主。

香港国家安全法将鼓舞香港警察部门的士气，加强执法部门打击“港独”分子、乱港分子的力量。警察处在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前沿，有了香港国家安全法，让香港警察执法有法可依，必然增加香港警察的士气，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会更加有力，香港社会的正气将得到弘扬。

香港国家安全法将进一步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进而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信心。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一直是国家和个人追求的状态。香港国家安全法让乱港分子不敢胡乱作为，香港自然而

美台政客打“疫情牌”必自食恶果

■ [菲律宾]董拔萃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截至10月8日，全球确诊病例逾3657万，死亡逾105万。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病毒的肆虐，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阻碍全球经济发展。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面对与病毒的殊死抗争，人性的善恶体现得淋漓尽致。诸如霸权国家“借疫反华”的政客，台湾岛内“以疫谋独”的“台独”分子，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将政党利益和个人私利凌驾于大众的生命和健康之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全球性危机，美国和西方一些政客不仅打“疫情牌”，污名化中国抗疫，把自己抗疫失败“甩锅”中国，而且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全面打压。美国举一国之力，又四处拉帮结派，对中国公司采取赶尽杀绝的霸凌手段，其卑鄙可见一斑。打着“人权”“民主”的旗号，干着反人权反人类的勾当。满口谎言，指鹿为马，手段之卑鄙狠毒，让人瞠目结舌，很难想象衣冠楚楚的政客竟然如此下作。9个月来，特朗普、蓬佩奥们不是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垂危的生命，而是为其政治利益而狂喷口水，并大打出手。截至10月8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782万例，死亡逾21万人。如此惨不忍睹的疫情灾难，如此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而特朗普、蓬佩奥们却无视国内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特别是对于老龄病弱患者，没有特殊照顾，尽力救治，几乎任其自生自灭；为了掩盖其无能所造成的抗疫失败，捏造事实，夸大抗疫成绩，制造假象，粉饰太平，每天新增数万确诊病例，却强令催迫学校复课。782万确诊患者，逾21万病亡者家庭，随时受病毒感染的恶劣环境，以及失业贫困、动乱的社会，枪击案频发，生命受到威胁的人们，正处于新冠病毒和政治病毒双重摧残地狱般的苦难之中，难道这就是美国标榜的民主、人权?！难道这就是特朗普、蓬佩奥们口中的普世价值?！天日昭昭，是非善恶瞒不过世人，特朗普、蓬佩奥今日种下的罪因，必然是明日要自己吞下的恶果。

在台湾海峡两岸，面对来势

然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经济发展自然生机勃勃，金融、贸易、旅游业会得到恢复和深度发展。香港作为东方明珠仍然会熠熠发光。

香港国家安全法对未来统一台湾之后的治理起到示范作用，明确告诉“台独”分子，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之后有办法有能力稳定台湾社会，统一台湾之后不会造成持久混乱，不会变成烂摊子。2019年香港社会的动乱持续时间不短，程度不轻，但最终还是会稳定下来。香港国家安全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长治久安会是一面镜子，让台湾政客和人民看到将来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绝不会乱，而是会像香港一样恢复正常。“港独”分子的结局就是“台独”分子的结局，为了不过于悲惨，相信“台独”分子的言行会适当收敛。香港国家安全法有利于针对台湾的反“独”促统工作，有利于统一台湾之后的治理工作。

香港国家安全法是维护香港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定海神针，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西非暨尼日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

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是根脉相连的两岸同胞，更应同心同德携手战“疫”。但令人痛心的是，民进党当局把一党之私的政治利益凌驾于两岸同胞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之上，“以疫谋独”，主动配合美国政客，歪曲事实，污名化祖国大陆抗疫，攻击辱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干扰世界卫生组织领导抗疫和正常工作。民进党当局在第一时间就严令口罩等医护用品输出祖国大陆，后又大搞“口罩外交”，恶意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图谋制造“一中一台”。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访台，打着“合作抗疫”的幌子，却是为了让台湾准许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民进党当局以台湾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竟称，开放“美猪美牛”可换取“国际地位”。8个多月来，民进党当局在疫情期间劣迹斑斑，令人不齿。

夜郎自大的民进党当局，为把自己塑造成“防疫模范生”，也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诸如，日前彰化县卫生局采检出无症状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本来是件应引起警惕、采取措施、扩大检测、及时堵塞防疫漏洞、防止病毒扩散的事，彰化县卫生部门相关人员理应受到肯定，但民进党当局为了“防疫神话”不破灭，“皇帝的新衣”不被撕开，却挥起大棒痛下狠手，对彰化县卫生局进行政风“调查”。如此一来，彰化县卫生部门为了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所采取的积极作为却被民进党当局定义为“违法乱纪”。相比两岸的抗疫措施，如果对照祖国大陆的“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尽量不检，尽量少检”减少确诊病例，维持“防疫模范生”“皇帝新衣”的光鲜华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一样抗疫两样情。对于如此的“防疫模范生”，确实也只能一声叹息。是行大公或为私利，是为民众的生命安全或为自己的虚荣和政治利益，事实面前不言而喻。

台湾是“防疫模范生”吗？近期，不断有从台湾出境后随即被确诊的病例发生，有在台湾读书返回日本的大学生，有在台湾工作返回泰国的劳工，等等。台湾不采取普筛，以减少筛检，不发现或少发现确诊病例的措施是极不道德的，是对台湾民众和外来人士的极度不负责任，将会使更多的人在疏于防范的情况下处于受病毒感染的危险之中。

海外华侨华人关注两岸关系发展前景，也关注两岸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点点滴滴。我们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抗疫方面有良好的合作；希望民进党当局务实防控疫情，因为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两岸是全球卫生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病毒无国界，谁都难以独善其身。切实做好防控疫情工作，保护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才最重要。所谓的“防疫模范生”，不应太在意，更不能本末倒置，顾此失彼，如为了面子而务虚，最终不但会失了面子，也会失掉里子。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防控疫情方面，隔着台湾海峡相望的福建省总人口为3900多万，截至10月8日，确诊387例，死亡1例，台湾总人口2600万，确诊524例，死亡7例。在事实与数字面前，谁更应是“防疫模范生”？当然，祖国大陆还有不少省份比福建的成绩还好，有的还是零死亡。只是因为闽台相近并有更为密切的“五缘关系”，才拿出来作个比较。

笔者认为，切实做好防控疫情工作，保障民众的生命和健康，为彻底消灭新冠肺炎疫情有所担当最为重要，也才值得肯定和称赞，如果出于虚荣而造成漏洞，最终隐患爆发，这样的“防疫模范生”将得不偿失，也会让人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如果没有自知之明，自诩为“防疫模范生”，继续对祖国大陆抗疫搞污名化，并诋毁中国大陆人民对全球抗疫的贡献，那是自欺欺人，也将自取其辱。如果妄图“以疫谋独”，分裂中国，与中华民族为敌，必定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作者为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两蒋”时期台湾当局南海政策的历史演进

■ 陈本铿

南海争议起源于中国周边国家对南海岛礁主权主张，而各国主权声索的依据大多起源于历史延续性与地理相近性。作为南沙群岛最大岛屿太平岛的实际控制者，台湾当局南海政策主张也是影响南海问题解决重要因素之一。对台湾当局南海政策进行梳理，具有政策论述的连贯性和传承性，不仅是对历史本来面貌进行追根溯源，也给当前南海局势决策提供应对参考。

一、“主权”建碑巡护阶段(1949—1956年)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手南海主权后，于1946年12月派“天平号”“永兴号”“中建号”“中业号”等4艘军舰接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并停靠在太平岛重新测量海图，建立国碑两座并注明归广东省管辖，是中国的国防要塞，任何国家都不能觊觎。同时并分别派驻海军，建立气象台、电台，设置西沙群岛管理处、南沙群岛管理处，以充实整建工作。1947年4月，中华民国内政部召集外交部、国防部、海军司令部、参谋部、教育部等部门就南沙群岛范围进行商讨，得出“南沙领土范围最南在曾母暗沙，此项范围抗战前中国政府机关学校及书局出版物，均以此为准”。“为纪念收复西南沙群岛，将此次派去军舰作为命名各岛礁，西沙群岛中武德岛更名为永兴岛，南沙群岛长岛，改名为太平岛，将原来南海群岛改为中沙群岛，将原来团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1947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内政部正式核定南海诸岛礁名称，并首次公布南海海域“十一段线”，将南海4个群岛划归广东省进行管辖，同时设置南沙群岛管理处、东沙群岛管理处、西沙群岛管理处，由海军总司令部对其进行统辖。南海“十一段线”的确定，对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海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海南特别行政区”包括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南海中大小礁、滩、沙洲、暗礁，均改隶海南特别行政区，仍由海军代管。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国民党为了集中兵力，于1950年5月相继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驻军撤回台湾本岛，南沙群岛曾一度不设防，在当时南海各种力量博弈中形成权力真空。

1956年5月，菲律宾航海学院院长克洛玛率海员学生40人登上南沙群岛9个岛，企图以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姿态自居，向菲律宾政府申请他们发现占有权，并将这9个岛组成新的国家，命名为“自由邦”，首都设在巴加沙，公然侵占中国南沙领土。台湾外事部门随即向菲律宾政府表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立场。但克洛玛意图占领南沙群岛案发生后，菲律宾政府对于克洛玛“先占”所有权自始至终给予充分支持，菲律宾派驻台湾代表雷慕士辩称，“克洛玛是菲律宾私立航海学校校长，其前行不外乎突出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学生学习航海技术，二是冒险家炫耀行为”。台湾外事部门表示，面对菲律宾政府纵容克洛玛个人行为，如今“唯有派遣海军巡视太平岛实况，不仅表明政府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决心，也对菲律宾表示‘中华民国’对本案坚定不移，使其知难而退”。“对南沙此次事件必须采取坚决强硬摊牌步骤促请菲律宾政府早日表示态度，并以有效行动，制止克洛玛侵犯行为，以维护领土

主权之完整。”“为防止此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将对开发南沙群岛提上议事日程，例如移民或加强政府治理，建立气象台等措施，均是维护中国南海主权。”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提出巴拉湾西面距离南中国海12个岛屿主权事宜，台湾提出“南海群岛无论是历史、地理、法理和事实上，都是‘中华民国’固有之领土，任何国家不得以先占理由对‘中华民国’领土非法侵占，否则‘中华民国’政府将采取有效的防卫行动”。

1956年6月1日，台湾当局派遣太和、太仓两护航驱逐舰组成的南巡舰队，取名为“立威部队”，由姚汝钰担任指挥官，彭运生任中校参谋长，巡视南沙群岛。部队登上太平岛，立碑升旗，见房屋墙壁写满日、英等国文字，杂乱不堪，登岛官兵将上述留字刷清，并在一处屋顶上绘就青天白日旗一面，彰显主权。“立威舰队”巡防南沙，登陆3个岛，巡察5个岛，途经2个暗沙、12个礁和1个沙洲，基本达成维护和立威领土主权目的，对南海周边相关国家产生某种威慑。但当台湾“立威舰队”巡弋驶离南沙群岛后，克洛马再次侵占并竖起“自由邦”旗帜。菲律宾的侵略行径引起海内外华人强烈谴责。迫于压力，蒋介石于6月15日宣布1946年设立的“南沙群岛管理处”易名“南沙守备区指挥部”，命令海军编队再次巡弋太平岛及南沙群岛。6月19日，台湾当局任命海军上校谢祝平为指挥官，“派遣舰艇 DEXZ、LSTXI 和地面部队一个加强排，装载军事人员和物资，此次计划取名为‘威远计划’”。7月11日进驻太平岛，开展太平岛侦查搜集工作，全部任务于21日完成。7月14日，“太昭”舰侦察中业岛；15日，“太康”舰前往侦察敦沙洲，进驻任务结束后舰艇随即返航归建。据统计，“威远计划”进驻搜索太平岛、中业岛、鸿庥岛、南威岛、敦谦沙洲等9个岛屿，全程往返航程2400多海里。8月，蒋介石又派“宁远部队”巡弋南海群岛，运输重要军需物资及犒劳太平岛上军民。从那时起，台湾海军每三至四个月就在南沙群岛巡逻，并运送部队。台湾海军重新进驻太平岛，结束台湾当局将近5年的南沙群岛不设防真空期，恢复在南海诸岛之间巡视，阻止了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的阴谋，维护中华民族在南海主权权益。(见表1)

二、反共优先，消极维权阶段 (1957—1970年)

1956年，台湾当局又开始恢复太平岛驻军，其南海政策也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台湾外事部门开始考虑恢复驻守太平岛，提出三个理由：(1) 共产党势力正向东南亚扩张，“北越”已为共产党政权掌握，太平岛地位日益重要，如能恢复驻守太平岛，则在西、北两面可以监视大陆在越南和海南岛方向活动，东、西两面可屏障菲律宾与婆罗洲。(2) 太平岛蕴藏大量磷矿，供台湾需要，目前已进行开发，且有一定规模。(3) 如果以太平岛为基地，对台湾远洋渔业发展大有裨益。

1954年12月，台湾当局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凭借“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在美国大力支持下，不断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加紧对福建、广东和浙江沿海港口的侵扰，台海局势由于美国武装干涉和台湾当局军事骚扰，一时间形成硝烟弥漫和战云密布态势，并导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危机过后，蒋介石认识到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可能性在不断攀升，倍感“武统”的巨大压力，其南海政策制定也发生一定变化。例如，台湾防务部门发布海军在巡视南海过程中的处理办法，包括发现大陆渔船、民船要进行抓捕，经过审讯获取情报后，认为确实有必要的，要将其押回台湾本岛进行进一步侦讯，如果有拒捕行为，台军可立即击毙。

1957年，针对“南越”声称南海自古以来属于越南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外事部门向“南越”提出严重交涉，但私下仅表示“如今‘中华民国’正争取东南亚各国反共兴国之际，在南海各国政府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我国’应该严正声明南海水域我领土外移民设立行政区域已成事实即可”。1959年4月，针

表 1 1945—1949 年中华民国及 1949—1955 年台湾当局南海作为

时间	事件	南海的主要作为
1946 年 8 月	接收南海诸岛	乘坐美国军舰接收西沙群岛、南海群岛，并派军队驻守
1947 年 12 月	核定南海诸岛各岛礁名称，公布“十一段线”	内政部核定南海各岛礁名称,南海 4 个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同时设置南沙群岛管理处、东沙群岛管理处、西沙群岛管理处
1949 年 6 月	公布海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	“海南特别行政区”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大小礁、滩、沙洲、暗礁，均改为海南特别行政区，仍由海军代管
1950 年 5 月	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撤军	为因应海南岛撤军，台湾当局从西沙群岛、南海群岛撤军，于 1950 年 5 月完成
1956 年 6 月	“立威计划”	前往南沙群岛海域实施侦察与巡逻任务，为设立南沙守备区做好准备
1956 年 6 月	“威远计划”	负责护送南沙守备部队巡弋南沙岛屿
1956 年 8 月	“宁远计划”	再次巡弋南海群岛中主要岛屿，慰问太平岛驻军人员

对台湾派人前往南海群岛进行开发事宜，“南越”向台湾当局提出口头抗议，台湾表示对南海既定的主权立场外，声称“中越（‘南越’）‘两国’现已为共同抵制共产主义侵略产生合作，希望不能因南海争端引起两国纠纷而影响双方友好关系”。1961年7月，“南越”多次声称对西沙群岛享有主权，台湾当局除了向“南越”发出“照会”抗议后，仅表示“如今中越‘两国’共同反共立场与双方友好关系，始终设法避免扩大‘两国’对于此事争执”。1964年1月，针对“南越”海军擅自登陆南沙群岛并竖立界碑，台湾当局向“南越”外事部门重申“中华民国”对于南沙群岛主权立场，并要求“南越”保证今后不会继续发生类似事件，“但为了顾及中越‘两国’关系，希望越南能够口头说明中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以免引起公开争执，让中共有机可乘”。针对菲律宾人克洛玛对南沙群岛坚持其权利主张以及越南外交部所做声明，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叶公超仅表示“南沙被中共匪帮窃取利用危险，要求美台双方应就协防区域以阻止共匪渗透窃取之各项可能办法交换意见。最近海军在南海一带巡逻，发现天平岛上的建筑物有共党的标语，共匪若窃取控制南沙，对于该地区公海自由，也将是一大威胁”。除此之外，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也曾写道，“菲律宾

表 2 南海声索方南沙群岛岛礁驻防时间表 (1971—1988 年)

国家或地区	驻防岛礁	开始占有年份
中国大陆	永暑礁	1988 年
菲律宾	中业岛	1971 年
“南越”	南威岛	1974 年
马来西亚	弹丸礁	1983 年
台湾	太平岛	1956 年

人克洛玛以探测南海岛礁为名，进驻南沙群岛，菲律宾政府虽不承认此为菲律宾领土，但也未承认此为‘中华民国’领土。由于克洛玛所言语称‘自由地’，地理上离菲律宾较近，如果被‘共匪’占领，则‘共匪’可将此作为游击之地，对于菲律宾威胁非常之大。如果菲律宾政府承认南海主权属‘中华民国’，则可以邀请菲律宾以协防方式或者参照‘中美同盟’协防台湾方式也未尝不可”。后蒋介石又补充到，“‘共匪’也对克洛玛行为表示反对，‘中华民国’要对‘共匪’行为处置方案为重点，‘中华民国’虽派军舰前往巡视，但仍依据形势发展而定”。

三、重“外交”轻“主权”阶段 (1971—1988年)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发布南海区域可能存在大量天然气、石油等重要资源报告后，南海周边国家趁机提出对南海主权非法要求，并迅速采取行动进行南海“圈地运动”，与中国产生南海领土争端。南海局势进入到所谓“快节奏”三部曲。一是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等片面划定其所谓的海域主张。二是越南、菲律宾等国以武力抢占中国南海相关岛礁，其中越南占据最多，目前占领29座，菲律宾占领8座。三是越南、菲律宾及马来西亚立足占据相关岛礁进行石油及天然气的开采活动。1971年7月29日，菲律宾占领了南沙第二大岛中业岛，台湾海军“中肃号”战车登陆舰在“太湖号”与“太康号”驱逐舰护航下，载运一支陆战队加强连在南海执行巡护任务，原本计划在一个小时内歼灭菲律宾军队，但蒋介石下命令不得挑战或者歼灭菲律宾军队，只能眼睁睁看着中业岛被菲律宾人占据。“1974年台湾当局在与‘南越’、菲律宾就南沙、西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只有发表声明抗议，而没有进一步作为。”1976年，台湾内务部门成立临海小组，意图研究解决台湾在海洋领土争端中资源开发问题，为了不引起与东南亚国家争端，该小组并未同意设立台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面对南海声索国屡次侵犯中国南海权益 (如表2), 台湾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仅是发表所谓“外交声明”，强调南海岛礁从历史、地理、法理上“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其他国家对南海岛礁占领行为，‘中华民国’一律不承认和不接受”。台湾防务部门虽对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侵占南海岛礁行为，表示要保卫南海主权决心，但此时台湾当局被逐